

雅集

拾叁

2019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	编辑部主任：	副主编：	主编：		副总编：	顾问：	总编：	
	李业吉 赵晓锋	魏方	张美云 魏方	彭慧 陈童	彭慧 陈童	唐旭明 魏晓蕾 朱杰	周和平 贾梦玮	瞿超	



主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江苏中华文化学院

编辑出版：《雅集》编辑部

地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编：210007

网址：<http://www.jssy.org.cn>

电子邮箱：yajijis@163.com

电话：025-84287248

传真：025-84287218

封面题字：徐邦达

装帧设计：朱赢椿

出版日期：2019 年 11 月

本刊特稿

抉 择 ——1949 年的吴贻芳 / 杨一丰 /001

人物春秋

我以我血荐轩辕 —— 追忆李公朴先生 / 王成斌 /008

“教我如何不想她” —— 刘半农的传奇人生 / 庄若江 /015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爱国高僧 —— 巨赞 / 封志成 /021

艺术人生

百年宋文治 / 周和平 /027

海读言恭达 / 卞毓方 /039

附：书法传统中的个性表达 / 言恭达 /044

历史遗韵

魏源故居：穿越时空的梅花香 / 刘跃清 /046

颐和路 / 雷雨 /051

禅意大虎丘 / 王啸峰 /057

南京佛教三题 / 马建强 /062

城市文脉

城市山林话米芾 / 张大华 /070

书事唯大谁比痴 —— 赵氏父子与脉望馆 / 缪克 /074

文苑纪事

父亲的名章 / 谢舒 /079

钱瓊与《绣襦记·卖兴》的三度复排 / 顾斌 /083

文化论坛

江南才子自风流——文教视阈中的江苏（上）/ 诸荣会 /088

文心雅趣 铁画银钩——漫谈张謇的书法人生 / 吴开宇 /095

传统文化

樵歌杂说 / 薛国安 /099

造园宝典《园冶》归乡之路 / 汪向荣 /104

节令之美 / 王芳 /110

乡村记忆

故乡流均 / 陆汉斌 /112

蓝印花布——南通记忆和百姓梦想 / 王金泉 /115

海外传真

书缘奇遇 / 朱小棣 /119

澳洲鸟事 / 陈酉 /121

活动侧记

越过一湾海峡 你我如约相聚

“古漕新韵、千秋传承——苏台两地青年艺术家江南水乡采风行”活动侧记 / 吉强 /124

管峻书法作品 / 封二

台湾艺术家作品欣赏 / 封三

征稿启事 /56

抉择

——1949 年的吴贻芳

||| 杨一丰



吴贻芳（1893-1985）

1949 年的中国，正是进入历史大转折的时期。吴贻芳，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作出了正确的抉择，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伟大历史性时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1949 年的元旦，蒋介石发布了“新年文告”，其中隐含着自己引退、政府求和的意思，但只不过是寒蝉一鸣、空留其声罢了，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看出了蒋介石仍在推卸责任，中共并不会妥协的。果然，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响亮地提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随着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势如破竹，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权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一片乱象。

清凉山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下依习惯沿用旧称“金女大”），美丽依旧。此处建于

1921 年的宫殿式建筑群落，飞檐斗拱，曲径回廊，间以池沼林木，绿地草坪，被称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自 1928 年起，吴贻芳执掌校务已经 20 多年，筚路蓝缕，艰辛备尝，包括全面抗战时期的内迁，保持了弦歌不辍，这是她最为欣慰的。但在战火笼罩下，校园也已无法平静。

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吴贻芳对局势的急遽变化缺乏心理准备，但国民党的败象，是早有端倪的。担任金女大校长以后，吴贻芳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她成为国共合作时期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的主席团主席，频频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从中了解的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相互倾轧、消极腐败，让她这位无党无派的大学校长颇为吃惊。在参政会上，陈嘉庚等人常常慷慨陈词、仗义执言，陈甚至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尤其是被称为“大炮”的傅斯年对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猛烈抨击，有

理有据，竟然造成了两任行政院长的下台。在美国留学多年，又是一直在所谓“象牙塔”生活的吴贻芳，一开始听到这些贪污腐败的事例，真有些瞠目结舌，听得多了，也促使她思考，这些被抨击甚至被弹劾的官员，都同蒋介石宋美龄他们有着脱不了的干系啊！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员到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劫收”，大发胜利财，他们的所作所为尽失民心，连许多一直拥护当局的知识界人士也开始灰心丧气。吴贻芳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看到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储安平宣称，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胡适是她的老朋友了，从参加庐山座谈会到哈佛大学成立300周年纪念活动，一直到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他们都是共同参与，但就是这样一位对蒋介石一直抱有希望的人，也是心灰意冷，牢骚不断。而被称为国民党“文胆”的陈布雷的自杀，给了她心灵重重一击，她印象中的陈布雷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文人，如果不是对时局前途绝望，怎么会弃世而去？

作为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人物，又是著名的大学校长，她也曾经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寄望于国共双方能够和平共处，不再兵戎相见，让百姓得以修生养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见证了美国朝野包括基督教界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从充满希望，到渐次失望直至抛弃的过程。美国一直坚持扶蒋反共、助蒋内战的政策，但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转而又支持所谓“划江而治”，并寻找一些政治力量和代言人，希望以温和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利益。1945年年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内战，国共两党均表示愿意和他合作，吴贻芳也认为这是一次难得

又重要的机会，希望美国能够不偏不倚地进行“调停”。吴贻芳作为“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会长，和副会长崔宪祥、梁小初一起，去拜见了马歇尔。马歇尔是个声望卓著的将军，平时低调寡言，他对吴贻芳一行表现出了极大的尊敬，他耐心听完了他们的陈述，对他们希望和平解决国共内战的想法表示了赞赏，同时，他在交谈中也流露出了无力感。1946年底，马歇尔宣告“调停”失败，回了美国。接着，上海的几位教会领袖委托吴贻芳联系，他们想见见蒋介石或者宋美龄，向他们呼吁和平。大家知道，吴贻芳和蒋介石、宋美龄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延续了许多年。吴贻芳将信息传递后并不见回音，等到宋美龄答应见面时，已是蒋介石颁布“戡乱令”以后。此时此刻，大家都有些尴尬，连作为此行主讲人的孙恩三牧师也只是空话敷衍。出门以后，大家知道和平无望，情绪消沉。吴贻芳他们何尝不知道，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何去何从，又怎么会因为他们的劝喻而改变呢？他们只是宣喻了自己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吧。

直到淮海战役前夕，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驻南京的代表密尔士一次来看她，他对吴贻芳说，现在看来，蒋介石很难维持下去，应当劝他隐退，请副总统李宗仁出来执政。密尔士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希望吴贻芳去当说客，但吴贻芳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担此重任，她说：又有什么人能够说得动蒋先生呢？见她这么说，密尔士也不好多说什么，说了些闲话，就走了。

密尔士一走，吴贻芳忽然想到，这样的想法，应该是司徒雷登的，这也代表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失望，可是，别说劝说，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她也是力不能任啊！吴贻芳与司徒雷登交谊颇深，在他担任金陵神学院院长和燕京大学校长时，他们接触更多。但和当时许多知名的知识分



1934年，吴贻芳（左二）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



1936年，吴贻芳与司徒雷登合影。

子一样，吴贻芳也不认为司徒雷登是一个好的外交家，他的书呆子气，使他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时左支右绌，常常露出狼狈之相。吴贻芳因此也对他多了一点理解。1948年，司徒雷登发表希望国共结束内战的声明，被认为是偏袒了蒋介石当局，南京各大学的学生会准备联名抗议，金女大学生会的职员将抗议信送给校长过目。吴贻芳觉得用词太过偏激，便建议金女大学生会另起一稿，单独发表。第二天见报的抗议信，金女大学生会“缺席”了，单独发表也是不了了之。

战火如炽，随着平津被解放军围困，国民政府开始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急救计划”，其中包括“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政治关系必离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正是在南京方面的反复催促下，胡适、陈寅恪、梅贻琦等先后“撤退”到了南京，这在全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何去何从？成为许多人极为痛苦却又无法避免的紧迫问题。

早在1948年底召开的金女大校董会上，就有人提出，应该考虑将学校迁往台湾。其时，蒋介石退居台湾的用心已经显露，他极为信任的陈诚被派往台湾主持政务，而且不久陈诚就开始招兵买马。迁校是件大事，吴贻芳当然不会贸然行事，她也知道，包括北大、清华，也一直有迁校之议，但最后都是空谈而已，而且金女大还是教会大学。教会大学是历史的产物，它自从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后，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象征，但也因为它的外来属性和宗教特点，为它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带来许多解读。北伐战争胜利以后，随着教育权的被收回，金女大在注册中，校董会要求保留基督教宣教的坚持被否定，吴贻芳因势利导对办学宗旨进行了新的阐述，爱国和为国家培养人才成为主要目标——这和金女大的校训“厚生”是一致的。金女大在教会大学中，论其规模是小的，



1943年，金女大学生欢迎参加国际会议归来的吴贻芳。

但它以高质量和富有特色的办学成果享誉中外，成为一所知名大学，吴贻芳以其出色的治校才能和先进的教育理念，成为一名著名的大学校长。现在，她断断不会去带头迁校的。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她拒绝了迁校提议，但今后学校怎么办？这是她忧虑烦心的事情。她因此开始研究起中共的政策，当时国统区的知识界，基于对前途的担忧，对中共的政策忽然有了兴趣，毛泽东1941年发表的被列为禁书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暗暗流传，吴贻芳细细琢磨，对“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等名词似懂非懂，但她明白中共还是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这让她感到宽慰，但心中仍是隐隐的担心。

1949年1月，华东地区的6所教会大学在上

海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汹涌而至的时局变化。最后会议通过三条原则，即坚守宗教信仰自由；学校的行政人事由学校自理；课程和研究由学校自己规定。在时代变革的前夜，教会大学校长们的保全之策，是把教会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王国”，附丽在宗教之上，希冀在社会动荡中继续延续和生存。新中国成立以后，吴贻芳曾经说过，在人民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蒋介石政权行将覆灭之际，我们还在梦想依赖美国教会，继续自己的教育梦想，真有点不知今夕是何年。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派系的联合打压下，又迫于美国的压力，只得“引退”，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在此前后，国民党当局开始南迁广州，此时“和谈”

又成为热点，一些民主人士和知名人士成为争取的对象。坚持将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也几次约见吴贻芳，他也明白，吴贻芳虽然主张和平，但这时候她不会再来斡旋，他倒是希望如果国共和谈成功，能够实现“划江而治”，吴贻芳作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是有着特殊作用的。

吴贻芳知道司徒雷登的用意，这时候她更不愿去当一个无趣的说客。吴贻芳并不知道的是，司徒雷登几次约见她的消息，也被中共密切关注着，她知道在学校有着思想左倾的教授，像陈中凡、刘开荣等，也有不少激进的学生，但她并不知道，在她的周围，有着中共的地下党员和组织，也在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这些地下党员大都是学生，她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做校长的工作，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与她“亲如父子，情同父女”的姨夫陈叔通来影响她。陈叔通是一位很有声望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同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

吴贻芳去了上海，她告诉姨夫，现在学校已是人心浮动，有些外籍老师还有一些中国老师走了，有的学生也以种种理由不来上课了。政府的“抢教学人”行动虽然偃旗息鼓，但一批批学界精英还在出走，世界末日般的情绪，在一些人中弥漫。她说，学校不迁，她当然不会走。她还表示对于司徒雷登期望于她的，她实在不愿也无心于此。她的想法，得到了陈叔通的肯定和支持。陈叔通说，国民党大势已去，早已不得人心，留在大陆是对的。他认为，共产党人很是希望知识界人士留下来，中共办教育肯定需要人才，像吴贻芳这样广有声望的人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陈叔通的点拨教诲，帮助吴贻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吴贻芳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抱有教育救国的宏愿。如吴贻芳这样经历了欧风西雨的洗礼，深知一国之教育，对民族振兴之重要，所以，人生所系，希望所在，精神之寄托和安慰，都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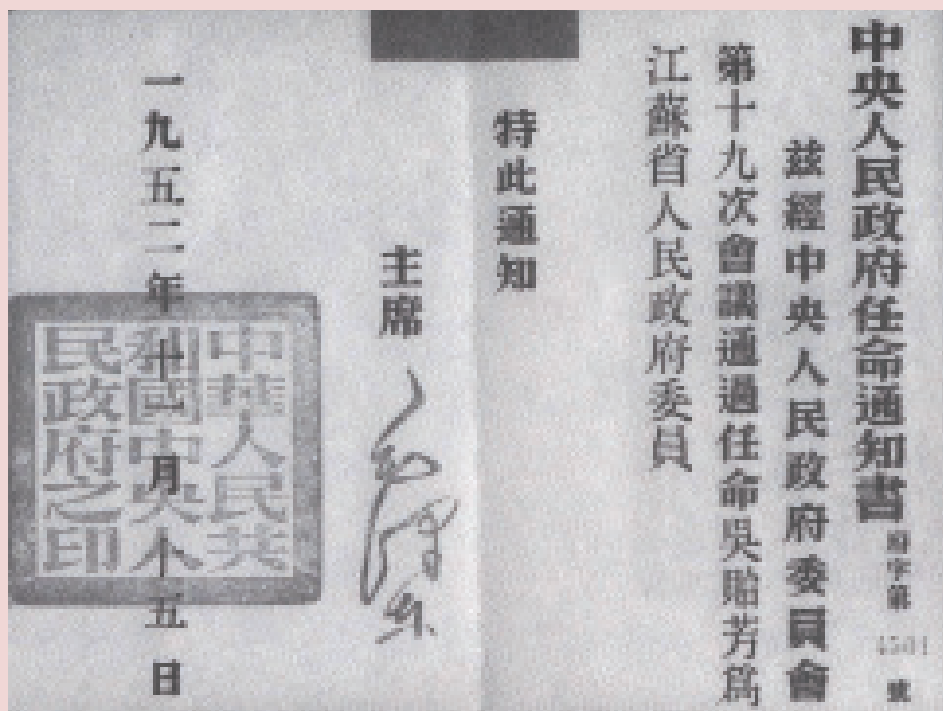
教育之上。她相信姨夫的话，也相信自己的判断，她要与学校同在，与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同在。

3月8日，行政院长孙科辞职，由何应钦继任。在摇摇欲坠中的组阁，确是勉为其难，在确定教育部长人选时，张治中提议由吴贻芳担任。张治中当时还担任国共和谈的国民党代表，他女儿张素我曾经是金女大学生，他知道吴贻芳不仅有才干和品德出众，还有不依不傍的处世处事态度，无疑是一股难得的清流，在乱世之时，能为各方接受。

张治中陪同何应钦一起来到金女大。穿过长长的林荫大道，他们来到100号楼，主宾坐下，张治中先讲明来意，吴贻芳静静地听完，她几乎没有考虑就回答了：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离不开金女大啊！

这样的话，1946年她就对宋美龄讲过。那一年2月，她刚刚从美国回来，经过重庆去看望宋美龄时，宋美龄提到，刚被日军释放不久回到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提议她当教育部长，她当时婉拒的理由就是自己离不开金女大。更何况，她也知道，李宗仁的所谓代总统，不过是徒有虚名，处处受制，根本无法视事，蒋介石仍然大权在握，隔空指挥，她这时候，断断不会去趟浑水的。果然，何应钦的政府也是短命的，到了1949年的5月，何应钦也就辞职了。

吴贻芳了解到，济南和北平解放以后，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还继续在办，她想以此来安抚人心。让吴贻芳最为担心的是学校和学生，早在两年前，如火如荼的学生民主运动让一直平静的校园暗潮涌动，在“争民主、争自由，反饥饿”运动中，人们看到了从所谓“象牙塔”里冲出来的金女大学生。吴贻芳曾经坚决不让军警进入学校，客观上也保护了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同时，她也不希望学生走出校园走上街头，



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任命吴贻芳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的通知书。

但她也感到，自己说出来的理由是苍白的，她无力说服学生。1949年4月1日，由张治中率领的参加国共和谈的国民党谈判代表离开南京北上，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表达对和平的愿望，吴贻芳事先得知当局会镇压的消息，她力劝学生不要参加，学生们坚持要去，游行果然遭到镇压。第二天一早，她带着鲜花去了鼓楼医院，看望受伤的学生，虽然其中并没有金女大的学生。

这时候，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没有忘记她这位老朋友。4月22日，国民党当局已经决定弃守南京，部署退却。宋美龄在溪口通过军用电台接通了她的电话，这次没有客套，没有寒暄，宋

美龄直接提出要她离开南京去往南方。此时正是国民党仓皇辞庙之际，远在外地的宋美龄还记得她，让她铭感于心，但她还是客气地谢绝了。当天下午，又有军人送来机票，此时的一张机票，并不是黄金可以换来的，吴贻芳虽然留意已决，但她也不忍心拂了宋美龄的面子，她在内室耽了好久才出来。机票留下了，她人也留下了，她“静静而又不安地迎接着光明的到来”。

也就在这天下午，一张由“国大代表”、国民党退役军官马青苑及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任正副主任的“治安维持会”的告示，开始出现在街头，一些维持治安的行动开始了。

这件事情的主其事者是“国大代表”马青苑，

他找到吴贻芳，希望一起出面维持社会治安，迎接解放军入城，吴贻芳欣然同意。马青苑还通过电台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并接受了美国记者托平的采访，以安抚人心。

4月23日那天的南京是极不寻常的。第一个报道南京解放的美联社记者托平回忆，“天刚破晓就被南京北面的炮声和爆炸声惊醒了”。这一天，南京唯一一份仍在出版发行的报纸是基督教的《义士报》，报纸上载满了欢迎共产党的文章。

4月2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消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中说：“在国民党军已离开南京，人民解放军尚未入城的时间，南京人民已于昨日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昨日下午六时发电至毛泽东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该电称，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飭京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时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同叩梗酉。”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解放军）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和国民党军队冷漠的表情和混乱的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解放军入城以后，学校的教育秩序仍然正常，这正是吴贻芳所期望的。

5月16日，中共南京市委、军管会、市人民政府邀请文化、教育、科技界的知名人士举行座谈，刘伯承、宋任穷到会与大家见面并听取意见。吴贻芳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南京解放的欢欣和对解放军的谢意，她表示，“金女大愿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为人民服务，在中共领导下，继续为社会培养人才”。后来，刘伯承、陈毅拜访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集体活动的吴贻芳（孙明经 摄）



1963年夏，吴贻芳（左一）和陈叔通（右一）在北戴河。

了她，鼓励她继续把学校办好。

这一年的9月21日，吴贻芳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她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一个历史新纪元的开始。

杨一丰 男，省级机关干部。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追忆李公朴先生

||| 王成斌



李公朴 (1902-1946)

我的案前摞着一本又一本关于李公朴的书籍。在高可盈尺的书堆里，有他 100 岁诞辰之际武进邑人集腋成裘推出的各界人士纪念文集，有他诞辰 110 周年群言出版社出版的百万余字的公朴文集，还有散见于常州本埠各类掌故、丛书中的公朴故事。他只活了 44 岁，离开这个世界已 70 多载，从他被无声手枪暗害的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开始，他被纪念了 70 多年。

何止是书籍卷册，从常州故里到他生命被终止的春城昆明，一次次与以李公朴命名的纪念馆、研究会、小学、纪念碑、雕塑、道路相遇，无论是在字里行间探寻，还是站在赋予公朴内涵的馆舍碑雕前追思，我隐约看到一个清寒的少年从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中走来，在风雨苍黄的变幻中长成了伟岸旷朗的大胡子青年。筚路蓝缕，这个年轻人在对社会的热忱探索中给我们展现了怎样一幅恢弘悲怆的人生画卷呢？

常州武进湖塘桥东村一处清幽雅致的二进院落，是李公朴的故居。他并非出生于此，但在 1920 年，18 岁的李公朴遵父母之命在老家的这座宅院里举行了传统的婚礼，他与王氏的两个女儿都在此出生。1926 年，李公朴投笔从戎，随北伐军入江苏后，曾骑着高头大马回东村探望母亲及刚出生的次女李国华，并在这座宅子里住过一夜。此后，他再未回过这里。

宁静的江南小院承载了公朴最初的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从此，他把家乡、老屋、幼女都留在了梦里，他奔走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在腥风血雨中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探究，为像他一样出生寒微的青年民众办学，为这个民族应该矢志追求的民主呐喊。

故居二进官厅内悬挂着一块红色匾额，上书

公朴1941年12月为友人的题词：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苍健的大字是刻在木头上的，凝重、有力。

我立在匾额下沉思：仁者不忧，仁者哪得不忧，公朴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一生都在忧患中漂泊；知者不惑，知者怎堪不惑，公朴因惑求启蒙，在解惑的历程中承担起为民请命的使命；勇者不惧，勇者岂能不惧，公朴有挚爱的家人朋友和事业，大丈夫不惧死是为舍生取义，可离别是一种怎样刻骨铭心的痛。

生于晚清，长于民国，朝代的风云变幻让少年李公朴饱尝生活的艰辛。12岁他便从出生地淮安辗转流离到镇江，小小年纪入店做了学徒。历经“五四”风潮的洗礼，17岁的他在朴素的道义与良知指引下，组织学生、店员抵制日货，揭发奸商，并为这个小小的组织取名“爱国团”。爱国的种子已从年轻的心田破土爆芽，天才的组织能力已在社会的舞台上初露才华。这次事件以李公朴的失业告终，他被店主解雇了。

失业留出了空闲，这个档儿父母帮他到武进老家把喜事办了，但这个包办的婚姻并未能维持下去，成为李公朴人生中回避不了的一段悲情。婚后，他获得就学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胞兄李公愚提供的，公朴正式就读于镇江润州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后入上海沪江大学附中，1924年升入沪江大学。这段求学历程是李公朴非常宝贵的积淀，店员李公朴与大学生李公朴在学养和眼界上毕竟是不一样的。然而，这期间并不安稳，在武昌读高中时，嫉恶如仇的公朴抗议校医虐待学生引发学潮，被开除；在沪读大学时，“五卅”运动激发了公朴的民族正义感，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险遭逮捕。也是这一年，李公朴加入国民党，1926年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然道不同不相为谋，目



李公朴与张曼筠结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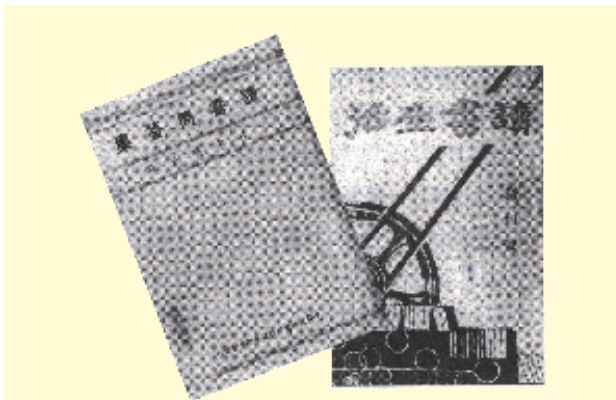
睹“四·一二”大屠杀的血色，国民党员李公朴开始深深地疑虑、不安，党内的密谋陷害又将他向外推了一把，1927年，满怀愤慨的李公朴脱离国民党军队。从此，他不属于国民党。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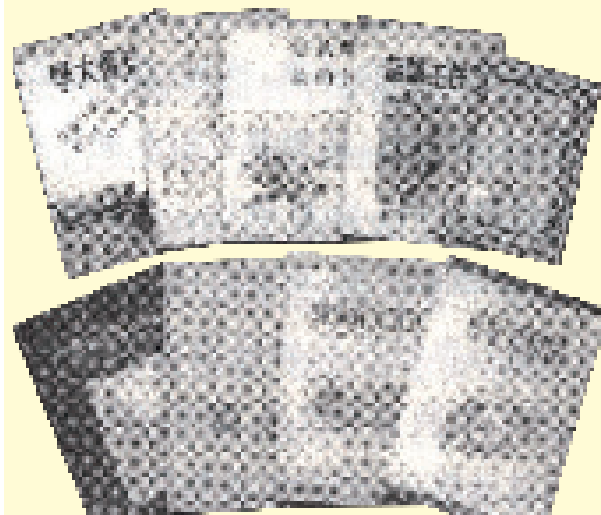
路在哪里，在时代浪潮的挟裹下，李公朴寤寐求之，终不得之。

1928年初，李公朴和画家张筱楼的次女、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张曼筠结婚，这是他志同道合的深爱的女子，从此他们相濡以沫、相伴同行，直至生命的终点。

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1928年，经母校沪江大学和基督教青年会推荐，李公朴考取美国



1934年,《读书生活》创刊。



北门出版社出版的部分图书

俄勒冈州雷德大学,带着一腔的爱国报国之情和求学求是之志,他于当年夏季启程赴美。

这段留学生涯给李公朴短暂的人生抹上一道亮色。我读厚厚的《李公朴文集》,发现文集开篇即是李公朴记录海外生活的通讯。在海外两年零八个月,平时半工半读,暑期还到阿拉斯加州一家鱼类加工厂做工,毕业后用“工旅”

的办法周游美国,并横跨大西洋,到英法等欧洲国家考察,途经日内瓦时,他还意外获得参加各国人民促进国际和平团体联合大会的机会。可以想见,无论在国内国外,李公朴绝不止步于象牙塔内读书研习,在更广大的社会考察中他见识了更多,想得更远。

应《生活》周刊撰写的这29篇海外通讯,生动详尽的纪实笔法下处处流露出李公朴对祖国时局的忧虑,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无时无刻不在启迪他对民族命运的思考。

美国独立纪念日那天,在热闹非凡的爆竹声中,他有感于国内政治之紊乱、人民生活之困苦与此邦比较,可谓适成反例。进而他在思索中写到:

盖民治国家之政治问题,是很需要人民中领袖分子时时用在野的旁观的见解,去研究讨论,不仅注意监督政府方面,并尤能在援助少数执政者之施行其贤明政策,不致为一班败类的政客所蒙混阻挠。因为民治国家的政治,倘无人民在后面不断地加以督促与建议,则仍然会逐渐腐化,为政客多利用,为资本家多操纵。

他还深觉,国内知识界的先知先觉者和各界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领导者,应当振作精神,发起组织研究政治或社会问题的团体,来讨论目前政治社会的严重问题,提出具体办法,提醒政府以及国民,并且为人民创造研究讨论的机会,来渐渐形成一种健全的民意。

在南海的狂风大浪中,公朴奋笔疾书:“默念我国前途,以为什么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足畏,最可畏者是我们自己先若一盘散沙,没有团结力来振兴内政,抵御外侮,予敌人以可乘之机,有如摧枯拉朽,无不随手而倒。”他的思索与追

问已具有鞭挞入里的力量。

三

1930年11月，李公朴回到祖国，28岁的他意气风发，有朋友问，去了一趟国外究竟学习了什么，他坦白地回答：学习了劳动习惯与怎样读书。很快，这位“海归”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中。

此刻，一个改变命运的重大灾难正一步步逼近本已伤痕累累的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此后，是长达14年的反抗侵略的漫漫历程。民族危亡的大时局下，李公朴在忧患中扛起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他找到了最适合的载体来实践自己的责任与理想，那就是教育。这个教育是三位一体的教育，是战争与动荡的土壤里开出的奇异之花。

他披肝沥胆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读书生活》、读书生活出版社，致力平民教育；他苦心孤诣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和“抗战建国教学团”，践行抗战教育；他激情满怀创办社会大学、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倾情民主教育。这平民、抗战、民主的教育在那个年代何其艰难，李公朴以火一样的热情不惧艰辛一步步走出了一条社会教育之路。

他是从底层社会成长起来的，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目光总能看得到底层民众的痛苦与挣扎，理解他们无书可读和学无所用的无奈与渴望。他对自己儿时失学后做商店学徒的经历刻骨铭心：“在当时的商店中做学徒的，不用说整日地找不到适当的学习时间，就是稍有一些时候让我去学习，也是找不到最合乎学徒们生活的书籍、杂志或报纸，帮助我解决知识上、精神上的苦闷。”所以公朴创办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

《读书生活》，帮助一般的小店员、工人、职员、学生及各方面的青年指导解决苦闷的方法，并实际担负着传播新文化的种子到广大群众中去的责任。

在谈到创办《申报》妇女补习学校时，公朴坦言：“我们的课程，注意于职业的技能 and 家事的常识两项，将来每一个毕业生，都能负起服务社会和改良家庭的责任。”1932年到1936年间，《申报》流通图书馆的读者有两万多人，补习学校的学生由两三百人增至五千人，一时成为沪上民众教育的一大热点，引领了上海平民青年读书生活的方向。

公朴推行的抗战教育是他冒着炮火用脚走出来、用笔写出来的。他四年中四次深入山西实地考察，研究战地教育，送教育上门。1940年他第四次赴晋西北进行战地教学，6个月中他带领抗战建国教学团一行走访了15个县500多个村庄，撰写了《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华北敌后——晋察冀》等几十万字的风靡一时的著作。今日重读这些文字，详尽的数据和实例令人慨叹，公朴用记者的眼光和笔触纪录下了真实的历史，山西人民遭受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是当时中国人民所受掳掠的一个缩影。

正是在山西，李公朴在民族危亡中看到被埋藏在泥土里的群众运动的巨大力量和深远意义。他深感要人民都为战争动员，先要民众有组织、有教育。他非常清楚：“所谓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并不能看作一篇宣言，一道警告，大家就手挽着手联成一道铁环。这条民族的铁环，一定可以结成，但是要作出极大的努力。”

四

这期间，他两度到达延安，由于大雪的阻滞，



李公朴（右一）等七君子与马相伯合影

他第一次在延安停留了一个月，得以作了深入地调查研究。他在他的战地通讯中写道：“延安与其说是革命的圣地，还不如说他是革命的摇篮。”李公朴的眼光是独特而犀利的，他看到延安是一个生气勃勃充满了实验精神的一个试验区域，实事求是边区工作的特点，没有森严，没有恐怖，一切都平凡，一切都是人对待人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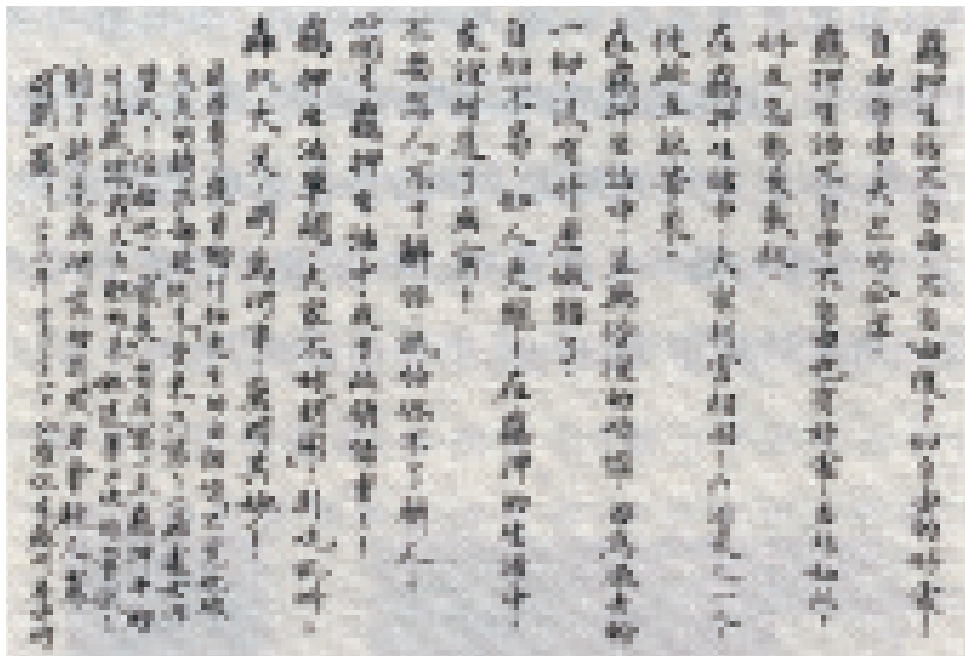
尤其是与毛泽东多次见面畅谈，并和诗作画，延安给李公朴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真地写下这样一句话：“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都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延安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民族危亡的关头，李公朴深切感受到统一战线的重要。他在文章中写道：“救中国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绝非一党一派，一个阶层，某一部分人，所能完成。如果在抗战中，在这一个

惊涛骇浪的抗日战争中，能够使各党派、各阶层，肩并肩地战斗到底，我们相信，社会革命将会更快地转变。这就是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尽量的延续与持久的益处，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前途。”

他的好友楚图南如是说李公朴：待人热诚，善与人同，在工商界、地方绅士、宗教界乃至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中交了一大批朋友，对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李公朴对时局始终以理性的目光来分析，无论是奔走在山西抗战前线还是来到祖国的大西南，他对教育的实践从未停息。在昆明，看到众多的职业青年渴望阅读进步书籍，但是一些进步书店、书刊横遭关停，李公朴说：“人们缺少精神粮食，受着饥饿与愚昧的威胁，我要开书店，自己办出版社，开辟自己的阵地。”1942年到1944年，公朴满怀激情，整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东奔西跑，那份热忱、那爽朗的笑感染了所有和他相识的人，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



李公朴狱中手书

在艰难困苦中硬是相继建立起来。

五

公朴是个知识分子，他最大的愿望是教书育人。如果可以选择，他不要做官。在早些时候，李公朴写过一篇文章《暗杀》，虽古有荆轲刺秦王的侠客传奇，时有徐锡麟刺杀恩铭的快意英雄故事，但李公朴不看好暗杀，“暗杀的计划者不论有权无权，都属于没落和走入绝境的一种社会层，至少也是表示自己权力的脆弱，否则，政治的斗争是可以在公开场面进行的”。即便是杀一个恶人，李公朴也认为：真正恶的憎恶者不要忘了比杀一个恶人更重大的使命。李公朴心向光明，无奈那个幽暗时代的当局辜负了这位赤子的磊落情怀，回报以他的只有抓捕、殴打、恐吓和无耻的暗杀。李公朴的生命被涂上了浓重的悲情。

1936年冬天，当李公朴以无比的热情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执行委员，同时努力将流通图书馆的一两万青年读者引向抗日救亡的道路时，他和沈钧儒、史良等七人被当局以“危害民国罪”被捕，“七君子事件”震惊中外。当局的意思，写了悔过书便可以释放。李公朴坦然回复：“我们没有‘过’，用不着‘悔’。”当各界人士纷纷营救“七君子”的消息传来，李公朴激动地写下：“入狱入狱，是谁所欲？爱国有罪，入狱何辱！”

是的，爱国无罪，卢沟桥的炮声传来，全面抗战爆发，爱国“七君子”取保释放。

可恨可悲的是，牢狱之后还有殴打。1944年“双十节”，公朴在昆明的群众大会上宣传民主和抗战，特务跑到主席台抓住李公朴就打，公朴的长衫被撕去半截，浑身是血，他忍痛继续主持会议，提出“实行民主，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两年后，在重庆校场口，李公朴组

织庆祝旧政协胜利的庆祝大会，特务对他大打出手，李公朴遍体鳞伤、血流如注，鲜血浸湿了十几条毛巾。李公朴气愤地说：“打死我中国还是要闹民主的。”彼时，李公朴已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员。

勇者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然最痛苦的莫过于不被理解。

1945年，当局在西南联大造出谣言，说什么“李公朴已被收买，即将赴渝出任要职”。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老友拍着桌子质问他“为什么出卖民盟”。真相大白后，面对朋友的道歉，他宽厚地说“能批评我的人才是我真正的朋友”。然而，李公朴也在痛苦地剖析自己：为什么老蒋不打别人而打我？为什么朋友不怀疑别人而怀疑我？可见我还是有弱点啊。我虽然出身贫寒，但在社会上混得久了，沾染的旧意识旧作风是不少的。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自己“说话太多”。

如果公朴仅仅只是一位振臂高呼民主的斗士，人们不会如此长久地纪念他，他留下那百万字的对社会和教育的理性思考是他留下的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丰碑，他耿直的个性、悲剧的命运和他对民主百折不回的不懈追求，更充满震撼人心的力量。

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1946年春天，王若飞、叶挺遇难，公朴在悼词中写下：“你们的死，教我格外不怕死，教我格外多做事，准备随时死。”

誓言已立下，时局一片冷雨凄风，内战的枪声已经打响，明知前路险恶，为了求得哪怕一线光明，却更向危险丛生处进发。李公朴和闻

一多发动了“呼吁和平宣言”的万人签名运动，不遗余力动员人民反内战。

“为了民主，我已经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李公朴是抱了必死之心的，然而，他如此不舍，他问妻子张曼筠：“假如我被打死了，你怎么办？”公朴也曾经说过，他顶喜欢小孩子。他一共育有四个孩子，每一个他都那么喜欢。然而，心怀知识分子的家国责任，为抗战和建立新的国家两大前途而奔走求解，公朴更希望中国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未来，让每一个孩子都无灾无难地成长。

1946年7月11日白天，公朴还在昆明家中撰写《欧洲教育史》，晚上，他和夫人外出时，无声手枪从背后击中了他的腰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拼尽全力喊出“完全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

李公朴跨出去的脚步再没有回来。毛泽东和朱德第一时间发表唁电，周恩来写下悼词：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公朴先生不朽。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李公朴与常州人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一起获评全国“100位英雄模范人物”称号。

王成斌 男，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的传奇人生

||| 庄若江



刘半农（1891-1934）

小城江阴市中心，闹中取静有座三进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静谧的院落，与外面喧嚣的车水马龙恍若隔世，这里就是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的出生之地。虽然，思夏堂刘氏算不上显赫，但刘氏兄弟却无疑是小城的骄傲，也是江阴最鲜亮的文化标识。

据族谱，刘半农所属的江阴刘氏源出湖广荊州府长阳县，南迁一世祖佛保公生有九子，以“福”字排行，从福一至福九。元末战乱时，佛保公携七、八、九三子徙居江南，屯田垦荒、招佣耕稼，历经数十代，逐渐成为巨族而富甲一邑。明太祖朱元璋龙兴江左时，择吴中富民十八户助饷，佛保公位居前列，可见其时刘氏之殷足。佛保公死后，子孙析居。刘半农兄弟所属的思夏堂，乃守三堂的分支。

刘氏三兄弟的曾祖刘荣、祖父刘汉两代，只是普通的殷实人家。祖父刘汉无子，父亲刘宝珊在年幼时过继到了刘家，婚后生下寿彭（半

农）、寿椿（天华）、寿慈（北茂）三子。一个不算显赫的门楣，由此走出了三位名声远播的文苑才俊。

刘半农（1891-1934）是刘家的长子，虽然43岁便英年早逝，却是历史上可圈可点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也是一位才情过人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曾担任近代著名启蒙刊物《新青年》的主编，他和钱玄同一起上演的那场“双簧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场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为婚姻而退学的“最优等生”

早年，刘半农在常州府中学堂念书时成绩名列前茅，列为“最优等生”，连成绩也很优异的钱穆都说，“寿彭连中三元，同学争以一识刘寿彭为荣”。不过，这个“好学生”竟然在毕业前一年（1910年6月）忽然退学了。据说是因为



刘半农夫妇

对学校保守教育体制不满，事实上，一场过早到来的婚姻才是他不再安心读书的真正原因。这一年，中学尚未毕业、年仅19岁的刘半农与朱惠结婚了。

和那时的许多文人一样，刘半农的婚姻也充满了传奇。这段姻缘的缔结十分特别，早在刘半农11岁时，一天母亲带他去附近的一座庵堂烧香拜佛，朱家妇人恰巧也带着两个女儿同往庵堂。两位母亲三言两语之间互相有了好感，竟然起意要攀儿女亲家。朱家的长女朱惠这年14岁，生得亭亭玉立，半农母亲心下喜欢，但回家后此事却遭到丈夫刘宝珊的坚决反对。

但朱家却铁了心要结这门亲，并说若嫌姐姐朱惠年龄大，可以选妹妹。半农父亲碍于情面不好再推脱。在父母作主下半农与朱家次女订了婚。不料，还未及过门朱家妹妹便患病夭折。于是朱家再次提出将长女朱惠许配半农，此前多情的半农早与朱惠暗自交往互生爱意，这次

也算是天随人愿。订婚之后，半农一有机会就往朱家跑，见被迫裹脚的朱惠走路一瘸一拐，很是心痛，便软磨硬抗要给朱惠放脚，令少女十分感动。半农在常州府学堂读书，朱惠则早早来到刘家做了童养媳。高二那年，半农母亲病重，为了冲喜，两人匆忙完婚。婚后的半农心猿意马已无心念书，便自作主张退了学。

刘半农的突然退学令父亲大为震怒，乡人也纷纷侧目。冷眼之下，刘半农只得离家往上海去谋生。朱惠则留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公婆。因过度劳累，朱惠先后两次流产，半农父亲却以此为由逼儿子纳妾，遭到半农拒绝。1912年6月，刘半农在上海《时事新报》和中华书局谋得一份编辑工作，生活开始稳定下来。为了避免和父亲的冲突，他将朱惠接到上海同住。闲暇时，他便在《小说月报》《时事新报》《中华小说界》和《礼拜六》周刊等发表译作、小说，赚些稿酬维持家用。为了迎合读者口味，他给自己起了不少笔名，用的最多的是“伴依”，其意不乏暧昧。因为国文功底好，加之勤奋和才情，他很快成了上海滩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伴依”的名字也常出现于《小说月报》《小说大观》等刊物上，十分引人关注。5年间，他发表了40多篇通俗小说，多为言情、警世、侦探、滑稽等消遣文字，如《失魂药》《最后之跳舞》等，苏雪林说他的小说“滑稽突梯，令人绝倒”。

随着声名渐渐鹊起，刘半农有了“江阴才子”的美名，靠着每月数十元稿酬基本维持了一家人的生活。连当时赫赫有名的报人、小说家严独鹤也开始向他约稿。用一支笔，刘半农在上海文坛挥洒出了一片天地。

1916年，他们的长女刘小惠出生了，考虑到父母和乡人重男轻女的俗念，小惠一直女扮男装，直到1920年出国前才恢复女儿身份。

中学肄业的北大教授

1917年夏，刘半农从上海回江阴休假，一路思考着未来的人生。虽然写稿有些收入，却很不稳定，一家人生活难免捉襟见肘。就在几天前，他接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寄来的一份聘书，邀请他前往北京大学任教。

事情虽好，但半农心里却十分忐忑：自己连中学毕业文凭都没拿到，竟然接到高等学府的任教邀请，他甚至怀疑起事情的真伪。其实，这与不久前他和《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一次单独会面有关。那次面晤，刘半农给陈独秀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恰好北大急需增补教员，校长蔡元培请陈独秀帮助推荐，陈便推荐了刘半农。就这样，中学未曾毕业的他竟然站上了北大的讲台。当时，执教北大的还有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刘半农教授的课程是诗歌、小说、文法概论等，虽然学历不高，但因有创作经验，在文坛有些名声，加之聪明善学，不久也就在讲台上站稳了脚跟。

刘半农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但在学院派主导的高校，一个连中学文凭都没有的人注定要受到质疑。一次，在讨论《新青年》编委人选时，胡适就直接提到了他的学历问题。刘半农的衣着装扮、才子习气也经常受人诟病，在多重压力之下，刘半农着实努力了一阵，终于考取官费留学去了。鲁迅后来说，“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

1920年早春2月，刘半农偕妻带女登上了日本货轮“贸茂丸”，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因为伦敦生活昂贵，一家人全靠半农的留学公费生活，日子十分拮据。半年后，朱惠又产下一对龙凤胎，半农把“伦敦”拆开给孩子取名，男



刘半农 1924 年在巴黎留影

孩名育伦，女孩名育敦。五口之家的经济压力更大，孩子连摇篮都买不起，刘半农便将一只装行李的柳条箱拆开，做成两个简易睡篮。

法国生活费用相对低廉，所以1921年夏刘半农偕妻子儿女转到法国，入巴黎大学继续深造，1925年在巴黎大学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也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成为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华人。这年秋天，半农告别巴黎，回国继续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系，这一回站在讲台上的他，有了底气。



《教我如何不想她》曲谱

演“双簧”成了新文化先驱

让刘半农名声鹊起的，并非语言学成就，而是他和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演出的那幕“双簧戏”。

1917年，醉心于通俗小说创作的刘半农偶然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受震动。他决定与旧文学决裂，投向新文学。1918年起，刘半农不断向《新青年》投稿，表达自己文学改革的愿望，并将自己用了多年、不乏艳俗的笔名“伴依”去掉偏旁，改为“半农”，以示与过去决裂。1918年1月，他的《应用文之教授》发表，正式署名“半农”。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受到新思想的感染，刘半农很快成了

新文化的急先锋。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在《新青年》发表后，社会反响不大，保守的复古派根本没有关注。为剧团做过编剧的刘半农于是想到了上演一场“双簧戏”，希望借此引发论争。他把想法告诉好友钱玄同，得到了炮筒子性格的钱玄同的积极回应。于是，由钱玄同扮演顽固不化的封建文化的卫道者，刘半农则扮演鼓吹新文化的革命者对其观点进行驳斥。

1918年3月，《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全信以文言写成，4000多字不着标点，以封建文化卫道者形象，历数《新青年》和新运动之“罪状”。同期，还发表了另一篇署名“半农”的文章《复王敬轩书》，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这场“双簧”二人一唱一和，在文坛引发了强烈反响，很快便引来了真“王敬轩”的发难，也引来了进步人士的喝彩。

刘半农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插曲。刘半农也因此蜚声文坛，被誉为新文化的先驱。苏雪林认为他“虽不足与陈、胡方驾，却可与二周（周树人、周作人）并驱”。

中文“她”字的首创者

刘半农出国时已30岁，携家带口，在国外生活苦不堪言，他一面咬牙苦忍，一面思念着祖国。1920年9月，他写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小诗，表达自己的这份眷恋之情：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不久，这首小诗被同在伦敦留学的赵元任谱成了歌曲，很快在国内传唱开来。从字面上看，《教我如何不想她》很像一首情歌，但实际上，“她”代表了祖国家乡，是刘半农在异国他乡思念家国的的心声。

诗中，首次出现了汉字“她”。原先汉字中第三人称本无男女之分，因此，翻译成外文时颇为不便，初以“伊”字作为女性指称，但“他”、“伊”发音不同，用时多有麻烦。刘半农将“女”字作为偏旁，首创“她”字，无论发音、形旁都很妥帖，很快便得到认可并载入了字典。

几年后，刘半农奉命接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那天，他穿了一件中式棉袍到校上课，女生们暗地议论道：“原先以为刘半农是一个很风 你们一天到晚不都在唱他写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吗，这就是他呀！”女生们连连摇头说不像。刘半农得知此事后，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调侃道：“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刘半农在巴黎学的是“语音实验”，这在当时是一门新的学科，因此他在这一领域无疑是国内先行者。除了“她”，刘半农还发明了“它”，

用于人之外的一切，后来也获得了广泛认可。在巴黎大学期间，他不仅加入了巴黎语音学会，他的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还荣获了“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归国之后，他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成立了国内首个语音实验室，并制订了一个宏大计划：完成《四声新谱》、《中国大字典》和《中国方言地图》编撰。然而，这个计划却因其英年早逝而未能如愿。

做事“出格”的文化名人

刘半农爱憎分明，个性张扬，为人处世也不拘常格。身为名作家、名教授，刘半农稿约不断，许多报刊杂志都以刊登其文为幸。一次，任职《世界日报》主编的老友成舍我见到他，抱怨他很久不给自己的报纸写文章了。半农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我的文章都是骂人的，你敢登吗？”成舍我答“你敢写我就敢登”。不久，半农果真将一篇讽刺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只念佛不做事”的文章《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交给了成舍我，《世界日报》照发不误。结果，戴传贤看到后大为光火，报纸被责令停刊三天。

刘半农和二弟刘天华，曾住在北京扁担胡同，对隔壁住的日本人和他的恶犬非常厌恶，对和日本人亲近的中国人也看不惯。好友周作人娶了个日本老婆，当时日本驻华机构为了保护本国侨民，在其住处专门挂上日本旗，周作人家门口也不例外。一次，刘半农去周家访友，刚到门口见日本旗立刻拂袖而去。回家后对人说：“周作人再挂日本旗，我就和他划地绝交。”

刘半农最“出格”的举动，当属采访名妓赛金花。一位著名北大教授采访一个名妓女，这么出格的事儿也就刘半农敢做。上世纪30年代初，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妓女赛金花的报

道，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这位既是“花船雏妓”也是“公使夫人”的传奇女子，有人将她褒为“民族英雄”，有人则抨击她出卖肉体灵魂。面对云遮雾罩的传奇女子，刘半农觉得应该趁其健在时，当面厘清真相。于是，他带着学生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赛金花的“江西魏寓”。年过六旬的赛金花，完全没有料到大名鼎鼎的刘教授亲自来访，激动之余，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了自己一生的经历。

“北大名教授采访名妓赛金花”一事在京城引起轰动，赛金花一时再成焦点人物。但这些资料在刘半农生前没能整理出版完整的著述，在他去世之后，随他一同前往采访的学生商鸿逵将其整理出版了《赛金花本事》，真实地还原了赛金花的样貌行迹，为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

1934年夏，听说刘半农不幸病逝，赛金花还着一袭黑衣专程前往灵堂吊唁。两年后，66岁的赛金花病逝。

考察途中一语成谶

1934年6月下旬，刘半农偕历史学家白涤洲等，一行数人，远足塞外，到归绥（归化与绥远的并称，今位于呼和浩特）一带进行考察。之后，一行又翻越大青山，抵达达尔罕茂明安旗的百灵庙。他们跨过艾不盖河，登上女儿山，夜晚，就歇宿于乡村土房。处于白草黄沙之野，居于瓮牖绳枢之家，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大家都挤在一张土炕上睡，刘半农自己则带了一张折叠式行军床，夜晚就支在屋子中央，独卧其上。生性诙谐的他在行军床上作仰天僵卧状，并玩笑地说：“瞧，我这是停柩中堂啊！”

考察结束，返回归绥。应绥远中山学院院长

张国宝之邀，刘半农欣然应允为师生们演讲。据当时的听众回忆，当时刘半农身着春绸长衫，平头，神采奕奕，侃侃而谈，学识之博，思想之新，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座中谁也未尝料到，他的这次演讲竟然成了谢世之音。

据张国宝院长回忆，刘半农讲演时，他看到有一只虱子在刘先生的头颈间爬来爬去。当时，归绥正流行回归热病，虱子就是传染媒介。但当时张院长碍于场合，未及时提醒半农。他不敢断定后来刘半农罹患回归热，是否是由虱子叮咬所致。总之，刘半农刚回到北平便因回归热症而病倒，病势凶猛，不久即病逝。“虱子咬死刘半农”，成为人们一时热议。

刘半农病逝的消息和他在百灵庙考察的通讯，在同一天的天津《大公报》刊出，他那句“停柩中堂”的戏言，不料竟成了自己的谶语。

庄若江 女，江南大学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爱国高僧——巨赞

||| 封志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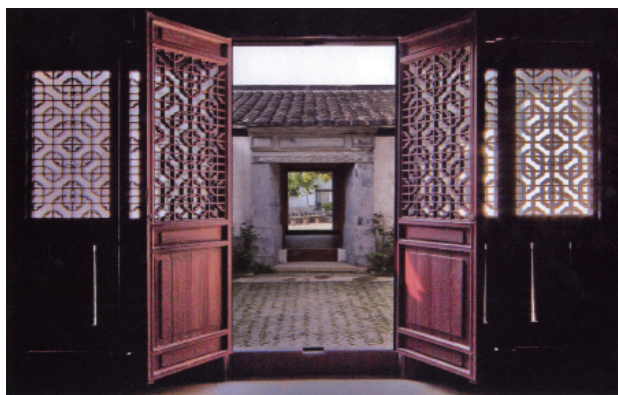
巨赞法师 (1908—1984)

七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的开国大典，为中华民族开辟了新纪元。天安门城楼上，数百位开国元勋和各界代表人士济济一堂，其中唯一的一位僧人就是巨赞法师。年轻时，他敏而好学，投身爱国进步活动，挣脱追捕，遁入佛门；抗战中，他主编《狮子吼》，发动、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战救国；新中国成立前，他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此后，他长期领

导中国佛教协会，致力佛教改革。周恩来曾为其题字“上马杀贼，下马念佛”，弘一法师评价他“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太虚法师则说他是“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

一个和尚却一生传奇，巨赞是谁？

不久前到江阴出差，热忱的江阴朋友带我去赞园寻找答案。



巨赞故居

赞园位于城东的贯庄，是为纪念巨赞法师，在其故居的基础上建造，并不大，紧凑、精致，透着主事者的用心。展厅中陈列着巨赞法师的一些遗物、手稿，介绍着他的生平、他的故事，诉说着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展厅里一整面墙上，叙述着巨赞与各界名流的交往，田汉、夏衍、柳亚子、聂绀弩、关山月、尹瘦石、饶宗颐、觉光……

漫步赞园，行走在故居之中，追寻巨赞的足迹。这里是他的故乡，在这里他出生、长大，直到21岁到杭州出家。而在往后的岁月里，故居屡易其主，亲属皆已零落，他再也没有回过这片土地，出家后再也无家，往事已如云烟飘逝。但是在这里，聆听贯庄村老书记深情的讲述，却又分明随处皆可触摸到巨赞的气息，仿佛他从未远行。

1908年的中秋，这个殷实的农家是喜庆和忙碌的。潘家喜添一丁，这是他们的长子，务农兼做粮草生意的父亲，对这个儿子的出生，显然抱有极大的希冀。他给孩子取名潘楚桐，字琴朴，名字文气十足，许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诗书作伴，以文求仕。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巨赞法师，他没有以文求仕，却走上了一条以文弘法的路，终究不脱“文”字，这大概也是一种宿命。



贯庄旧影

贯庄人重教育，潘家也有着耕读传家的传统，巨赞先入私塾，后入贯庄小学，再入江阴师范、大夏大学，小院留下了他求学的足迹。诸子百家、四书五经，巨赞广泛涉猎，打下深厚旧学根基，对老庄学说，钻研犹深。因母亲徐氏笃信佛教的缘故，巨赞开始接触佛教典籍，对佛教呈现出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巨赞接受到一些民主、自由的新思想，他办刊物，排短剧，议论国事，针砭时弊，书卷之中多了激越，多了责任。

小院见证了巨赞的彷徨与苦闷。巨赞是多愁善感的，父亲饮酒赌博，不务正业，家道中落，母亲因病离世，这些都令他伤心迷茫，感慨人生无常。巨赞自就读江阴师范，即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从大夏大学学成回乡，担任金童桥小学的校长，更秘密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负责开展革命宣传工作，遭到国民党省党部的通缉，只能避难他乡。革命处于低潮，人生往何处去？显然给巨赞出了个大难题。山间痛哭，田埂吹笛，树下独酌，反映巨赞当年困惑的这些故事，至今仍流传在江阴乡间。

大概是受到母亲的影响，巨赞最终选择了遁入佛门，出家出世，希望在佛门中寻求心灵的安宁。这是个挣扎的过程，从1927年到常州清凉寺出家未成，到1931年在杭州灵隐寺从却非法师如愿出家，前后四年。其间，在大夏大学与田汉相识，受其影响，同情革命，投身革命，在杭州遇太虚法师，写出家志愿书，赴闽南佛学院参研佛经，一心向佛，出家之志弥坚，两条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路，统一在了巨赞的人生追求中，并伴随着他一生。逃避追捕，遁入空门，最终完成了巨赞的道路选择，偶然中有着必然。佛教一方面教人自救自度，另一面又要求行菩萨之道，以慈悲的情怀入世，普度众生，在众人的事业中求得自我的新生。这些都契合着巨赞。



巨赞（右）与赵朴初

正是沿着这条路，巨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二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谈及佛教与社会的互动，我们习惯于提起太虚大师，谈及个人修持，我们经常说到弘一法师，谈改革开放后的佛教，赵朴初自然绕不开。巨赞似乎可以绕开。但是，走近他，观照他所走的路，观照百年来佛教所走的路，却可以清晰地发现，巨赞绕不开。你可以不知道巨赞是谁，但你所看到的现代佛教，却又处处见到巨赞的思想之光，看到巨赞的努力。作为大学问家，巨赞法师是“现代新佛学”奠基人，作为佛教界的改革家，他是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开拓者。

巨赞是佛教界的学问家。信仰层次低、迷信盛行是佛教的一个老问题，知识界的远离是其重要表现。巨赞旧学功底深厚，关心世事，悟性极强，自入佛门始，即以改革佛教为己任，力图改变佛教注重经忏、因循苟且、故步自封的现状。他两入欧阳竟无创办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广为游历，向太虚、肇安、玉桂、印光、却非等大师求教，赴重庆汉藏教理院、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参研，遍览群经，参究法义，前后读经八千多卷，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读经笔记，弄懂弄通了大量的

佛学问题，对佛学下的这一番苦功，使他弄通了佛理，求得了“安心做个佛教徒”的内心宁帖，同时，也使他学问精进，成为横跨佛学界和学术界的人物。发表《先自度论》被人误以为是弘一法师所作，待弘一见到巨赞的另一文章《为僧教育进一言》，喜出望外，不禁赞叹，认为“求诸当代，未有匹者”，专门赠书法条幅，以“上志景仰”。研究熊十力文章，发表《评熊十力所著书》，震惊了佛学界。熊十力读后盛赞该文“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主编《狮子吼》《现代佛学》《法音》等杂志，发表《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新佛教概论》《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为新佛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卷》，包含理论、历史、经籍、史传、宗派、人物、制度仪轨、文化艺术、圣地等多项内容，呈现出他的识见，架构出一套完整的佛学体系。

巨赞是佛教改革家，是新中国佛教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对于解放前佛教界的现状，他深怀不满，呼吁革新，提出将“学术化”和“生产化”作为改革目标，并身体力行。但他深知，社会经济基础未变，谈佛教改革“空言无补”，新中国的成立，使他有了实践自己理想的机会，自觉“二千年佛教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事外任其生灭乎”？他起草了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义，起草了改革佛教的意见书，上书毛泽东主席和各民主党派，他还就收回广济寺、创办佛教刊物、筹办中国佛学院、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不辞辛劳，协调各方，多方奔走，竭力促成。1953年始，他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更是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新中国佛教走上一条新路劳心劳力。



巨赞创办的《狮子吼月刊》

作为僧教育家，他注重僧才培养，以“学术化”和“生产化”为目标，设置课程，制定教学计划。注重开放式和启发式教育，要求学生不仅要勤读佛书，而且应把大量学习时间放在文化知识方面，尤其要多读文史哲等方面的书，认为“水涨才能船高”，只有深入了解“世间法”，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出世间的佛法。注重培养僧人具备工、农、商、学、医等各方面的技能，寓修持于劳动中，创建“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劳动自养，开创了都市僧尼工禅并举之风。作为佛教界的社会活动家，他多次出国访问，频繁接待各国佛教界来访，展示了新中国佛教的新形象。

三

看破红尘，出家事佛，是巨赞自己选择的生命状态，但他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践行着“出家而不厌世，出世不忘救世”的大乘精神。

他以曾是革命者为荣，虽入空门却不曾停止对革命的同情和关注，不曾因一袭袈裟而稍减其爱国之志。正像他在一首诗中写到的，“革命未成谋未就，慈悲端不让前贤”，在他看来，革命与慈悲是统一的，出世与入世不矛盾。

抗战爆发，日寇南侵，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槛外人也无法置身事外，巨赞痛心疾首，无比愤慨，寄望“良将”、“硕儒”来拯救国家的危亡，同时反躬自求，向佛道中人呼吁，“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他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将讲经弘法的佛堂，变为申讨日寇、动员抗战的讲堂，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他大声疾呼：“佛本慈悲，但当今妖孽横行，日寇逆天行道残害生灵。佛亦要作狮子吼，降魔灭邪，以正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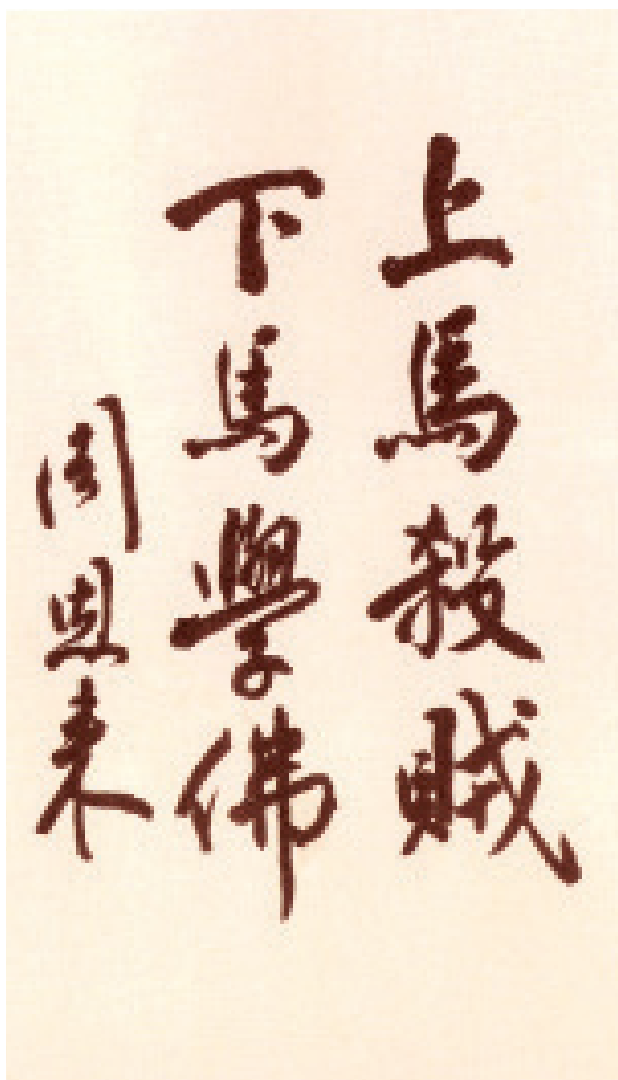
吃斋念佛的僧人，也投入到抗战洪流中，诠释着全民族抗战的主旋律，无疑是吸引眼球的。巨赞推动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组织“和尚兵”宣传抗战，成为轰动全国的事件。1939年，在南岳上封寺，由故友田汉引见，巨赞见到了叶剑英，“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叶剑英的话鼓舞着巨赞，他挥毫写下了“身在佛门，愿不惹人间是非；国有大难，今显出炎黄本色”的对联，言明心志，提出救难不忘修道，修道不忘救难，与一千爱国宗教界人士一起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动员南北佛道教徒立即行动起来，走出寺观，投身战斗。随后又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分赴长沙、湘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沿途贴标语、发传单。标语中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一类结合佛教教义宣传民族气节的口号。人民群众称呼他们为“和尚兵”。田汉用诗热情地赞扬他们是“僧衣脱却着缁衣，

敢向人间惹是非”。周恩来则为之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巨赞言辞激昂宣传抗日，又与共产党人过从甚密，自然引起国民党特务的仇视，他被追问与徐特立等共产党人的关系，巨赞坦然回答，“他讲唯物主义，我讲唯心主义，如此而已。”他被捕遭毒打，一些守旧僧人也对他寻衅攻击，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艰难脱险后到桂林，任月牙山寺住持，并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他抗战激情不改，以寺庙为掩护，保护了大批进步人士。与道安法师创办并主编佛教界进步刊物《狮子吼》月刊，继续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和佛教革新理论，发表了《佛家之救亡抗战论》《致抗日将士慰劳书》等著名檄文。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巨赞避居桂平金田乡山脚村，随村民至瑶山见瑶王李荣保，出谋献策，伏击日军并大获全胜，歼敌百余，战后他写下《瑶山十日》和《石崖塘夜战》，记叙了那惊心动魄的战斗。

抗战胜利，巨赞回到杭州灵隐寺，后飘然离杭，往返于港澳台浙，积极配合全国解放。他不畏艰险，帮助李济深带密信给软禁中的陈铭枢、郭春涛，邀请陈等赴港商讨改组国民党，筹建民革。1949年9月，巨赞法师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巨赞法师和赵朴初一起，作为佛教界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抗美援朝期间，他发表演讲，号召佛教徒捐献飞机。他深感“天下事了犹未了，切不可不了了之”，主动融入社会，建言献策，关心世事。他历任新中国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被选为常委。

才华横溢、热心世事却是空门中人，不少朋友为他惋惜，劝他舍戒还俗，巨赞婉言谢绝，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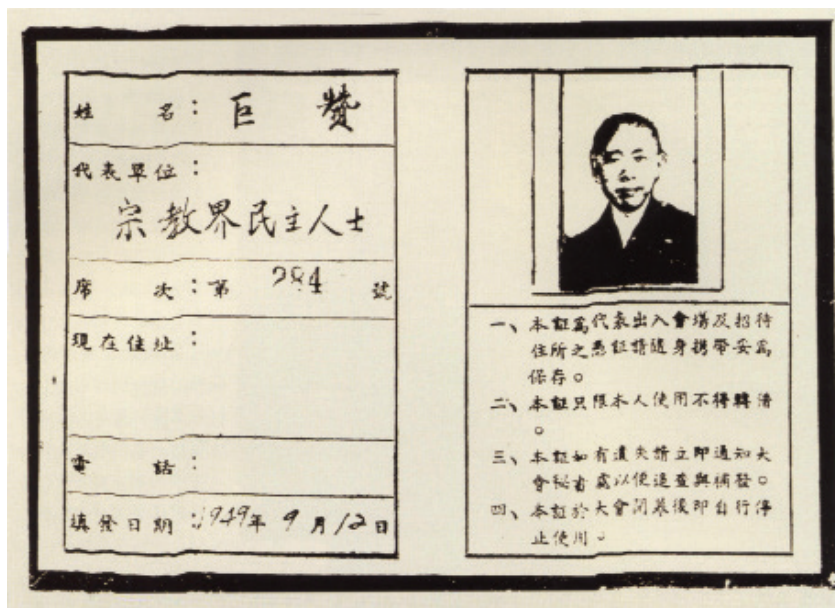


周恩来为巨赞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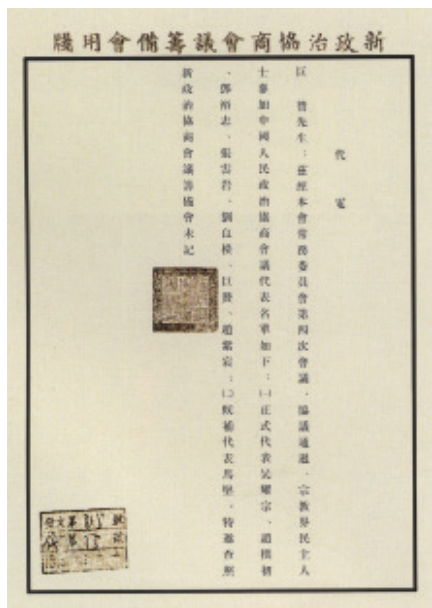
认为革命路不是一条，身在佛门，同样可以为社会工作，他已经习惯了青灯伴佛。

四

“苦行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说的是出家人生活清苦，封闭孤独，得过且过，度日如年。似乎选择出家，也就远离了生命的精彩，选择了自我的封闭。巨赞给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出



1949年9月，巨赞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家生活样本。生活可以清苦，但不能不精彩。他生活的亮色和温度，来源于“诗书溉心胸”，也来源于他“高大上”的朋友圈。

巨赞当然是精彩的，诗书的浸润，使他获得了精神的自足，也使自己收获了一众志同道合的朋友。巨赞善文、好文，喜用文字表达对国事、佛事、天下事的爱与忧、悲与喜。佛学著作等身，显示着他不同凡响的佛学造诣；而大量的诗词书札，展示的则是他的生活，他的喜怒哀乐，直观地展现出他的“诗书人生”。桂林漓江边的雅集唱和，令人神往。在那里，巨赞与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弩、郭沫若、柳亚子、端木蕻良、廖沫沙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时相往来，过从甚密，集会议事，互有酬唱。终巨赞一生，他都珍惜和保持着与这些文坛巨子的友谊。

文人气质的巨赞，却又是具有侠士气的，峨眉派临济宗是南宋时白云道士所创，由道入佛，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一直有着神秘的面纱。抗战时期，巨赞巧遇了临济宗衣钵传人周潜川，上世

纪五十年代更与其长相切磋，得赠《峨眉宗莲花宝笈》，依教规，谁获得宝笈，就等于被授予了掌门人的封号，巨赞获得宝笈，同时也获得了峨眉派临济宗第十二任的掌门人身份。这故事看似天方夜谭，透着一丝神秘，对巨赞，则更增一份神奇。强身健体的功法，养生学问的研究，与一切新知识一样，正是巨赞所关注的。

1984年，巨赞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博学”构成他生命的底色，出世却不入世的追求成就了他不朽的传奇。“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万古愁”，这首诗，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封志成 男，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江苏发展大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省海外联谊会秘书长。

百年宋文治

||| 周和平



宋文治 (1919-1999)

1919年10月28日，宋文治出生在江苏省太仓县。

百年风云激荡，文化薪火相传。回望百年，“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的历史进程的帷幕，中华文化在历经磨难中倔强生长，作为独具文化意蕴的中国书画艺术，也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

在历史的演变和时代的推进中，宋文治成为了20世纪中国画的一位大家。回首寻觅，我们看到了他为艺术艰难跋涉、奋力前行的坚毅足迹，也看到了他描绘的一幅幅瑰丽多姿的画卷，接续了文化正脉，留下了时代笔墨。在他百年诞辰之际，让我们缅怀他，感悟他，纪念他。

玉汝于成

宋文治是个从育婴堂抱来的弃婴，他本人对此并不讳言，多次提到自己是“螟蛉之子”。他在成年以后也曾设法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终不可得。

抱养他的宋家住在太仓西郊镇中街，这里有一条与娄江相连的致和塘通向县城，宋家临河赁房而居，沿街开了个小面馆维持生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农村的凋敝，加上养父宋梦周不谙经营，小面馆逐渐难以为继。贫贱夫妻百事哀，养母马杏梅经人介绍去上海帮佣，并从此与家里基本断了联系，直到30年后



宋文治《广州造船厂》40cm×28cm 1960年

宋文治将她接到身边。

对艰苦困厄的少年生活，宋文治多年以后曾有沉重的回忆：“我是一个出生在贫困家庭里的孩子，在旧社会受到经济的压迫，受到失学的痛苦，因付不出房金（租），受到地主强迫迁屋，自己东奔西跑找亲戚找老师帮助，我才有了继续求学和工作的机会，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我的艺术生命。”

生活关上了一扇门，艺术却为他打开了一扇窗，唤醒他艺术生命的是什么？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是娄东文脉的丰厚积淀，当然还有当时的教育风习。自1917年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一说，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民国初年的美术教育课程成为培养学生全面人格的重要一翼。宋文治后来回忆，13岁那年在家乡娄江边上，见到乡邻叶姓人家亲戚——苏州美专学生写生的情景，让他叹羡不已，这几可视为他艺术生命的一个燃点。

画画，成了少年宋文治最强烈的精神寄托。从烟标到芥子园画谱，他在描摹中寻找比现实生活美好的世界，也磨练自己笑对人生的坚毅性格。17岁那年，他来到上海秀棠广告社当学徒。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海派文化发展的巅峰时刻，在大新公司、永安公司的画廊里，他在齐白石、张大千、任伯年、吴湖帆等人的作品面前细细揣摩，不忍离去。他用喝开水就烧饼省下的钱去买了一本本珂罗版的旧画册，在斗室中苦苦临摹，这成为他习古的开端。

战事频仍的三十年代，宋文治为生计辗转上海、苏州城乡，当过眼镜店伙计、点货员和小学教员。1941年，他偶然得知因抗战搬到上海的苏州美专在招生，求学的念头强烈地折磨着他，但生计无着，学费又从何而来？他的一个在上海租界公务局服务并开小店面生的表姑夫许子权



宋文治《桐江放筏》84.4×47.2cm 1956年 中国美术馆藏

先生，和同样做些小生意的顾姓亲戚施以援手，使他得以入学。这样的恩情让他永志不忘，十多年后，当他的作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在江苏省获奖以后，他兴冲冲地赶到上海送给姑父，报答当年之恩。

在美专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但接受的却是正规而系统的教育，校长颜文樑先生和一批优秀的教师，在租界一隅为苦难中的祖国培育美术人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难以为继，宋文治只得回到家乡，直到抗战胜利后，以交作业记学分的办法完成了他在美专的学习。他

所学的色彩透视、写生素描等技巧，对他以后的国画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经乡贤唐翔伯先生介绍，宋文治到邻近的嘉定黄渡师范（后改名安亭师范）任教，又兼震川中学课程，后两校合并，他继续当美术老师又兼总务主任，总算过上了清贫但相对安定的生活，也开始了广求敏学、转益多师的艺术生涯。

他最早的投师学艺，是于1942年在上海拜见同乡朱屺瞻先生而起。出于对同乡后辈的赏识和提携，朱屺瞻又出资设宴，为他介绍张石园先生为师。在安亭，一个偶然机会与陆俨少先生相识，并经陆俨少介绍拜吴湖帆先生为师，这让宋文治学习传统的“师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能够有得传统真趣的大师巨匠的悉心指点，让他既可以不走弯路，直入堂奥，又可以领略对传统“化”的妙境。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画开始在服务政治、反映生活中进行改造和变革。这个过程缓慢而艰辛，画惯了传统的高士古松、幽山静水的笔，要反映现实生活并不容易，许多旧瓶新酒式的标签图解，是当时的通病。1956年，宋文治随陆俨少与徐子鹤、孔小瑜有过一次安徽之行，此行写生所得的两幅国画入选全国美展。其中的《桐江放筏》更是在《人民画报》上跨页发表。画面上，青山迢迢，江水泱泱，一排长长的木筏蜿蜒而行，撑筏人与岸上植树工人互相呼应。整个画面充满生气，正契合了时代的审美需求，也因此成为推陈出新的新山水画代表作品。

在画坛上崭露头角的宋文治得到前辈们的嘉许，吴湖帆曾推荐他加入上海画院而不得，后经刘海粟的推荐，1956年，他成为了正在筹建的江苏省国画院的一员，自此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

金陵中坚

继上海、北京以后成立的江苏省国画院，是当时江苏省委颇有卓见的一个自主作为，广揽画坛精英人物，一批经典作品应运而生，并由此产生了江苏省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大成果之一——“新金陵画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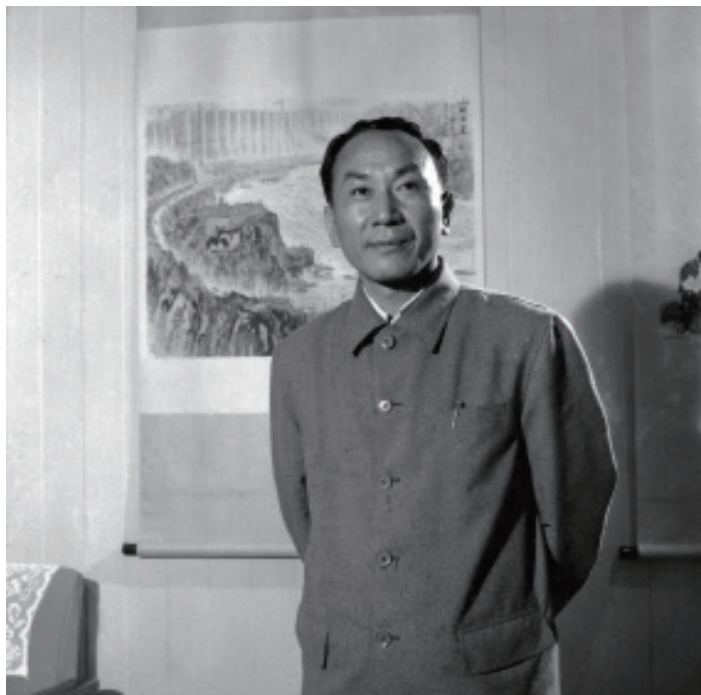
进入国画院以后直到“文革”爆发，是宋文治创作的一个黄金时期。一方面与同事们切磋共进，并得到傅抱石、钱松岩等大师名家亲炙；另一方面，时代的需求也催生出新的创作灵感和机缘。

1960年的二万三千里写生活活动，是写入新中国画史的一次壮举，是对探讨中的如何用传统笔法反映现实题材的一次集体破题，也标志着“新金陵画派”的形成。宋文治在途中创作的《山川巨变》（手卷），显示了他娴熟的技巧和精巧的构思，全景式的展示，有情有景，见笔见墨，成为建设主题的大胆而完美的呈现，也使之成为经典作品。此行，宋文治还创作了其他一系列作品，如《西陵峡》《成都杜甫草堂》《广州造船厂》等，在其后的全国展览中受到很高评价。1963年，他的第一本画册正式出版，随后中央新影厂拍摄国画电影时又呈现了他的《山川巨变》，他从此脱颖而出，成为“新金陵画派”的中坚力量。

那套画册由中国美协选编，所选甚严。宋文治画册封面是请吴湖帆先生所题，钱松岩先生在序中对他的艺术风格做了中肯的评价：“文治同志的绘画风格清新隽秀而不纤佻，隽秀中又有苍沉，用笔、用墨、设色、构图等多见巧思。”

儒雅谦逊的宋文治在艺术上却是大胆的，60年代初，他的笔开始伸向了他熟悉而又热爱的领域——画江南，画太湖。他所选择的江南从太

1960年，宋文治在画作前留影。



宋文治《山川巨变》77cm×98.5cm 1960年





宋文治《江南春朝》1962年

湖波影到枕河人家，从杏花桃花到黛瓦白墙，从欸乃小船到湖石坡岸，写尽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韵味。这些极具象征意义的物象所组成的江南景象，是中国山水画中一个永恒的象征，人送雅号“宋太湖”，他是当之无愧的。

从此，在宋文治的绘画中，一直有着两副笔墨。一副是描绘主题遵命而作，但并不妨碍他创造出一幅幅佳构，他对传统和创新一直遵循着自己的观念，他提出的“两下”——“下生活、下基本功”的理念，成为他的不二法门。他骨子里流淌的江南情致，深厚的传统功力以及对浅绛和小青绿的运用，让他的笔墨始终收放自如，从容不迫。另外一副笔墨即是他的描摹自然风光尤其是江南风景的部分。即使在“文革”中，他被迫搁笔多年重新恢复创作的1970年代初，他合作或创作了一批诸如《向阳湖畔》《南京炼油厂》主题性作品，也有描摹自然风光的《太湖新装》《太湖清晓》，偶尔还有如《水乡春暖》这类笔调比较轻松的作品。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对传统的召唤和西方文化八面来风中，经历过严酷时代的老画家们大都是在自己热爱并熟悉的领域展示，他们愈老愈精的艺术理所当然风行于世。宋文治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和热捧。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宋文治可以在熟练的笔墨熟悉的题材上享受功成名就。但他偏不，他说，要老而思变，老而出新，在老而秀丽中表现时代美感。

宋文治的创作风格开始逐渐嬗变，他笔下的江南、峡江、黄山有了新的美学风格，写意精神在他的作品中更为充分。同样是江南和太湖，《洞庭山小景》《李花春雨江南》等一批作品，意境空灵，画面唯美。他的《黄山石笋峰》《黄山晴雪》《轻舟已过万重山》等彩墨相间作品相

继问世。接着，他开始了小泼彩的尝试。随着《秋江晓泊》《白云高秋》《幽涧图》等一批作品的成功出现，象征着宋文治衰年变法的成功，实现了他艺术上的又一次超越。

他的彩墨和小泼彩，很明显是受到了张大千、刘海粟也包括刘国松以及当时并不知名的青年艺术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有限的，更多的只是启示作用。宋文治在“小泼彩”上进行从“写”到“泼”的过渡，利用泼彩、拓印所产生的偶然的随机的效果，再用传统笔法加以收拾，让“笔写”融入“泼彩”中，使其不仅具有形象的唯一性，而且强调了“彩”的润化与空濛，达到了国画和西方水彩画的融合，让人一看还是中国画。有论者将这些作品称之为“新型的意象美”，“老而愈笃，老而求变，这是真正成熟的艺术大家才能具备的品格”。

江南雅士

宋文治在他的晚年，提出了要温习传统，重新补课，并创作了一批传统笔意的作品。他的这一想法，是在他的变法已经获得很大成功的基础上，而且，也正是传统在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他这一时期的温古作品，如《万壑松风》等等，尤其是许多黄鹤山樵笔意，尽得元人意趣。同时，他也是以此表达对民族传统的敬意。

他在去世前一年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中国人不晓得中国的传统怎么行？传统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传统，那民族的艺术不会立足于世界。

一定意义上说，宋文治晚年对传统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画的领域和技艺的层面，他所呼唤的是对祖国文化传统的重视，并以此传播中国文



宋文治《太湖清晓》82cm×148cm 1973年

化，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

其实，宋文治本身就是颇具传统意味的文人雅士。在当代中国画坛，几成绝响。

宋文治广交友朋。择友之道，友直、友谅、友多闻，宋文治为人重信义，在乡间时所交者大都是地方文人或乡间士绅，他们对乡村文化的延续和社会群落的聚合极有作用，江南自古风雅，宋文治的文化底色皆源于此；及至后来，宋文治的朋友圈逐渐扩大，大多是画坛书坛艺坛中之翘楚，志趣相投、性情相悦，交游唱和间，于艺事有大益处，也为中国画坛留下一段段难以复制的佳话。

宋文治的收藏、戏曲、美食、园艺和手工等癖好，尽显其性情。他的收藏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开始当在有意无意间，进入国画院以后，

他便醉心于此，或节衣缩食地购藏，或以画易画，集腋成裘，蔚为大观。宋文治的收藏大多为近现代画家，以册页、扇面、手卷等为主，除陆俨少外，他的齐白石、谢稚柳、陈佩秋、朱屺瞻等都成系列。在长期的收藏中，他的鉴赏能力大为提升，得到谢稚柳、徐邦达、启功诸位先生首肯。

宋文治是位公认的美食家。笔者听几位中国顶级厨师言：宋老对美食的研究，早已超越了菜肴本身，进入了真正饮食文化的层面，他的“味道中心论”深得人心。画家嗜好美食者有张大千、傅心畲等等，但如宋文治这样折服各方口味者又有几人？也正如他对戏曲的爱好，画家中票友者众，精深者难。宋文治不满足于此，他昆曲要学俞振飞，评弹要听杨振华，京剧要交张



宋文治《黄山晴雪》43cm×77.5cm 1977年

君秋……画画时，他听程砚秋的《荒山泪》，上台，他演小生潘必正，这才是风雅。以至他和同样懂戏的李瑞环一起谈戏时，谈兴遑飞，才有后来李瑞环对宋玉麟说的：你父亲是真正懂戏的！

晚岁，除醉心于小泼彩和常画常新的太湖、黄山、峡江以外，他还迷上了花鸟、书法。他早年以花鸟为主，曾受教于蔡铎先生，现存的《和平鸽》，工致灵动，满羽祥瑞。晚年他喜作鱼图，有以虚谷法所作的金鱼，还有得黄独峰法所作的神仙鱼，画得丰腴有致，色彩斑斓，真是惹人喜爱。他的书法，远接二王、宋赵一路，近承吴湖帆，文雅秀丽，全无匠气。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宋文治仍在北京、深圳、太仓、上海和南京之间奔走，参加文化活动，会会老朋友，并应邀作画，今天，我们仍然可

以在这些地方的一些重要场合，看到他的精美山水。到他去世之时，北京尚有一幅未能完成的山水大画。

松石长存

1999年8月10日凌晨2时47分，宋文治驾鹤西去。8月14日上午9时，各界人士千余人到南京石子岗为他送行。

宋文治擅作松石图，极具元人高古之气，其上常题老师吴湖帆所赠的“松岂无骨，石亦有姿；唯此两者，是为相知”句，这也是宋文治人格的写照。

宋文治数易其居，均以“松石斋”命其画室。早年住南京东箭道“总统府”偏房，房屋局促，



宋文治《黄山石笋峰》27.5cm×38cm 二十世纪80年代



宋文治《金陵新装图》31cm×127cm 二十世纪60年代

难以施展；1981年后搬入文昌巷的民国老宅，此时他开始在阳台侍弄花草，室内已是“窗明几净，纸墨精良”；及至1989年与宋文治艺术馆同步建成的太仓“松石斋”，小小院落，有石有松，还有修竹繁花，总算名如其实。1997年3月14日，与他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太太杨冰去世，他精心绘制松竹图寄托思念，并一直悬挂在他的松石斋中。

在宋文治百年之际，我们在总结他的艺术人生的时候不难发现，他不仅仅是秉承传统、出新求变的艺术家，也是长于管理、身体力行的实干家，更是作育人才、传播文化的教育家。

从太仓到安亭，宋文治执教十余年。他对中小学美术教育颇有建树，强调以美育化人，陶冶情操，培养兴趣，重视基础，昔日学生提及当年老师风采，仍有桃李春风之感。他任总务主任，管理井井有条，学校新建，规划设计，施工建设，

乃至园艺布置，都是悉心而为。1948年，为改善学校办公条件，宋文治日夜作画百余幅进行义卖，将所得款项用于建设教师办公用房，并命名为“松隐庐”。现在房子虽然改建易名，但旧迹尚在，石碑犹存，人们不会忘记。

二万三千里写生活活动，宋文治不仅创作成果丰硕，还是一行十三人的“后勤总管”，协同保障了历时三个月遍及六省十一市的写生行旅。“文革”后期，宋文治担任省美术创作组副组长、1977年省国画院恢复时担任副院长。他全力辅佐负责实际工作的亚明，一起走过了画院恢复重建时期的艰辛道路。

让更多的人得到文化的滋养，是宋文治的一个心愿。他在省国画院、省美术馆都留下了一大批作品，1989年，他把自己的作品59幅和古代作品30幅，以及30件古陶瓷捐给了家乡的“宋文治艺术馆”。其中大多为他的代表作，以及文





宋文治《春风绿遍江南岸》45cm×60cm 1990年

徵明、董其昌、郑板桥等人的精品力作。30年来，这座优雅的艺术馆成为市民们的一个文化场所。在常熟虞山，他捐资并设计建造的“松风亭”，遍镌名家手迹，成为江南名山新的文化景观。

宋文治还致力于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频频出国出境，第一次走出境外是1979年4月去香港，与亚明和荣宝斋的侯凯、王大山一起，去参加由荣宝斋和香港集古斋举办的“金陵八家”展览，以后又去过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展览或考察或讲学，让观者听众直接感受中国书画艺术的无穷魅力。

1999年春节过后不久，宋文治被聘为省文史馆副馆长，这是党和政府对这位连续担任过四届省政协常委的党外老朋友的一个政治荣誉。

宋文治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在病房里还曾画了两张小画，依然画的是太湖。太仓宋文治艺术馆的庭院中，安放着宋文治的骨灰，实现了他落叶归根的愿望，他的

铜像微笑着注视着家乡的土地——这块土地，诞生过朱叔重、夏昶、仇英、王时敏、王原祁、朱屺瞻等历代绘画大师，给予他深厚的艺术底蕴和不竭的创作源泉，也铭刻了他与命运抗争的不屈努力和成长履痕，记录下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艺术在时光中永生，宋文治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见证了中国画的起落沉浮，他以巨大的艺术勇气和作为，矫矫不群，自成一格，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创新发展的一位开拓者和引领者。他的艺术人生，也如松如石，长存世间人心。

周和平 男，《雅集》顾问，著有《宋文治传》。

海读言恭达

||| 卞毓方

言恭达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主席兼高等书法教育分会会长，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顾问。



言恭达

又到了晚读的时候。

地点，照例是舱房阳台。阳台虽小，仅两三平米，勉强搁两椅一桌而已，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是加勒比海热带的孟春，花是游轮激起的哗哗浪花，海面有清风，星空有朗月，值此良辰美景，正好拿它作书房。

今晚读的是言恭达的《抱云堂艺思录》。出发前数日，收到此书，略翻一翻，觉得颇能补己学养之不足，就顺手塞进了行李箱。

言先生是艺术家，主攻书画印。当代诞生了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艺术家，我有幸见识过数位，我是艺术的乡巴佬，通常不会评价他们的优劣。一是藏拙，看不明白；二是也实在不想捞过界。我坚守本位，我的着眼点在人，在人与人之间的万有引力，艺术的高下，离不开人的质量。

我看人，首先看他们的气。气这玩意很玄，易被当作旁门左道。那么就说说看文吧，我首先看标题，标题就是文章的气。进而说看一本书吧，我着重看它的思想，思想就是书的气。再进而

说到言先生的这本书，内容为艺思，体例为断想，没有目录，但有前言，题为“我说抱云堂”，开门见山，开宗明义，这就是言先生的气。

言先生自述从艺半个世纪，最先自题自刻书斋名为“寒斋”。那时他尚未出道，喻车胤之囊萤、孙康之映雪，取其清贫恬淡、秉志磨砺之意。后来，人到中年，积学初展，遇名师沙曼翁，怜其才，题赠“清风明月之庐”。言先生释之“句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自警自策胸中务去俗气，笔下乃得真逸也”。按，前引“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语出司空氏之二十一品“超诣”篇，其间并无明月，沙曼翁赠之，或许是从第五品“高古”篇“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化之，亦未可知。然言先生喜欢“超诣”胜过“高古”，也是孺子可教也。又后，进入天命之年，功业有成，艺术大进，迁入高轩华屋，自诩为“抱云堂”，延接《二十四诗品》中“超诣”之深层意境。这下实至名归、名正言顺了。如司空氏之隽语：“匪神之灵，匪



言恭达 草书 许国静心联



言恭达书法作品

几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

言先生自叙：

常有友人问及“抱云堂”之说，曰：“云乃大气，何以得抱焉？”我笑答道：“此昔日‘清风’，今日‘白云’皆超妙者，清风将白云而与归更超妙矣。归者，归太空也。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岂不更超诣乎？”“抱云”之意，追求更

高意境与品位。古人推“超诣”为第一等。“超诣”较“自然”更进一层。“自然”只在本位，而“超诣”则意味无穷，更含绵邈于“自然”之外。

抱云揽月，乃仙家之气象。月既可揽，云当可抱。言先生自谓：“我恋古，但不守旧；我天天与古人对话，但又时时吸收时代的新鲜空气。清逸、蕴藉、浑朴、平和、简静是我五十年来



言恭达 隶书（汉简）自作诗《论书·傅山》

砚边探索的艺术风格。”

清逸，清新俊逸。如谢榛（明）《四溟诗话》“清逸如九皋之鸣鹤”；如杜甫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如东坡《赤壁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蕴藉，含而不露。书法就是一根接一根的线条，简单之至，在毛笔为王的时代，凡识文断字的都能要。你心头藏着的丘壑，血管流动的情思，腕底具备的功力，都会在毫端毕现。常有胸无点墨者整天傻练，以为功到自然成，殊不知诗在工夫外，书法也在工夫外，文化修养是第一位的。近日，言先生曾有一阕《满庭芳己亥初日牛首踏雪》示我：“一段香飞，三分白逐，旖旎烟袅梅魂。素虬垂袖，劳燕蹴柴门。安得貔貅百万，破空净，玉簪琼园。凝眸处，苍穹著色，高阁紫云吞。方墩。钟磬杳，巍峨佛殿，正律恒存。诵瑶章经典，启智寻根。曩昔兴衰若梦，苍生系，忧乐凉温。镌新谱，沧桑禹甸，青史百年论。”这就是作者的内含，更是书法的内涵。

浑朴，浑厚朴实。既要清逸，要蕴藉，又要浑，又要朴，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很难。大抵浑金璞玉，还在大荒山无稽崖偃卧着，一入红尘，就难免沾染腥气俗气霉气。言公以浑朴为艺术追求，着实可敬可佩！

平和，这是心平气和的境地。少年要拏云，老年要抱云，从前不宜做，或做不到，现在应该做，努力做。我见过若干“名家”，七老八十了，还在计较着老子天下第几，肝火一触就像火山爆发。这都是叫名利害的，不要到市场去找治疗方案，去问问中医就得了。

简静，简约沉静。这是继前四项一路走下来的，即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道至简。难矣哉！上述五项，以一为目标，就很可观、可贵，言先生五箭齐发，是拿定了主意要向“超诣”看齐。

言先生又讲：“对于书画印，我的美学思想是追求‘清、拙、厚、大’。”此四条，与前五



言恭达 草书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1998 年

项，字面有别，其实内蕴差不多，属于殊途同归，万变不离其宗。

除了艺术修养，言先生还兼具组织才干、活动能力、文学天赋、演讲本领，是以，地位、名誉、财富之类，皆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年前，我准备出版《大器行天下——季羨林的前尘后影》，这“大器行天下”五字，想来想去，请言公题最合适。我著文，不仅看当前，还要考虑五十年之后，这是我一贯的准则（也有少量应景违心之言，将来一概淘汰）。我相信，言先生的书法五十年后依然会为拙作增色。有一就有二，今年，拟出《北大与时间之外》，复请言先生再书“煌煌上庠”四字。言先生的五大追求四大准则，在这两幅拉页中得到形神兼备的体现。

也是年前，言先生这本艺思录行将付梓，出版社照例要在封底印上推荐语，我也忝列其中。我写的是：书，挥洒的是文；文，喷射的是气；气分百等，言先生独得“温恭直谅、大雅闲达”。

此八字也，字字为人间极品。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赠言公：“取法乎上，更得上。”这末了八字是我对成语的翻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断绝了向上的路，我要把它打通。

书出来，送我一本。看到封底我对言公的期许，被删去了——足见他的把持、谨慎。

我写是我的真情。

他删是他的自律。

字可以删，艺术却必须朝这方向迈进。我认为，言先生现在什么都不缺——该有的，他都有了；而且，正渐入挥挾风云、咳唾珠玉之境，万方瞩目，毫厘点滴都会被放大，这是人生的最佳景观，也是艺术的拉锯拔河状态——唯一要念兹在兹、无日或忘的，就是我赠送他的八个字。

己亥年春书于加勒比海游轮

卞毓方 男，学者，作家。

穠 現 大 夢 聯 三 陽
 代 雨 東 風 播 種 穰
 真 嗟 戴 錦 斧 登 地
 慈 情 應 茂 德 不 衰

言恭达小篆自作诗《善行天下赞》 2012年

言恭达 小篆 自作诗《善行天下赞》 2012年

书法传统中的个性表达

||| 言恭达

我非常感恩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出生的家庭，是一个诗书礼教的家庭，所以从小在这个家庭当中，我感受到一种文化的滋养。我父亲本身是一个书法家，但是我想除了受我父亲书画这一方面情愫的影响，我最感恩的是我母亲。我之所以现在有一种大爱精神，都是母亲传给我的。母亲她带给我的是一种人格的光辉，人文的素养和人性的一种历练，而这种人性的历练是使你感受到，做一个人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因此人文两个字始终贯穿在我这个五十年。第二个我感恩的是我的老师，苏州的沙曼翁老师，曼翁老师给我最大的教诲就是学古不为古人奴，不做古人的奴隶，而学古当中一定要出新。我第三个感恩的，就是感恩传统，感恩经典，每天你要和古人对话，但是每天又要吸收时代的新鲜空气，你不要忘记你是今天的人。你可以学习你老师的，你也要认识到你跟老师的时代不同，你应该走出一条和

老师不同的路。

中国的碑帖浩如烟海，你要挑选哪几家？要选择对你在不同的学书过程当中有补益的。比如我一开始学赵孟頫，然后再进入到《多宝塔》，《多宝塔》是颜真卿 43 岁写的，当时已经形成了颜体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再进入他的《麻姑仙坛记》，然后《勤礼碑》，一直到《自书告身帖》主流的经典完成后，你可以去学习一些其他的、民间的、不同审美领域的作品，作为你在经典的临摹当中、创作当中的一种营养。

我的书法之所以形成现在这个风貌、这种视野、这种思维，综合性根源就在我丰富的社会实践。一个人千万不能以为书法就在书斋里，一天到晚思考创新，这是没用的，必须要走进社会，通过走进社会以后，把自己的一种情怀、一种学说、一种艺术的思维和整个社会结合起来，实现了你的艺术价值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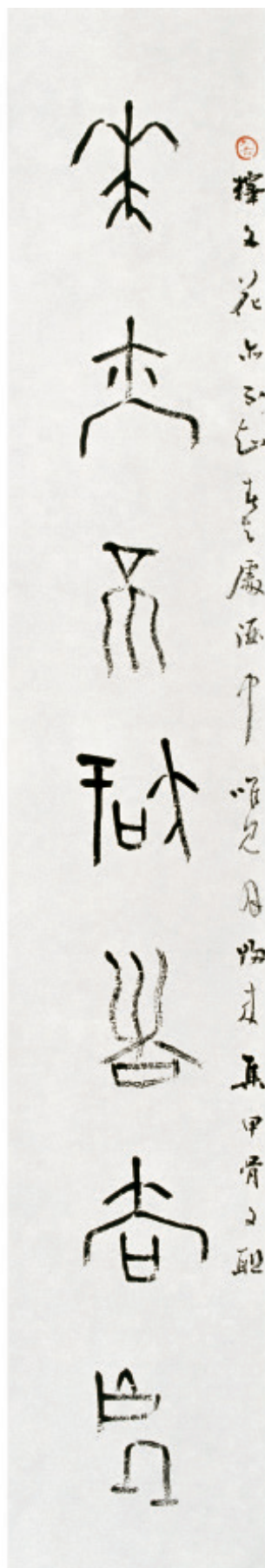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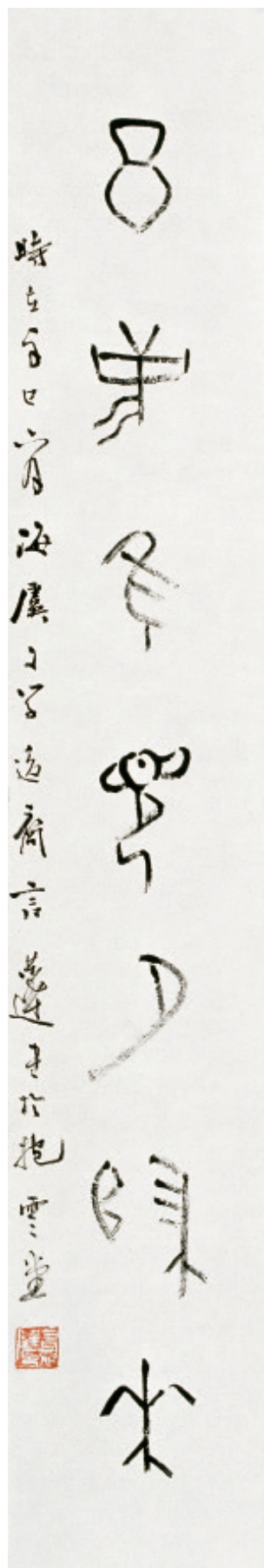
1996 年我写了一副对联，一般人可能觉得这就是金文，就是《散氏盘》，但是在这幅作品中形成了我比较完整的美学思想，它开始从技法层面进入到道的层面，在这个里面有实又有虚，有轻又有重，有润也有渴，有长也有短，而且有正又有侧。不是你拿起笔来把偏锋划划就叫写篆书了，不是这样。首先笔要提得起来，提了以后要逆势涩进，它对下面的力量有一种震荡感，才能真正达到涩。我们的书法创作当中需要有一个造险的意识，不是把所有的书法写得工工整整就是好书法，斜的你要看它是否符合规律。这个里面刘熙载已经讲了，书法要持，工之不工，不工而工，不工者造险。一对行列当中有“大人”也有“小孩”，有的字如小孩般顽皮，有的字则如大人般凝重，体式中线条的变化、粗细的变化、用墨的变化，构成了一个音乐的节奏感。

创作要追求和时代合拍，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感觉是一个正大气象的、豪迈的、激越的、奔放的但又是非常有内涵的、守正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不允许你单纯追求形式，形式要变，更重要的是内质，我就思考，要把时代的特质提炼出来，提炼以后，通过你的笔墨来变，因此又要符合中国书法、中国绘画的基本精神，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开始进行创作。有人问我为何要写长卷呢？长卷的书写内容中很重要的一点，白话文进长卷，它表述的叙事方式不同，因此我在书写上最难的就是把它的白话文变成诗性的东西来进行整合，进行书写。我认为历史遗传的经典，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结晶，但是我可能和古人不一样，我感到这个时代作为一个伟大的时代，必须体现这个时代的特质，豪迈、开放，因此我的作品整体是大开大合的，但是我是有度的，而且在整个当中正、斜、虚、实的变化特别强化，通过用墨的变化，使整个一幅长卷当中正是一片烟云。书家创造的内容最重要的是你对这个时代的感悟，对民生的感知，对生活的感恩，从这三个方面，来写出你自己的作品。

一个书家首先要感恩；第二是敬畏，对传统的敬畏，尤其是文化的敬畏；第三是博爱，要有大爱精神，任何能在历史留下的经典，都体现了对社会、对民众的一种大爱。

我一直讲，一个人千万不要把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看得多么宝贵，当然，也不要轻贱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把作为一种文化的东西放在一定的场合，一定的时空下，真正做到在爱中行走，你就成功了。

言恭达书法作品



魏源故居： 穿越时空的梅花香

||| 刘跃清



魏源（1794-1857）

南京老城西的清凉山，相传诸葛亮当年登临山顶，望长江之浩渺，感山势之雄峻，由衷慨叹：“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从六朝绵延明清，清凉山周边有颜真卿、郑侠、耿定向、董其昌、茅元仪、熊赐履、龚贤、薛时雨、袁枚、吴敬梓、陶澍、魏源、方苞、缪荃孙、顾云等名流雅士、文人墨客、致仕官员，或隐居或赋闲散居，寄情山水，放歌诗文，留下了放生庵、隐仙庵、一拂祠、半亩园、崇正书院、小卷阿、陶风楼、薛庐、朴园、随园等胜迹遗存，也留下了他们经久传颂的趣闻轶事、才情华章。清凉山海拔高度才60余米，但它作为南京的文化名山永远无法标高，高山仰止，熠熠生辉，光照千古。

清凉山附近众多名人故居大都淹没于历史滚滚烟尘中，形迹漫漶，只有清末著名思想家魏源故居、位于龙蟠里20号的“小卷阿”，仍孑然独立娑娑世界，别具风采，望断古今。

魏源原名远达，字良图，号默深，1794年4月（乾隆五十九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县（今属隆回）金潭乡魏家墩。其父魏邦鲁曾在江苏嘉定、吴江做过巡检一类的八品小官，敬业克己，乐善好施，母亲陈氏奉亲持家，魏源从小生长在一个“母绩子读，欣然忘贫”恬静祥和家庭，少年聪慧好学，9岁就和邵阳知县有“杯中含太极”“腹内孕乾坤”的从容对答，一时佳话。14岁曾去其父任所，对江南风物有所了解。20岁被湖南选为优贡生，进北京国子监读书，居京三年，游学交友，与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龚自珍、陈沆等多有交往。1822年（道光二年），29岁中举。此后屡试不第，为了生计，担任江苏巡抚贺长龄幕。贺长龄（1785—1848）湖南善化人，字耦耕。他们在北京时就相识，贺对魏源的博学多才很是器重。魏源任幕僚，主要工作是替贺长龄编著一部经世致用的书——《皇朝经世文编》。后又协助江苏两江总督陶澍

(1779—1839，湖南安化人)改革淮北“盐法”，江苏“漕运”，兴建水利，赈济灾荒。

1825年（道光五年），他在南京乌龙潭畔买宅居住（一说是自建），自称湖干草堂，即今天龙蟠里20号“小卷阿”。1835年（道光十五年），魏源在扬州钞关门内仓巷买园一处，名曰絜园。魏源早年对经学、史学、诗词深有研究，著述有《诗古微》《书古微》《古微堂内外集》《古微堂诗集》等著作。还曾赴新疆平定叛乱，以及在钦差大臣、蒙古镶黄旗人裕谦营中做幕僚，于浙江定海抗英前线审问英国俘虏，因这两次从军经历，著有《圣武记》。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因“禁烟”获罪，谴谪新疆伊犁。6月，在江苏京口（镇江）魏源与林则徐会晤，林将《四洲志》稿赠魏，嘱撰《海国图志》。老友相见，彻夜长谈，

魏源赋诗“万感苍茫日，相逢无一语”“与君相对榻，三度雨翻苹”，悲喜交集，感慨万千。魏源当时应该住在扬州絜园，“京口瓜洲一水间”，扬州与镇江隔江相望，得知挚友路过，特来相见。《四洲志》约9万字，主要内容是林则徐请梁要进从厚达1500多页的《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美国版原著中摘译的资料。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中外相关著述，按区分国，增补整理，并亲往澳门、香港等地游历采访，历时十年，殚精竭虑，终编著成《海国图志》，100卷，88万字。《海国图志》的核心思想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介绍西方列强，鲜明指出“法祖”与“师夷”并不矛盾，其目的都是谋求国富民强，抵御侵略，使中国跻身世界列国之林。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魏源直到52岁才



“小卷阿”门楼

通过补行殿试，中第三科九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其首次任职系苏北贫瘠小县，东台县令。东台每年上呈奏折均有“风凄凄，雨萧萧，去年旱，今年涝，十岁九灾，民不聊生”等言辞。加上前任县令欠款，魏源在东台困苦不堪，他在给友胡林翼的信中写道：“全家数十口，空无所有；先人的棺木也未得迁葬。”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魏源母亲去世，他丁忧守制，离开东台。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魏源上任兴化县令。在兴化他带领民众抗洪治水，修建运河东、西堤，当地百姓为了感念他，将喜获丰收的水稻取名“魏公稻”，后来他病逝后，将他附祀于范仲淹的祠堂内。1851年（咸丰元年），魏源上任高邮知州，他在高邮修治运河堤岸，在湖面宽广的高邮湖湖心挑筑湖心岛，以便来往船只避险停泊，同时整肃治安，发展生产，置义地、设义学，培养人才。1853年2月，太平军攻克江宁（改称天京），波及高邮，东征军林凤翔等攻下扬州，高邮戒严，因他对太平军起义采取观望态度，3月，被南河总督杨以增奏劾，“江苏高邮知州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魏源著即革职，以示惩戒”。（《清文宗实录》）

1856年（咸丰六年），魏源游杭州，暂住僧舍，避世潜修。1857年3月（咸丰七年三月初一），魏源病逝杭州僧舍，享年64岁。因其平生最爱杭州西湖，遂葬于南屏山之方家峪。

魏源早年潜研儒家经典，怀“修身治国”之抱负；中年经世致用，辅佐名臣改革漕运、盐务；鸦片战争后，目睹国家积弱积贫，弱肉强食，遂著书立学；入仕后以黎民苍生为念，忠于职守，励精图治；晚年历尽劫难，幻想破灭，“一切有为，皆不足恃”，遁入空门，以求解脱。纵观魏源一

生，经纶满腹，多次应试，终于入仕，官阶不高，半生潦倒，仓惶奔走，郁郁不得志，但他的思想彪炳青史，尤其是《海国图志》被载入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影响一代代人。诚如孙中山先生言，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只有做有益于人民的大事，只有将国家和民族的苦难、未来装在心里的人，人民才世代代记住他！

魏源的思想在黑帷沉沉的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航灯和春雷的意味。他呕心沥血著述、并记载他主要思想的两部著作《海国图志》《圣武记》，大多完成于扬州絮园。“（道光）十五年，以陈太恭人（魏源母亲）春秋高，思所以尽其欢，买园于扬州新城，甃石栽花，养鱼饲鹤，名曰絮园。”（《邵阳魏府军事略》）“又出其余力治生，累资巨万。构絮园扬州，为将母之所。性豪豁，所交多魁儒硕士及一时闻人，游宴投赠，费颇不资，一无所顾惜。”（顾云《盩山文录》）当时魏源在扬州开有“茂源盐行”，生意兴隆，阔起来的魏源不但购置“豪宅”，园内有古微堂、秋实轩、古藤书屋等建筑，还极具“宝庆佬”的豪爽义气，广交贤士，大宴宾客。

据考，絮园位于今天的扬州市新仓巷37号，它的文物价值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仍然是一片未加保护、荒凉破败的大杂院。魏源因改革“盐法”，为扬州盐商不容，加上生意日渐惨淡，只得将家人送回南京。太平军攻克、定都南京时，魏源家人正住在“小卷阿”。他本人为了生计、功名四处奔走，偶尔回到扬州絮园小住，他最后一次赴京赶考应该是从扬州出发的。

南京龙蟠里20号“小卷阿”是魏源除了湖南隆回魏家坳以外，住的时间最长的又一个“家”，前后长达十年。《海国图志》《圣武记》虽然不是“小卷阿”完成主体创作，但人的思想形成



“小卷阿”魏源手植梅花

不能割裂地看待，魏源纵横捭阖、放眼世界的意识思维在南京就已经雏形。

“小卷阿”是典型的清代江南民居，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据考证原为两路五进。顾云《盩山志》记载：“小卷阿，魏氏墅也。道光时，邵阳魏刺史源购地其间，为池馆弗果。今其子姓筑数椽居之，薄艺群卉，落落有幽致……倚扉小立，得岚影波馨为多。”陈诒绂在《石城山志》中写道：“（乌龙潭）迤细有薛庐……其北隅有一牛鸣地，为邵阳魏季子淮小卷阿。门外修竹千竿，亦颇得幽趣也。”魏源有几首诗写到“小

卷阿”，“偶载一船山，来游半湖月；但闻水气香，不见荷花发。”《卜居金陵买湖干草堂》之三云：“春风绿尽一池山，闭户文章败叶删。不是老僧来送笋，如何倒屣出柴关。”诗中所言，他正在删选《皇朝经世文编》。

魏源在扬州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时，曾把乌龙潭旁的房子稍加修缮，也就在这时将“湖干草堂”更名为“小卷阿”。魏源亲手在门楼的砖雕上题写“小卷阿”三个字，后毁于“文革”。如今上面依稀可辨的几个字，是搜集魏源传世手迹重新刻上去的。至于他当年为什么取这个

名字，一说是南京摄山（栖霞山）有古迹“白下卷阿”；一说是取自《诗经·大雅》篇名注解，“卷者，曲也；阿者，大陵也。”“卷”和“阿”合在一起，再加一个“小”字，房屋的地理环境形象跃然；一说古时“卷阿”，位于今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北方之凤凰山南麓，此处背靠凤鸣岗，东、西、北三面环山，唯南边与平地相接，形似簸箕状，龙蟠里与之相仿，故名。遥想先生悠然吟哦于湖畔月下，也许三者皆有吧。

我于1990年3月来到驻南京东郊的“临汾旅”服役。1992年夏，我从《扬子晚报》上看到一则启事，云魏源曾孙女魏韬逝后，留下数间房屋，让其亲属带上相关证件限期前往。先生是家乡著名先贤，我一直在搜集整理有关先生的资料，曾数次去拜谒先生故居，绕屋数匝，不得而入，并请区、市政协委员撰写提案，布展、开放魏源故居，均如泥牛入海。后来，我“解甲归田”就在先生故居附近上班，几乎每天“打卡”路过，但从没进去过，为此胡诌一首小诗：我日日打先生门前过 / 有时想进去讨口水呷 / 歇一脚用隆回话拉会家常 / 说说糍粑滩头年画和高铁的味道 / “小卷阿”周围高楼林立 / 如先生一袭长袍孑然一隅 /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 / 也只是长夜里的一道闪电 / 轻叩门扉久不开 / 先生出门还是回宝庆了？ / 墙角暗香传来 / 或许是先生不倦的打望。

2019年2月27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金城学院院长、邵阳籍同乡唐元林联系到鼓楼区文化局，组织十余名邵阳乡友拜谒魏源故居，一位叫张益源的馆长出面接待。在张馆长娓娓道来、侃侃而谈的解说中，可以看出他对魏源的生平很有研究，对魏源故居的管理保护有自己的想法。

张馆长说，魏源去世后，他留在南京的家属，

先后有80余人曾居住这里。最后一位住户是他的曾孙女魏韬女士，因终生未婚无后，此屋遂成公房。当年，房管部门急于收回房子，遂出资租车将屋内一应器具、陈设送到隆回魏源老家。如今“小卷阿”面目全非，早年街道改造，拆掉了临街的一进瓦房；2007年，因电线老化失火，损失了4间木质结构的房间。只有雕刻“小卷阿”三个字的门楼是原建筑，还有就是墙角那株盛开的“倒挂金钟”腊梅，据说是魏源手植。

经勘察考证，“小卷阿”的基础，多是用碎砖碎石打起来的，而且其尚存的墙壁，也多用残砖所砌，房屋的柱子，也多是“胸径”16厘米的较细木材。种种迹象，可见当时魏家还不富有。

现在，魏源故居有房9间，另有门房、厢房5间，建筑面积582平方米。均按原貌修建，从安全考虑，房屋柱子大都直径达20厘米，门窗、及屋内摆设都是向民间征集来的清代或民国年间的旧物。

魏源在湖南隆回魏家墩的故居，数年前我曾拜谒，四合院落，两层木楼，几十间逼仄房屋，典型湘中民居，时隔百年，漫步其间，扑面的烟火气，仿佛能听到主人的说话声和锅碗瓢盆的声音。而现在的“小卷阿”虽房屋庭院，错落有致，轩几明净，古色古香，幽然雅致，闹中取静，其更像是书斋，像谈笑有鸿儒的会所。白云悠悠，六朝古都，留此遗迹，凭吊先生，聊胜于无吧。

先生远逝，背影巍峨，湖水泱泱，山高水长。梅花飘香，几度枯荣，先生思想，穿越时空。

刘跃清 曾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现任职江苏省政协文化文史委。

颐和路

||| 雷雨



南京颐和路（吉强 摄）

北京有一颐和园，多次去过，总会想起王国维先生在 50 岁的时候，在这里自沉昆明湖，这一时间节点，已经是民国的十六年了，也就是 1927 年的 6 月份了，还要去殉清？南京有一颐和路，是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大片的民国建筑最为集中的所在。这条路的两侧，有高大伟岸虬枝盘旋的苍老而又蓬勃的枫杨树。树的躯干上，顽固而从容的绿苔，它们自有一己的世界，也俯视着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还有颐和路上并不凡常的熙来攘往的各色繁杂住家。这条路上，曾经生活过的人物太多，有名气很大的，有名气并不是很大、但人生却都充满故事的。如此一篇文字，只能是挂一漏万、蜻蜓点水了。

名气最大的自然是汪精卫了，对于这个当年中国的头号大汉奸，许多人充满了疑惑与不解。他在青少年时期，轻生死，敢担当，“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其雄哉。孙中山之后，他与蒋介石、胡汉民鼎足而立，即使他实在斗不过蒋

介石，也可以下野引退，翩然国外，为何要走这一步险棋，去做汉奸啊。本为佳人，奈何做贼？他后来的命运结局，几乎家喻户晓，不用多说了。他死后葬于南京东郊梅花山，但最终还是被挫骨扬灰了。汪精卫死的时候，也就 63 岁而已，他的宅子是颐和路 38 号，迄今仍旧是很神秘的一个大宅院。与汪精卫隔路相望的颐和路 39 号，是俞济时的宅子。俞济时也并非等闲之辈，俞飞鹏俞济时叔侄，据说与蒋介石有亲戚，都是浙江奉化人。俞济时是黄埔一期，曾侍从蒋介石左右，也做过集团军总司令，是七十四军首任军长，他高寿 86 岁，是颐和路这条街上难得的长寿之人。

颐和路 34 号是顾祝同的官邸。顾祝同，字墨三，是苏北涟水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1 年冬，到桂林投奔孙中山，任粤军许崇智部军事教导队区队长，1927 年后，历任第九军军长、第一军军长、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江苏省主席、重庆行营主任、



颐和路 34 号顾祝同故居（吉强 摄）



颐和路 19 号蒋梦麟故居（吉强 摄）



颐和路 18 号邹鲁故居（吉强 摄）

贵州绥靖主任与主席、西安行营主任等职。抗战时，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 年参与发动皖南事变。抗战胜利后的顾祝同，担任过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他于 1987 年初在台北逝世，享年 94 岁，著有《墨三九十自述》。

名气不亚于汪精卫、最终在台湾得以善终的阎锡山，曾短暂住过颐和路 8 号。这个阎锡山，以山西为根据地，在当年的中国北方，叱咤风云，得风得雨，与冯玉祥联手的中原大战，更是搅得周天寒彻，令蒋介石出了一身冷汗。此后，抗日战争，八年时光，忻口抗战，艰苦卓绝，也并非无所作为。抗战结束，内战烽烟再起，太原战役，这位自命懂得哲学的阎百川先生挥泪过黄河，跨长江，到了南京，在颐和路上栖身，而时光飞驰，政局变幻莫测，离开了大本营毫无本钱可言的阎锡山居然还做过匆忙草率的行政院长呢。一些国民党旧人动辄就称元老，实际上是不合格的，但若说阎锡山是党国元老，恐怕没有什么争议吧。这个阎锡山，到了台湾，仍旧研究哲学，阎锡山曾说：“苏格拉底行于街，无故被棍击，睹者不平欲为之报复。苏曰：驴踢人一蹄，人岂可还驴一脚？此与孟子与禽兽有何难焉同，乃是不直之忍。”阎锡山也写一些古体诗，如“一病缠身万事休，光阴虚度古人忧，此生尚有几多日，岁月何堪若此流”，如“做事知难行若易，做人知易行却难。毋论做人与做事，寻着难处易其难”。阎锡山的诗，多为打油，不合韵律，求其顺口而已。阎锡山在 1960 年病逝于台北，得年 77 岁。

颐和路 18 号是邹鲁故居。邹鲁与林森常被称作是西山会议派，这个标签，跟随其一生。邹鲁似乎没有福建人林森名气大，但此人善理财，也是教育家，曾两次主掌中山大学，还获得过德国

海德堡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也就是戈培尔毕业的海德堡大学。邹鲁曾有诗：“虞叔祠前柏郁苍，槎牙枝干傲风霜。剪桐盛事随周逝，留得浓荫荫古唐。”细细品味，不是寻常政治家漫不经心的打油顺口溜。他写给中山大学的对联“称心诗带风云气，信手文成金石声”，仅就书法而言，用笔自如流畅，有刚柔相济的圆润之趣，结体平正而顾盼有情，书风清俊而意态万千。邹鲁著有《中国国民党党史》《回顾录》《教育与和平》《邹鲁文集》《邹鲁文存》等。他1954年于台湾去世，不到70岁。

说到邹鲁，不能不说曾住在颐和路19号的蒋梦麟。蒋梦麟毕业于伯克利分校，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也是在北大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其贡献不亚于蔡元培。他在北大期间，与陈独秀相处还算融洽，俩人都是前清秀才，而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蒋梦麟曾回忆，有一次陈独秀问他：“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成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向陈作了一个揖后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觉得，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某日，蒋接到警察厅一朋友电话：“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与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钊陪陈独秀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了

天津，这就有了后来的“南陈北李，联手建党”。蒋梦麟与毛泽东也有关联。1918年秋，毛泽东在京，暂住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杨昌济（即他后来的岳父）家里。通过杨，毛泽东得到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荐，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毛泽东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还对斯诺津津乐道此事。毛泽东与陈独秀、胡适之、张国焘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蒋梦麟在其《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写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蒋梦麟和高仁山是莫逆之交，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戕杀于天桥刑场。陶曾谷是高仁山的遗孀，蒋同情其处境，对她呵护有加。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长后，陶曾谷成为他的秘书。日久生情，二人坠入爱河。蒋梦麟与陶曾谷结婚后，夫妻感情倒是相当和谐，婚姻生活也算美满。但由于陶曾谷在为人处事上有所欠缺，这段婚姻并没有给蒋梦麟带来多少帮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北京大学“倒蒋迎胡”，反对蒋梦麟继续担任校长。傅斯年也承认蒋梦麟“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1958年陶曾谷去世，1960年蒋梦麟初见徐贤乐，一见倾心。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此婚姻，多人反对，但蒋梦麟一意孤行，最终结合。1962年底，蒋梦麟骨折住院，住院未久，徐贤乐便心生不满，于1963年初借故而去。蒋梦麟伤愈出院，徐贤乐已经不知去向。蒋梦

麟委托律师致信徐贤乐，表示“由于两人的生活习惯、思想志趣无一相同，相处愈久，隔阂愈深，此次折骨就医，彼此意见更多不合”，经多日考虑后“决定分居”。4月10日，蒋梦麟正式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请求离婚，继而又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此时蒋梦麟已是风烛残年，腿伤未愈，体质孱弱，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场老泪纵横：“我坚决要和徐女士离婚，我有道理，也有原因的。我已是望百之年的老人了，在社会上做了几十年的事，也不是小孩子，岂会这么容易受人挑拨？”“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了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在经过亲友调处不谐之后，才毅然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以求法律的保障。”1964年初，这场轰动台湾岛的离婚官

司，最终经人调解而息讼，蒋徐二人协议离婚。尘埃落定后仅仅半年，蒋梦麟便因肝癌病逝，终年78岁。胡适说过，“话说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国币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傅斯年认为，蒋梦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有人说，蒋梦麟“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中如是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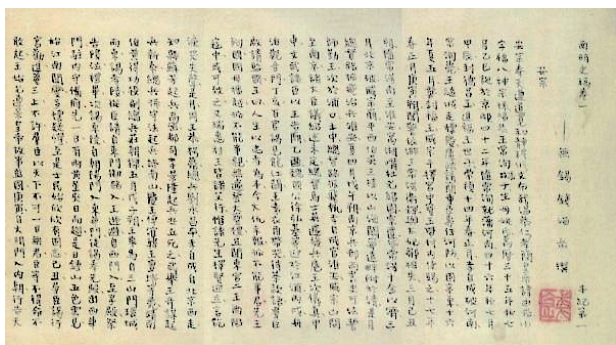
颐和路6号陈布雷故居（吉强 摄）

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蔡元培也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说，“这五六年来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陈布雷先生一生追随蒋介石，是知名的文胆，我曾写有《文胆的结局》，提到陈布雷先生。他曾有宅院在颐和路6号，陈布雷1948年自杀，终年58岁。颐和路2号是泽存书库，说到这个书库，不能不提到陈群这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是藏书家，也是汉奸。陈群，字人鹤，是福建长汀人，他早年东渡日本读书，在汪伪政权担任过伪“考试院院长”“江苏省长”，也在梁鸿志手下做过内政部长，他在1945年自杀，时年55岁。朱子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说过，汪政权之建立，重庆是认为通敌叛国，而日本又认为非但是一个不受指挥的组织，反而是处处予以掣肘的一个累赘。虽然那时沦陷区的民众，寄以若干希望，减少一些被蹂躏的实惠，但是这政权的命运，在两面不讨好中，其未来的结果，是注定为先天性的。这个朱子家就是金雄白，党史专家金冲及的父亲。陈群对藏书有浓厚兴趣，他搜集各地图书文物极多，在上海和南京两地各建造一所书库，上海以收藏日文图书为主，计有10万册。他取《礼记·玉藻》“父歿而不能读，手泽存焉”之义，将南京书库名为“泽存书库”，收藏新旧图书达40万册，善本书达4400余部，4万余册，其中有汪精卫的部分藏书和伪官员的寄存图书，并



《南明史》书影



钱海岳《南明史》手稿

聘请40余人整理。合计陈群在上海、苏州、南京三地所藏，总计有80万册，所藏宋、元、明各朝精本颇丰，善本书达10万册，1943年还编有《南京泽存书库图书目录》。抗战胜利后，这些图书由国民政府接收，1949年后，多数善本书被携至台湾，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陈群有一藏书印“来生恐在蠹鱼中”，据一日本人文章说，他在自己书房门额上题“学我者死”，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感。

颐和路上，有苏联大使馆，还有澳大利亚、墨西哥、菲律宾的大使馆。而这条路上居住的人家，就此文所提到的而言，除了顾祝同、俞济时还算高寿外，其他提到的几个人，如蒋梦麟、阎锡山等，都没有活过八十岁，而汪精卫病死日本，最终坟墓被炸，不得安宁，陈群与陈布雷则是自杀。还有一个自杀的学者叫钱海岳，

据说，他在南京期间，就住在泽存书库，也就是颐和路2号。钱海岳是晚明史专家，著有《南明史》，他曾在南京图书馆工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南大历史系讲授晚明史，1968年在南京东郊灵谷寺跳塔而死，得年67岁。钱海岳是无锡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政经科，师从梁启超、辜鸿铭等。1943年，任新疆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江苏建省后，调江苏省博物馆工作，1960年又到南京图书馆，并且应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之聘，在南大历史系兼授南明史。钱海岳纂写的一部并列于《二十四史》且对之有补充作用的史学巨著《南明史》，在埋没40年后，终于于2011年5月得以正式出版，而此书是钱海岳耗费35年心血编撰而成。钱海岳于1901年出生于无锡郑巷，其父钱麟书曾任安徽绩溪知县，民国初年受聘协助编纂清史。受家传影响，钱海岳以文名著称乡里，被称为“奇才”。“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动荡，钱海岳把南明史研究作为自己的事业，立志通过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激发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钱海岳一生著述颇丰，除《南明史》外，还有《哀蝉落叶集》《海岳文编》《海岳游记》《能史阁文集》《明清故宫词》等。

颐和路，曾有外国使节的出没，曾有政要人物的背影，曾有学者的翩翩衣衫，曾有政治冒险者的挣扎。斑驳陆离的路，充满故事的路。

雷雨 男，国家一级作家，学者，出版专著多部。

征稿启事

《雅集》是由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苏中华文化学院主办的综合性文化艺术刊物。本刊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文化认同为宗旨，以近百年为期、江苏地域为特色，兼具文化性、统战性和可读性。本刊自2011年6月创刊，2016年出版有《雅集文萃丛书》一套，在广大读者中享有较好的口碑。为了促进刊物的进一步发展，现向广大作者征稿，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人物：介绍近百年来江苏籍贯或在苏工作经历过的文化名人，如“人物春秋”“艺术人生”。

二是纪事：江苏近百年来文化史事钩沉，如“历史遗韵”“文苑纪事”。

三是风物：江苏各地人文积蕴，著名物产风俗，非遗项目等，如“城市文脉”“乡村记忆”。

四是论坛：文艺时评、文化研究论文等，如“文化论坛”“传统文化”。

五是海外联谊：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江苏与港澳台间的文化交流活动纪实，如“海外传真”“两岸三地”“活动剪影”等。

【投稿须知】

1、来稿确保原创首投，如因版权问题带来的一切责任由投稿人自负。

2、稿件采用Word格式。每篇稿件后请附上作者真实姓名及个人简介、详细通信地址及邮编、电子邮箱及手机等联系方式，以便及时沟通及寄奉稿酬。

3、编辑有对来稿作必要的编辑、修改的权利。

4、文稿字数要求3000字至8000字，尽量提供高质量图片（jpg或tif格式，A4大小，300dpi），力求图文并茂。

【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yajijis@163.com

联系人：吉编辑 电话：025-84287248

《雅集》编辑部

禅意大虎丘

||| 王啸峰



七百多年前的一天，性存子来到虎丘云岩禅寺，正巧塔后方丈室前的千顷云阁刚刚建成。他问主持德莹此阁的寓意。德莹介绍意出苏轼“云水丽千顷”诗句。并说宇宙万物的荣枯生灭，就像云一样聚散无常，游人来此看到阁名，就会悟出这道理。性存子反驳德莹的观点：“谓云为有，谓世为真，是之为缚；谓云为无，谓世为幻，是为之脱。”在他看来，聚与散、存与亡、有与无，只是观察人角度不同。认为太真实，就成了束缚；认为太虚幻，就成了超脱。所以“不变者不能一瞬，变则亘千古而不老”。史载，宋千顷云阁被毁于明代，清康熙年间重建，又被毁。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再修建筑。千顷云阁的遭遇，默默印证着性存子的宇宙观。

每个苏州人心里都有一个虎丘，甚至每个到过苏州的人也是如此，这是其它吴地名胜、园林

不可比拟的。我看到过据说是虎丘存世最早的影像，一幅 1900 年拍摄的老照片。一条马道直通山门，四周既无建筑也少绿化，微倾的虎丘塔（云岩寺塔）及周边几处老房子、几棵老树映衬背景。一个和尚低头从镜头前走过，稍远



虎丘老照片

处一位进完香的妇女刚出山门。和尚与妇女之间是摄影师的助手，一位牵驴少年，从他僵硬的站姿来看，很可能在做摄影师的模特，他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男模了。和尚蹙眉而行、少年歪头迷茫，加上野草萋萋、建筑陈旧，清末的虎丘已到荒芜落寞、人烟稀少的地步了。摄影师心中留存的虎丘印象，与现今我们的感受肯定相去甚远。而我自己心中的虎丘，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着。

以前，每年清明，外公外婆都要带上我去虎丘边上的一个小村子——硕房庄。家里的祖坟在那里，亲戚帮着照看。我们提着送亲戚的礼品，乘二路公共汽车到石路，再转乘五路车去虎丘，在虎丘前一站一号桥下。在村里吃顿饭、喝喝茶，既走了亲戚，也算对祖先意思了一下。说意思意思，有不敬的罪过。但是，我跟着去了很多次，却从没有上到过坟。拓路、建厂、造房，坟已经被平掉多年。外公外婆觉得每年去一次，意思到了，祖先也就知道了。走出硕房庄，我们通常会去虎丘。一张张方方正正的黑白照片上，记录了我从爬到立再到走的过程。妈妈补充说那时从硕房庄到虎丘，必须穿铁路，有时要等火车，我最喜欢看钢铁大物呼啸而过。可惜，这些记忆我都模糊了，脑子里很少留存那时的虎丘，即使有，也只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由一些元素构成。夏日星空下，外公手摇折扇，遥望西北天空说故事：阖闾墓葬剑池底，狮子回头望虎丘，生公说法石点头，躲债要进“赖债庙”等等。外婆不这样，她一心向善，挂在嘴上的只是憨憨泉的传说，勤劳、善良、逆来顺受、甘受折磨，就会感动神仙。我私底下想，要不是憨憨碰巧挖到泉眼，必定被那些老和尚欺负死。这些元素深植我体内，渐渐地，成为我思维、行动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一个季

春的午后，我时隔多年再上虎丘，站在梁高僧竺道生曾讲道的千人石上。千人石赭红粗砺，似乎浸透了两千五百年前阖闾墓工匠的鲜血。遥望虎丘塔、剑池，我产生祭拜的冲动。在祖辈一代代传下来的训示里，虎丘不再是苏州的园林，而是苏州人的魂魄。

眼前的“虎丘剑池”四字，结笔浓秀、雄健庄重，为唐代大书家颜真卿所书。不过，岁月流转，“虎丘”两字逐渐剥落，明万历年间苏州石刻名家章仲玉钩摩补刻，因此有了“假虎丘真剑池”之说。

穿过“别有洞天”月洞门，我踏入剑池，便见两侧陡峭石崖拔地而起，一带绿水犹如一把平放的宝剑，散发着寒气。我久久凝望碧水，思绪飘向春秋，吴国最为强盛的时代。起初，“剑池”还有另外传说：一是古人淬剑之地，所谓“龙泉一淬名因得”，池出于自然。二是秦始皇至此凿山以求奇珍异宝，没有收获。后来，孙权也做了同样的事，仍然一无所获，其凿处形成深涧，形成剑池。剑池水千年不干涸，让多少探秘者望而兴叹。

明朝正德年间，苏州大旱，池水终于干枯。当时的名流唐伯虎、文征明、王鏊等曾下池探索，留下“可容数人入之，其中亦无所有，但垒石数层若横板而已”的记载。但当时的苏州知府以先王遗骨不得暴露为由，下令叠石封洞。有摩崖石刻记载了当时地方官探秘的情形和心境：“长洲令吾翕、吴令胡文静、昆山令方豪，闻剑池枯，见吴王墓门，偕往观焉。万年深闭，一旦为人所窥，岂非数耶？命掩藏之。正德七年上元前一日志。”至此，人们的认识逐渐统一到剑池下便是吴王阖闾墓上来。根据《越绝书》记载，他生前喜爱的“扁诸”、“鱼肠”等三千把宝剑作为殉葬物也在其内。至此，人们也开

始相信，秦始皇、孙权等就是为探寻阖闾墓而来，穿山凿洞，却无功而返。

新中国成立后，剑池清淤工作进行过多次。最近一次在2008年，剑池水抽干之后，在其尽头呈现出三角形洞穴，五块石板叠加封洞，这是一种洞室墓，属于“竖穴横洞”墓葬形制，剑池为南北向的竖穴，池底的石穴是洞室的通道，符合春秋时期墓制形式。曾有专家提出打开石板进行发掘，但后来国家考虑到云岩寺塔的安全，以及如果出土文物如何保存等问题，最终决定不予发掘。据说，有人曾经将长竹片顺石板缝隙往里伸进两米多，带出来的均是淤泥。我想起明代高启的《阖闾墓诗》里的几句：“空山虎去秋风后，废榭乌啼夜月边。地下应知无敌国，何须深葬剑三千？”剑池寒气逼人，云岩寺塔却温和慈祥。

我转身仰望云岩寺塔，他就像一位敦厚长者，正微微俯身倾听我的疑问。这座东方的“比萨斜塔”，是现存江南唯一的北宋砖结构古塔。塔仍在寺已亡，我静静地感受塔院门宕上的“静远”之深意。梁思成先生对古塔的考证颇为精密：“塔八角七层，塔身各层各隅砌圆柱，上施阑额，并柱壶门，阑额之上为砖砌斗拱，双杪重拱偷心造，各层斗拱之上更用菱角牙子两层出檐。”这座结构精妙的古塔，从明朝开始，塔顶第七层就悄悄往西北方向倾斜，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古建筑专家采用“铁箍灌浆法”，才阻止了古塔斜势。回到那张虎丘最早的老照片，如果没有云岩寺塔这标志性建筑，我们将无法准确判断拍摄地点。那时，塔身斑驳缺损、塔体破旧倾斜，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塔的标志性地位。有塔才有虎丘，虎丘的第一景，必是云岩寺塔。很多年前，老宅的五斗橱玻璃台面下，压着几张泛黄老照片。我记得有一张曾外祖母

与她表妹的合影。八十多年前姐妹俩站在剑池前，云岩寺塔高耸入云。对比现在的景象，山石、树木等似乎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对人而言，却已是匆匆而过。照片记录的只是一瞬间，留存下来，变成纪念物。

凝神感叹静思良久，我绕过一个个说各种方言的旅游团队，走向后山。后山少喧嚣，云在茶香里，我静静地喝茶。廊前，炒茶师傅反复搓揉着刚刚采摘下来的白云茶。我想讨一杯新茶品尝，师傅说这茶只做了前两道，杀青和揉捻，还缺最后一道干燥工序。新茶未尝得，只能蹲下身仔细观察匾中白云茶，伸手轻翻，我脱口而出：“这倒真是安徽茶制法呢。”边上的师傅笑着说我识货。其实内中典故是外公告诉我的。白云茶曾是虎丘一宝，相传陆羽手栽茶树。到了宋代，虎丘寺僧改原来的蒸青法为炒青法。白云茶形成了“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煮之其色如月下白，其味如豆花香”的特点，自此名扬天下。时至明朝，各级官吏每年加码向苏州索要白云茶，当时白云茶已被列为极品贡茶，年产量仅二三十斤。寺僧们无法忍受，索性将茶树铲个精光了事，虎丘白云茶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白云茶毕竟还是留下了血脉。据明代冯时可《茶录》记载，安徽本无茶，虎丘僧人大方和尚来到松萝结庵后，采当地山茶，以白云茶的技法制作，一时间“远迹争市，价倏翔涌”，制成了著名的松萝茶。大方和尚还采“山之顶、谷之巅”茶叶，制作了一种外形与龙井茶相仿的茶，为纪念他，人们称此茶为“顶谷大方”。十多年前，为延续白云茶的血脉，虎丘方面请回了安徽师傅，恢复古法炒制白云茶。眼前的那些茶树，生长在杉树、桂花树和玉兰树下，虽然没有品尝到新茶，我却已经闻到茶中的花香了。昔日有诗赞“虎丘山后胜山前”，说得正



沈周《虎丘图册》之憨憨泉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沈周《虎丘图册》之千佛堂云岩寺浮屠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转载自《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美]高居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

符合我此时心意。

当代作家描写中秋在云在茶香饮茶的文字，大多细腻清和。“满树的桂花似乎全开了，又簌簌地掉下来，地上，桌上，茶碗，还有我们的头发上，都落到了一粒粒的桂花。”（潘敏《紫金庵的桂花》）我像是听到了窸窣窸窣的桂花掉落声，这声音虚中带实，实中有虚。虚者，就像山塘河桨动水声；实者，就像铁环叩击山门清脆声。声音成了一种情感的符号。

龙应台在《虎丘的识者》里，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能不去虎丘，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我知道，那是袁宏道和张岱。当初翻看他们散文时，我就惊诧于他们对中秋虎丘盛况描写的高度集中和一致。

四百多年前，袁宏道在《虎丘记》中，记叙了虎丘中秋盛会，最令我难忘的便是声音。夜已很深了，各种乐器都歇了下来。这时，“一夫登场，

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比袁宏道小三十岁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也写下相似文字。“三鼓，月孤气肃……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古代漂浮于虎丘之巅的乐声，近处风吹树叶和花落的声音，让我沉下心，细细品味虎丘的沧桑与变迁。龙应台离开虎丘时，曾问苏州本地人，虎丘是否还有中秋音乐会。得到否定回答后，她像张岱一般发出感慨：“使非苏州，焉讨识者？”在她眼里，中秋月圆之日，苏州人当咸集于此，赏月品酒听曲，而且还得具备“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的音乐评论家素质。这样的夜才圆满，这样的集会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但是，从“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到昔之雕栏朱阙，今之蓁丛茼草，只因“尽摧残于兵燹，蹂躏于戎马”。文化的脉络

一旦被战争割断，要想再续，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人的聚散，虎丘的兴衰，历史永远是一出悲喜剧。后山多禅意。走入万景山庄，我便有“芥纳须弥”之感。万景山庄是一座仿古建筑园林，更是荟萃苏式盆景精华的专业盆景园，陈列大中型盆景五百余盆，数量和精品之多列苏州各名园之首。我对苏式盆景的亲近感，源自外公。

老宅的天井里，外公曾经养了一个苏式假山盆景。层峦叠嶂之间，一泓清泉、一座倚山亭，老翁闲坐垂钓。假山披满青苔，文竹、罗松山草高低起伏，微风过处，竹林般空灵。外公伸手取出水中卵石，说已经养活，光滑剔透，而且长“眼”。我似懂非懂，只盯着一寸来高的老头看，幻想我就是钓鱼翁，不说钓鱼之乐，身在山水之间，那该如何的舒展？这样的意念一直在我脑中挥不去。后来，每到一处，习惯于将自己缩小，甚至隐藏，放大事物的局部，意外的是，我得到了安全感和宁静心。

难道真是永恒源于刹那，须弥纳于芥子？南朝的傅翕曾说：“须弥芥子父，芥子须弥爷。山水坦然平，敲冰来煮茶。”于是，旧时场景重现。一个小天井，一个孤独少年默默地看着盆景、鱼缸和枇杷树。割成方块的天空，风轻云淡。时间仿佛凝固，一秒钟像是持续了一个世纪，而一世纪的光阴，却在白驹过隙般运动中闪过。我们都是时间的匆匆过客，想拥有一切，或者追求永恒，都是愚蠢。这个春天的傍晚，在万景山庄，我细细品味“一草一木一世界、一山一水一天堂”的禅趣。

日头渐渐西斜，游客纷纷散去。虎丘后山的山林野趣让我“友于花鸟，物我相忘”。竹林里春笋钻出，抖落黑土；紫色二月兰密密匝匝，点缀暗红岩石；玉兰山房周边白玉兰叶子宽大，香樟树正换新装。尽管已出了景区，但我仍意

犹未尽。出口往东五十米，是山塘街终点席场弄。相传以前此地居民以织席为生。如今弄堂里人来车往，嘈杂拥挤。站到环山河西岸的一个河埠，我才把喧嚣暂时隔开，对岸就是苍翠安静的虎丘山。这边是世俗，那边是脱俗。只隔一条河几十米距离，强烈的落差，让我有身处“飞地”的感觉。

从西转回，我还想探访虎丘塔影园遗存。鼎盛时期，虎丘周边的别墅、楼台鳞次栉比。专家告之，塔影园曾有两个，顾氏塔影园已无迹可寻，蒋氏塔影园遗址在现幼儿师范学校内。离虎丘这么远，难道云岩寺塔真的能够映入眼前这窄小池塘？沈德潜的《蒋氏塔影园记》解开我的迷惑。“名曰塔影，山巅浮图，隐见林隙，故名。”原来是站在园内，透过树的缝隙，大致可见云岩寺塔的身影。现在，我即使爬高再踮脚，视线也越不过众多钢筋水泥建筑了。塔影在哪里？只能在心里了。我相信性存子的话，改变是王道，能够使虎丘成为永恒，我愿虎丘天天变，一直延续今日的繁华。

王啸峰 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苏州烟雨》、《吴门梦忆》、《异乡故乡》。《井底之蓝》获评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南京佛教三题

||| 马建强

栖霞寺与宗仰上人

南京山多。山一多，就会有人喜欢给山排名次。历史上南京的第一名山，应该是栖霞山。乾隆一生去过好多山，又是皇帝，他说过：栖霞山是“第一金陵明秀山”，高屋建瓴一锤定音余响不绝。南京普通百姓没有资格给山排名次，更说不出皇帝这般文雅隽永精准深刻的评价。但栖霞山皇帝认可，百姓也喜欢，“春牛首秋栖霞”，便是南京百姓用脚做出的选择。

天下名山僧占多。栖霞山如此明秀，僧众自然不会错过。果然，从古至今，栖霞山除了山之明秀，更是寺之胜地。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渐次形成八大宗派，八大宗派中除了唯识宗之外，净土宗、三论宗、天台宗、禅宗、华严宗、律宗、密宗均在此山弘传过，特别还是佛教三论宗之祖庭。加之南齐所凿之千佛岩、隋朝所建之舍利塔、唐朝御制之明征君碑，栖霞山之金陵第一，当属实至名归。

山深藏寺，寺庇护山。但晚清因太平天国的一把战火栖霞寺毁灭殆尽。寺毁山失色，栖霞寺

仅存残垣断壁，香火几近断绝。我们如今所见栖霞之重光，幸赖一位俗姓黄的禅宗大师——宗仰上人。黄宗仰（1865-1921），江苏常熟人，名中央，法名用仁，字宗仰，号乌目山僧，中年别号楞伽小隐，晚年自称印楞禅师。

黄宗仰祖辈父辈在常熟城内开米行为业，家境殷实。他因母亲笃信佛教，从小耳濡目染，对佛门无比向往，十六岁在常熟虞山清凉禅寺削发出家。自幼聪慧的黄宗仰在名师指点下深研释家内典，旁涉中外学说，另对琴棋书画、园林建筑等多有心得。1900年起，黄宗仰得当时上海滩著名富翁、犹太商人哈同之盛邀，到上海帮助哈同设计建筑爱俪园。爱俪园，通称哈同花园，从1900年起几经扩建，至1909年全面完成，耗资众多，总面积300亩，亭台楼阁、树木花草、池榭石馆、鸟虫禽兽，美轮美奂布局奇巧环境优雅，一时成为上海滩上最有名的风景名胜。在设计建造哈同花园的八九年时间里，黄宗仰先后与孙中山、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邹容、吴稚晖等交好。虽为方外之人，但黄宗仰爱国爱民情深，多次资助革命党人，

与他们结下了深厚情谊。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为酬黄宗仰当年资助之恩，曾邀请他出任民国要职，他自然志不在此予以婉拒，依旧青灯古卷一心念佛。

1919年春，黄宗仰去九华山朝礼归程经停栖霞山，发现当时的栖霞寺已经名存实亡，几位老僧人栖身几间破屋，旧有殿堂荡然无存。时已年过半百的黄宗仰，由此发心一定要赓续慧灯重光祖印。孙中山听说黄宗仰要复建栖霞寺，当即率先捐款一万大洋相助。感于孙中山的榜样带领，鉴于黄宗仰的高德宏愿，江浙一带的达官名士、富绅信众纷纷效仿，戴季陶、居正、于右任、张继、叶恭绰等社会名流均予慷慨解囊。

1919年7月，黄宗仰开座复建的那一天，四众人士2000多人汇聚于栖霞山下，他们在荒郊野岭搭建了20余座芦棚作为临时居所，共同为栖霞古寺复建发心祈福添砖加瓦。复建古寺，

需要大量物资，需要大量钱财。为方便建筑物资进出，更为方便各界施主前来参观考察，黄宗仰特别商请江苏省交通厅，请他们联系沪宁铁路局，将原先拟定在南京郊区的松树村小站



宗仰上人



栖霞寺毗卢宝殿（吉强 摄）

专门移至栖霞古寺山门前不远的栖霞镇。此举大大方便了古寺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大大便利了四方信众及栖霞四周百姓的出行。此前有过近十年修建爱俪园的宝贵经历，使得黄宗仰在设计重建栖霞古寺方面熟门熟路如鱼得水。在黄宗仰的统筹指挥下，栖霞古寺的修复工程进展很快，不久古寺主体核心建筑——毗卢宝殿便拔地而起。深令天人痛惜的是因为积劳成疾，毗卢宝殿尚未完全竣工，宗仰上人便于1921年7月圆寂，享年57岁。

现在栖霞古寺玉佛楼二楼，专门辟有宗仰上人纪念堂。黄宗仰被尊为栖霞古寺“中兴第一代祖师”，列为临济金山分宗栖霞支宗第一祖。纪念堂正中央悬挂有宗仰上人画像，左右两壁另挂有青权、若舜、方廉、寂然四位高僧的画像配享。国学大师章太炎写有《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

黄宗仰结缘栖霞古寺，发心栖霞古寺，重建栖霞古寺，满打满算也就不到两年时间。但因为黄宗仰，栖霞古寺得以重建，千年古刹得以法灯赓续。祖印重光，名寺中兴，本与在此时间长短无关。1936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专门通过决议，对宗仰上人给予国家褒奖，并拨出专款，由戴季陶、张继主持，在南京栖霞古寺济生台附近，建有宗仰上人墓塔，立碑永久纪念。以国家名义纪念表彰一位佛教高僧，这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之少有，宗仰上人无愧于这一殊荣。

我曾陪同孙中山先生的嫡曾外孙王志雄夫妇，专门到栖霞古寺礼佛，因宗仰上人与孙中山先生在重建古寺的深厚缘分，王志雄说：早年中山先生革命，宗仰上人资助很多；尔后宗仰上人重建栖霞寺，得中山先生乐助，这应是一种以恩报恩吧！

古瓦官寺与智者大师

古瓦官寺，地处南京城南。该寺目前两大特点：一是年代之久远，二是游人之罕至。民国时期南京曾出版有《新京备乘》一书，该书介绍此寺文字如下：“瓦官寺，在花盂冈，以其本陶官地故名。或曰瓦棺，其说甚诞，不足信也。”

瓦官？还是瓦棺？其说如何诞？《金陵志》中说：“西晋时地产青莲二朵，掘之得瓦棺，花从僧口出，因名。”为何是瓦棺呢？传曰昔有一僧，不说姓名，平生诵《法华经》万余部。临死遗言请以瓦棺葬之。后故称此寺为瓦棺寺。可多人认为此说实在荒诞，明代王世贞在其所写的《重建瓦官寺祝厘圣寿记》里就明确指出“瓦官”的含义：“瓦官寺者，创自晋兴宁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阳，古所称铜官、盐官之类是也。”瓦官，即陶官之意，也即“以其本陶官地故名”，就是这里曾经是做陶器瓦罐的地方，所以建于此地的寺庙被取名为瓦官寺，时在东晋兴宁年间，即公元363—366年间，有人考证说建于364年。这瓦官寺应该是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寺庙之一了（另有建初寺，建于东吴赤乌十年即公元247年，它比瓦官寺早，可惜原址兴废变迁已难考，据说有关方面正在寻址复建）。瓦官寺地处秦淮河北岸之山坡，这一带土色红赭，适宜烧制陶瓦。一直到清代，城中人修建房屋，还经常会到此取土烧砖制瓦。这应该是瓦官寺寺名的真正来历。

瓦官寺从东晋初建历经隋唐直至五代南唐，一直是南京城南凤凰台地带的中心。唐朝李白客居南京时，瓦官寺一带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也是他创作多首诗歌予以吟咏的地方。他“晨登瓦官阁，极眺金陵城”，放眼所见是“钟山对北户，淮水入南荣。漫漫雨花落，嘈嘈天乐鸣”。



智者大师

该寺历史上屡有兴废，重大劫难有三次，一次是北宋开宝七年（公元 975 年），北宋大将南下包围金陵，南唐后主李煜拒绝投降，围城一

年，金陵失陷。北宋军队相约不得妄杀，而与北宋军队同时攻城的原吴越国军队，因与南唐久为夙敌，故进城后烧杀抢掠。瓦官寺当时有数千人避难于此，吴越兵举火焚之，死伤惨重，瓦官寺夷为平地。第二次劫难是清同治年间，湘军攻破南京城，洪秀全病亡，全城一片火海，瓦官寺再次被毁。第三次劫难是 1937 年冬日寇侵华南京屠城，瓦官寺一片废墟。建国后瓦官寺原址先后成为小学和中学的校舍，一度租作工厂。2000 年后该原址归还市佛教协会，2003 年瓦官寺得以重建，而今梵呗声起古寺重辉。只是原先的“花盂冈”，而今已经被人称为“花露冈”了。虽然地处老城，交通不便，游人稀少，但其悠久历史使它散发出独特魅力。早在唐宋年间，古瓦官寺便以拥有戴安道制佛像、狮子国贡玉佛、顾长康画维摩之“三绝”而闻名遐迩。可惜几次劫难，此“三绝”早已灰飞烟灭。

而今古瓦官寺内，专门建有智者大师纪念室。众所周知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祖师，他与台州国清



古瓦官寺（吉强 摄）

寺、南京栖霞寺、济南灵岩寺、当阳玉泉寺这“天下四绝”渊源很深，可他与古瓦官寺的一段经历却少为人知。

智者大师，又称智顗，俗姓陈，原籍颍川（今河南许昌），东晋时迁居到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县西北），其父曾为南梁朝重臣。智者18岁出家，二十三时在光州大苏山（今河南境内）拜高僧慧思和尚为师。智者聪明慧解，学识广博，潜心修炼，深得慧思真谛，慧思曾让智者代他自己讲经。后慧思南去衡山隐居修持，临别前对智者说：“我要到南岳衡山去了。你学业已成，可以弘法了。但你唯有定力不足，还需努力修持。你与陈国（陈国都城在南京即金陵）有缘，可以先去金陵，定能成就弘法大业。”于是智者便与慧思大师道别，东向金陵，住瓦官寺传禅。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陵在东晋南北朝时间佛教非常兴盛，高僧林立辈出。智者在瓦官寺八年，他把自己在慧思大师那里学到的禅定之法向众人传播，受到修道之人的普遍欢迎。数位金陵高僧听他传禅说法，多被折服，纷纷抛弃先前所学，一时间金陵禅学大盛。此前金陵乃至江南一带的僧人多空谈理义，不讲修持。智者所传禅定之法，给江南佛教带来了鲜活的气象。

当然，智者大师毕竟是外来和尚，外来和尚好念经，但也对本地一些保守顽固的僧人造成了一些危机乃至威胁，偶尔便有本地僧人上门进行挑战甚至挑衅。此时的智者便产生想要离开金陵另辟清静之地的想法。他说：“瓦官寺地处都城闹市，环境杂乱，对修持不利。我在瓦官寺传禅定，第一年有四十人学禅，得法者有二十人；第二年一百人，得法者仍是二十人；第三年有二百人，得法者却只有十人。近来学法的人更多，而得道的人却更少。看来如此下去，

与弘法不利。”他曾做过一个梦，梦里他看到有岩崖万重，白云缠绕，红日挂在一边，沧海无边，浪涛翻滚，山上一个和尚在向他招手。智者把这个梦说给弟子们听，弟子们说那个地方应该是会稽山中的天台山。于是智者决定带领弟子离开金陵去天台山修行。此事传出后，金陵的僧俗众人都来纷纷挽留，甚至连陈朝皇帝也传话挽留。但智者去意已定，没有留下。南朝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智者大师来到天台，此后四方道众蜂拥而至。智者一边潜隐修行，一边讲经传禅，不久声名大振。陈后主几次派遣使者从金陵赶到天台邀请智者回金陵弘法，前几次都被智者谢绝了，后来陈后主让与智者过去来往密切的永阳王陈伯智去劝说，智者这才同意。

智者回到金陵弘法，陈后主以国师之礼节接待他。不久隋文帝杨坚带兵攻入金陵，陈国灭亡。隋文帝崇信佛法，邀请智者到长安弘法，智者没有答应。后成为隋炀帝的杨广受封晋王驻守扬州时，也邀请智者到扬州弘法。智者与杨广定约四条：一不要对佛法有过高的期望；二所有俗人的礼法规矩，智者可以有所不守；三来去自由；四想回山就回山。杨广答应了智者提出的这四条约定，智者便到扬州，主持了杨广为他举行的千僧法会，杨广还赠给他“智者”称号，“智者大师”名号由此诞生。智者大师坐化于隋开皇十七年，圆寂前遗意给杨广希望他在天台山助建寺院。开皇十八年杨广承智者遗愿在天台山南麓建寺，杨广接位隋朝皇帝后，赐此寺名为“国清寺”，意为“寺立国清”。智者大师一生弘法，他所创立的佛教派别因他曾住天台山故名天台宗，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佛教派别，其影响长达千年。

历史不能假如，不过，如果——也就是如

果——智者当年没有离开瓦官寺，他所创立的佛教派别会不会像南京牛首山法融和尚所创“牛头宗”一样被称为“瓦官宗”呢？现在古瓦官寺虽然游人稀少，香火更谈不上旺盛，但偶尔辗转找到古瓦官寺得以一游的人，个个都踌躇满怀：这是南京原址现存的最古老的寺庙。在此我要加上一句：这里还是中国第一个正式佛教派别智者大师天台宗的祖庭！

清凉寺与文益大师

全国山名清凉、寺名清凉的，很多很多。南京就有一座山叫清凉山，也有一座寺叫清凉寺。山不高，寺更小，但因山中文化蕴藏极为丰厚，故名气不小。本文单说清凉寺。

南京清凉山古名石头山，旧有兴教寺，始建于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曾名先才寺。五代十国时期杨吴权臣徐温于顺义四年（924年）予以扩建，使之规模日渐庞大壮观，并改名兴教寺。公元937年，徐志诰夺取杨吴政权建立南唐政权后，将位于南京城北长江南岸幕府山中的清凉寺移至城内石头山，寺与原兴教寺合一，定名石头清凉禅寺。南唐后主李煜登基后，再次易名为清凉大道场。山因寺名而改，故原石头山便改名为清凉山，寺院由兴教寺而改为石头清凉禅寺、清凉大道场，宋朝以后又改名为清凉广惠禅寺、清凉陟寺等，通称清凉寺，由此清凉山、清凉寺便一直沿称下来，直至当今。明朝葛寅亮在《金陵梵刹志》中写道：“石头山清凉寺在都城清江门内，中城地。南去所统天界寺十二里。古清凉山，吴顺义中，徐温建为兴教寺，南唐改石头清凉大道场……山不甚高，而都城宫阙、仓廩历历可数，俯视大江，如环映带……山门三楹，天王殿三楹，左钟楼

一座，佛殿五楹，右伽蓝殿一楹，右祖师殿五楹，毗卢阁三楹，方丈八楹，僧院九房。”由此可见，清凉寺在佛教发达、梵刹众多的南京，可谓中等规模。在佛教界让清凉寺名声大振的不是该寺之宏阔规模或山水之胜境，而是源于著名高僧文益禅师。文益禅师在此住持，并由此创立禅宗法眼宗，清凉道场闻名江南，清凉寺成为法眼宗祖庭。

中国佛教禅宗早期发展，与南京关联很大，主要有三。一是中国禅宗初祖达摩，当年他从古天竺国经羊城广州来到南京，因与南朝梁武帝机缘不投，故离开南京从今幕府山下一苇渡江，北上嵩山，十年面壁终破壁，被尊为禅宗初祖。二为牛头宗法融和尚。法融和尚常住南京城南牛首山幽栖寺，因得禅宗四祖道信大师传法而立牛头宗传牛头禅，此为禅宗有派别之始，从法融传智岩、慧方、法持、智威、慧忠，史称牛头六祖，在禅宗史上影响深远。三为文益禅师住持清凉禅寺，他被尊为法眼宗之祖。

中国禅宗从初祖达摩开始，传衣传法历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后经慧能大师发扬光大，继而慧能大师弟子南岳怀让、青原行思演化出南岳与青原两大法系，终成一花五叶，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后临济宗又分黄龙、杨岐两派，佛教史上合称“五家七宗”，其中法眼宗祖庭即南京清凉寺。我去过上述初祖（河南嵩山）、二祖（安徽司空山）、三祖（安徽天柱山）、四祖（湖北黄梅）、五祖（湖北黄梅）、六祖（广州韶关）的相关祖庭，也去过一花五叶中的曹洞、云门、临济、法眼的祖庭。相比其他祖庭，清凉寺现存历史遗迹最少、现建寺庙规模最小。

相关史料记载：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他是罗汉桂琛禅师之法嗣，上承青原行思，俗姓鲁，



文益禅师

余杭（今浙江杭州）人。七岁时从新定智通院全伟禅师落发出家，二十岁于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开元寺受具足戒。当时，希觉律师正在明州（今浙江宁波）鄮山育王寺大弘律学。文益禅师慕其名，亦前往听习，并深得其微旨。在此期间，文益禅师还旁涉儒家典籍，并学习写作诗文。希觉律师对他很器重，称他为“我们之游、夏（孔子的弟子子游、子夏）也。”文益禅师后被禅宗顿悟法门所吸引，决定放弃旧学，南下游方参学。文益禅师等一行三人来到福州，途经地藏院的时候，天下大雪，不能前行。于是三人便暂住休憩。一日三人正在烤火，地藏和尚桂琛（即罗汉和尚桂琛）问：“此行何之？”文益禅师道：“行脚去。”地藏和尚又问：“作么生是行脚事？”文益禅师道：“不知。”地藏和尚道：“不知最亲切。”接着，地藏和尚又同三人谈起《肇论》来，谈到“天地与我同根”的时候，地藏和尚突然问：“山河大地，与上座自己是同是别？”文益禅师道：“别。”地藏和

尚于是竖起两指。文益禅师一见，便道：“同。”地藏和尚又竖起两指，并起身而去。不久雪止天晴，三人便向地藏和尚辞行。地藏和尚把他们送到山门口，问文益禅师：“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说到这里，地藏和尚便指着庭外的一块大石头，问道：“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文益禅师道：“在心内。”地藏和尚反问道：“行脚人著甚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文益禅师被窘得无言以对，三人当即又返回地藏院，放下行李依地藏和尚法席，祈求地藏和尚为他们抉择法义。这样过了将近一个月，文益禅师每天向地藏和尚虽呈述自己的见解，可地藏和尚却只是对他说：“佛法不恁么。”文益禅师非常绝望，说道：“某甲词穷理绝也。”地藏和尚道：“若论佛法，一切见（即现）成。”文益禅师一听，言下大悟。后来文益开创了法眼宗，成为禅宗五家之一，他强调“一切现成”的观点，正是由桂琛点化开悟而来，并成为法眼宗的玄旨所在。

法眼宗为禅宗五家中最后创立的宗派，一度极其隆盛。法眼宗道场清凉寺也成为闻名江南的首刹，香火之盛，游人之多，可从宋朝诗人刘克庄的诗中略见一斑：“塔庙当年传一方，千层金碧万缁郎。”四方前来求道问禅的大德高僧不计其数，仅朝鲜来此的僧人，有详细记载的就达36人。一度法眼宗传入朝鲜、日本，并盛行于东亚、东南亚地区。宋朝著名诗人苏东坡曾数度来到南京清凉寺游览，并与清凉寺和尚时有唱和，其中《赠清凉寺和长老》一诗如下：

代北初辞没马尘，江南来见卧云人。

问禅不契前三语，施佛空留丈六身。

老去山林徒梦想，雨余钟鼓自清新。

会须一洗黄茅瘴，未用深藏白氎毛。

当年南唐国主李璟听说文益禅师的道名，便

邀请他到金陵，住持报恩禅院，署号净慧禅师，后来又请他入住清凉道场。文益禅师与南唐国主李璟关系甚密。一日，文益禅师陪李璟观赏牡丹花。李璟请文益禅师作偈，文益禅师当即赋云：“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李璟一听，顿悟其意。文益禅师曾就“三界唯心”作颂云：“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唯心，眼声耳色。色不到耳，声何触眼。眼色耳声，万法成办。万法匪缘，岂观如幻。山河大地，谁坚谁变？”文益禅师圆寂于后周显德五年（958）七月。春秋七十四岁，谥大法眼禅师。有《宗门十规论》传世。

文益禅师圆寂后，法眼宗传天台德昭，再传永明延寿，其间盛于江南前后百余年，但此后在佛教界影响式微，法眼宗渐趋衰落。不过缘于清凉寺盛于清凉山的庙会，倒是让清凉寺在南京诸多寺庙中还算香火未断香客众多，历宋元明清直

至民国前，民国后清凉寺方才被拆除殆尽。

而今清凉寺已经建成仿古大殿一座，另有僧舍几间。2009年6月，这座历史上法眼宗的祖庭清凉寺终于恢复开放。尽管目前规模尚小，只是一座殿堂，离汉传佛寺基本规制相传较远，但寺庙已经有僧常住，香客不绝如缕，几位尽心尽职的义工更是该寺的一道风景线。大殿前一尊高大挺拔的香炉，香炉铜壁上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所题写的“清凉大道场”赫然醒目，似乎在述说着当年文益大师弘法时门庭若市的辉煌。

马建强 男，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编审、教授，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馆长。



清凉大道场（吉强 摄）

城市山林话米芾

||| 张大华



米芾自画像

“城市山林”，是米芾经过几十年潜心揣摩，给镇江这座古城起的一个美妙的名字。800多年过去了，他书写的这块石刻，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在镇江碑林。

米芾，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北宋杰出的书画家。曾任校书郎、礼部员外郎，宋徽宗时期被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襄阳”、“米南宫”。历史上记录米芾事迹的著作较多，主要有《宋史·米芾传》和清代翁方纲《米海岳年谱》等。

米芾一生官阶不高，但却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以杰出的书画成就影响千年。他的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是我国文人山水画的开山巨擘。可惜他的画存世稀少，除台湾故宫博物院有收藏外，大陆已经难得一见了。现在人们最熟悉的是他的书法，目前存世的手迹有近60幅。2002年，他晚年的书法杰作《研山铭》回流国内，被国家博物馆以巨资定向拍下收藏。90高龄的书法泰斗启功先生看到原作真迹后，高

兴地说：“是眼福呀，能看几天就多看几天！”

苏东坡评价米芾的书法说，“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米芾书法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史料记载他是：“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米芾书法用笔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在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上，他追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在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自称自己的书法是“刷字”，明里是自谦，而实际上是在不经意间，活脱脱地说出了米芾书法的精髓和神采。“刷字”，体现了他用笔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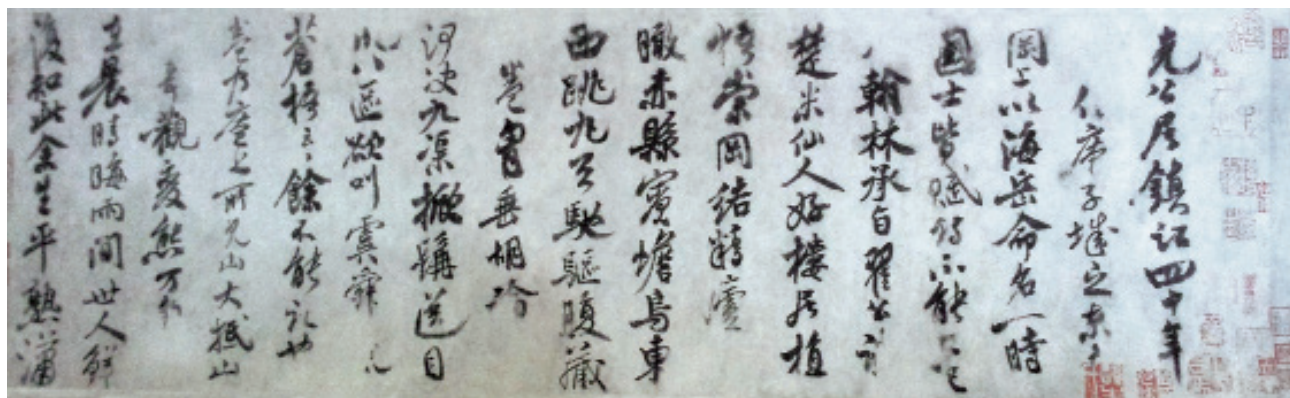
疾而劲健，尽心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

米芾书法在南宋时期就得到高度重视，宋高宗赵构曾经广为收罗，藏之内府。学习米芾书法也成为一种时尚，曾经做过镇江府通判的著名书法家吴琚是公认的学习米芾的高手，他的精品几乎可与米芾书法乱真。现在镇江北固山的“天下第一江山”六个笔力千钧的榜书大字，就是吴琚留在镇江的书法真迹石刻。

米芾自青年时代就定居镇江。他的儿子米友仁在自题《潇湘奇观图卷》中说：“先公（米芾）居镇江四十年，作庵于城之东高阁上，以海岳命名……卷乃庵上所见，大抵山水奇观，变态万千，多在晨晴晦雨间，世人鲜复如此。”米芾被宋徽宗诏为书画博士，一个重要任务是鉴定宫中所藏的1500多件五代以来的书画，并编成了《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这样的经历提升了他的艺术境界，因此他长期居住镇江，师法自然，把镇江的山水作为实验田。他在《海岳庵》中自题道：“先自潇湘得画境，次为镇江诸山。”面对镇江南山变幻莫测的烟云，他创作了以墨点为主的表达方法，利用泼墨、积墨、

破墨来展现浓浓淡淡、虚虚实实的烟云变化，给人以迷离朦胧的意象。这种变“画”为“写”，以“墨”代“线”，以“信笔”代替“摹写”，以“墨戏”代替“丹青”的方法，开创了中国文人画的先河。对于自己的这一创造，米芾曾经自豪地说：“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而已”；“余性喜泼墨作云山，虽本之王洽，而时出新意，亦或有超出古人之处，此墨戏一卷为一时兴会之笔”。后来人们把米芾创造的这种通过水墨点染来表现江南云山烟雨变幻的方法，称为“米氏云山”和“米家山水”。2013年12月，我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看到一幅米芾的山水真迹，被画面上“春雨初霁，江上诸山云气张漫，冈岭出没，林树隐见”的景象所陶醉，站在画前仿佛是置身在清明前后的镇江南山，想到的就是“鹤林烟雨开画本”。

米芾晚年好佛学禅，特别喜爱南郊黄鹤山的鹤林寺，认为这里是念佛习画的佳所，表示死后愿做鹤林寺伽蓝神护寺。鹤林寺建于东晋，是江南著名古刹，寺前有晋时“十三松”。寺外层峦叠嶂，树木葱茏，景色十分秀丽。一般寺院的伽蓝神都供奉在寺院之内的山门，而鹤林寺却在寺外建祠供奉伽蓝神，寺院认为这伽蓝



米友仁自题《潇湘奇观图卷》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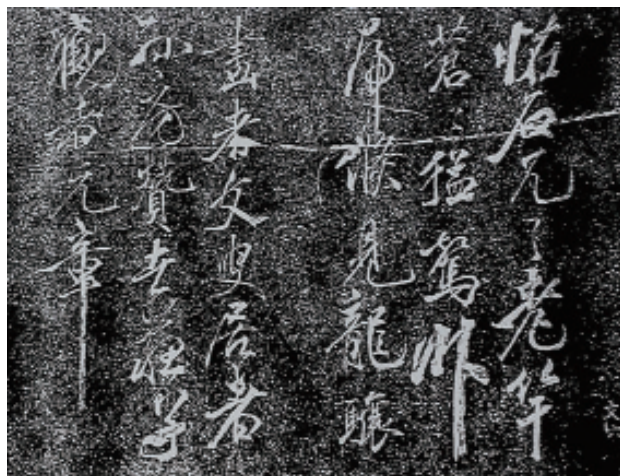
米芾“城市山林”碑

神就是米芾的神灵。据曾经做过丹徒县官的宋代著名文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米芾除对润州金焦北固的江山名胜极为爱慕外，对南山鹤林寺的松石山川也喜爱有加，自愿在死后，来做鹤林寺的伽蓝神，以永护名胜。后来，米芾刚死，鹤林寺内的伽蓝神果然倒塌，于是他的生前好友在鹤林寺外专门建了一座伽蓝庙，以让米芾的神灵永远呵护名山胜迹。伽蓝庙建好后，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书写了牌位：“当山护法伽蓝神御史米公神位”供奉殿内。

对这件事，《鹤林寺志》也有明确的记载：“元章与寺僧聪禅师交相契甚，晨夕往还。元章每曰：‘有心护法此山。’师曰：‘无戏言。’曰：‘他日我死，寺中钟鼓自鸣，即神来矣。’将死，语子曰：‘鹤林缘熟，我神将栖之。’师设祠而迎，梵乐皆鸣，如其言。”

苏东坡与米芾是多年挚友，苏东坡曾戏称米芾是“狡兔三窟”。这是说米芾在镇江有三处住所。最初在城西建了“宝晋斋海岳楼”，后来楼被火烧毁，又在城东北固山下建了“海岳庵”。他在居住镇江前获得了王羲之的《王略帖》、谢安的《八月五日帖》和王献之的《十二月帖》等晋人真迹，因此将新建的书斋命名为“宝晋斋”，他自述：“无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释笔，

临学之。夜必收于小篋，置于枕边乃眠。”在这里，他写下了“华胥兜率梦曾游，天下江山第一楼”的著名法帖《多景楼诗》。在诗后，特意缀题了“多景楼”三个大字，注曰：“禅师有建楼之意。”直到现在，镇江北固山的多景楼匾额，一直沿用这三个弥足珍贵的大字。此外在千秋桥、鹤林寺旁还建有精舍。如今，米芾在镇江留下的遗迹仍有许多。在焦山碑林保存的米芾石刻有6方，其中摩崖石刻2方、碑林4方。



米芾题文同墨竹

摩崖石刻的2方，一处在罗汉岩的题刻“建中靖国米芾”六字。这是宋徽宗即位后年号。米芾书此年号，表达了对党祸平息、国家安定、天下太平的愿望。另一处是在浮玉岩的题记：“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观山樵书”，这16个字苍古奇峭，拙朴疏朗，有明显的《瘞鹤铭》书风。文中的仲宣和法芝分别是甘露寺、金山寺僧。

在碑林部分的4方石刻，一是位于第二室的明刻米芾临《兰亭序帖》。碑后有文征明的评跋。碑阴有米芾临东汉张芝《八月九日帖》、王羲之《晚复毒热帖》、王献之《鹅群帖》和米芾自书《醋库帖》。这块碑原由浙江归安吴云收藏，清同治年间由吴云送给焦山宝墨轩收藏。吴云曾任镇江知府，编有《焦山志》。

二是位于碑林宝墨轩前院西廊的“城市山林”碑。这是米芾在鹤林精舍的自题横额，非常贴切地说出了镇江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山城一体、有动有静的城市个性和地理特点；书法清雄绝俗、超迈入神，应是米芾晚年的作品。这块碑原在鹤林寺古墨林内，1960年移至焦山碑林。

另外在焦山碑林的澄鉴堂石刻部分，还有米芾题文同墨竹和苏轼墨竹诗。在文同墨竹上行书题跋：“怪石兀兀，老竿苍苍，猛惊卧虎，倏见龙骧，画者文叟，居者孙房，赞者苏子，观者元章。”题苏轼墨竹的是首七言诗，他在诗中称赞苏轼的墨竹是“长公写竹真是竹，气韵不减文湖州”。

米芾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镇江，晚年短暂住在京城，57岁任职淮阳军时，于徽宗大观元年卒于淮阳军舍。根据他生前的愿望，其子米友

仁及亲友将其归葬镇江，并在南郊鹤林寺山门前立祠，供奉米芾遗像。明代万历年间，鹤林寺住持发现了米芾墓地碑刻，当即立碑建墓，请米芾后裔、明代书法家米万钟书立“宋礼部员外郎米芾元章之墓”碑。墓前原有石坊、墓碑、墓冢，明末崇祯年间又加修葺，清代至民国早期曾重修墓冢及碑坊。1987年镇江文管会在距原墓地80米的黄鹤山北麓复建了米芾元章之墓。墓围12.6米，坟冢直径4米，用优质白色大理石做墓墙，坐南朝北向。墓前立有2米高的大理石墓碑，碑文上刻“宋礼部员外郎米芾元章之墓，一九八七年春日重修宋礼部员外郎米芾元章之墓，曼殊后学启功敬题”。墓前是宽阔的凭吊平台，墓门前依山势向北延伸，以台阶与山脚石牌坊相连。复建的米芾墓牌坊，按三门冲天式恢复了原状，石坊柱上镌刻楹联：“抔土足千秋，襄阳文史宣和笔；丛林才数武，宋朝郎署米家山。”

米芾与丹徒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为纪念这位艺术巨匠，2010年，丹徒区人民政府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出版了《米芾书法全集》31卷。2015年又在丹徒新城旁十里长山大学城，新建了占地40多公顷的“中国米芾书法公园”。

米芾已经是镇江的一张文化名片。

张大华 中国文物协会会员、镇江市民宗局原副局长。

书事唯大谁比痴 ——赵氏父子与脉望馆

||| 缪克



章卿花草自春色，这块土地流布着历史悠远的芬芳。

赵氏张家港章卿支所在地由章卿寺得名，寺“建于东汉，在章卿镇”，实为三国时吴赤乌年建，盛名于江南。种种世事说起来就离不开寺院、宝殿、佛堂、香火，加上传说孙权母亲常来寺点烛烧香，这在乡村旧年纪事中是说得着的文化了。沧海桑田，越数百年它成了一方儒家文化荟萃之地，直至宋明，其间草蛇灰线，关联湮漫，难以索找，人们转而从看得见的名门望族认定它的风华——赵氏一族，读书、中举、宦途，加上高大的鼎魁牌坊，风光而宏壮。

赵氏一支后来于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就婚”奚浦，从江阴章卿转为常熟的鹿苑，世事变迁现两地均在张家港境内。如果当年没有“就婚”之举，那么至嘉靖年间倭寇在章卿附近斜桥、蔡港一带多次劫掠烧杀，越是名门望族之家越难逃灭顶之灾。赵家其时已至常熟有年，得逃过一劫。

从赵氏谱序可知，章卿赵氏原为赵宋王朝宗

室，后来江阴始迁祖赵士鹏长子赵不违“爱龙山之秀，辟地而居，是为章卿支始祖也”。之后章卿赵氏支系中，又有必瑯为南宋嘉定进士，必瑯之子赵良发为嘉定癸未探花。赵士鹏第十四世孙常熟奚浦赵实，于明代正统年间就婚于奚浦钱氏，成为“迁虞之始祖”。以后迁居常熟城内，子孙繁衍，蔚为大族。明嘉靖戊子进士赵承谦、隆庆五年进士赵用贤、藏书家赵绮美、崇祯丁丑探花赵士春等族中名人，均出自奚浦赵氏。

赵家最先醉心书事的是赵用贤。赵用贤字汝师，号定字，隆庆五年（1571）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万历初年授“检讨”之职，天启时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总体上说赵氏早期仕途快进，以后宦途蹭蹬不前，进而沉浸于文化中，对家族性文化流传和积累作用是巨大的，使整个章卿支赵氏在特色文化上一代代接续。

这期间对赵氏文化传承有重要意义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赵用贤为官胸怀浩气，谏争从不考虑得失。万历五年（1577）赵用贤等上书纠劾宰相张居正违背儒家传统和伦理纲常，父亡后未尽“守制”的孝道——这实际是明神宗

朱翊钧倚重张居正，令其继续为官是他的旨意，众官仍执着弹劾。这一“逆龙麟”之举致使神宗极表震怒，下令对赵用贤等人实施严厉廷杖，并除名革职。第二件是，赵用贤起用后关心民瘼，苏湖嘉所贡财赋超过国家一半，然民生极困难。赵用贤与进士袁黄调查后，以《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上奏，陈说民困请求减负，遭权臣无理指责而未能施行，又抓住他细事弹劾免官回归故里。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赵用贤峻急好争，耿介直言，据理不让，使他仕途总如悬崖边行走。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最后志于藏书。史称他“夙富藏书”，后以“松石斋”名楼，藏书达2000余种，万余册，其中1500种为稀世孤本，编有《赵定字书目》，自著《松石斋集》《三吴文献志》《国朝典章》《因革录》。其间也有与子赵琦美共同搜书、藏书、刻书，得善本，往往由父赵用贤作序，子琦美刻之，一时传为佳话，为脉望馆奠定台基。

喜好是对某种东西念兹在兹，深入血脉和心志，有他人领略不到的滋味。神凝此物，余事成空，其用心也，入迷黜智。屠者庖丁解牛可解为一痴，由此观照，文化史上石痴、画痴、琴痴——多为有非凡功力者，而赵氏“父子皆喜藏书，为隆庆、万历间著名藏书家”，最终在藏书文化上立足而盛发，那应是“书痴”了。

二

斗转星移，年轮擅增，家族重心转移到了赵琦美一代。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父子搜书藏书刻书是共同的，但子一代有自己的风格。

赵琦美为赵用贤长子，原名开美，字仲朗，号玄度，别署清常道人。家学庭训，少时“天性颖发，博闻强记，落笔数千言”，以父荫他做过太仆丞，南京都察院照磨、太常寺典簿、都

察院都事、迁刑部郎中等。

居官时，赵琦美“损衣削食，网罗载籍”，其时江南文化氛围更趋浓厚，仕人向雅是旧习，藏书成为明代新兴雅事。作为一种追求，搜书、藏书、刻书成为社会风气，“许多文人学士都有藏书的习惯，很多人爱书成癖，视书如命，不求仕进，却把藏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是当时风气的写照。赵琦美藏书堪称宏富，“痴书”已闻名全国。

赵琦美任南京太仆寺寺丞时，负责南直隶的马政事务。太仆寺看起来是个管理马政的机构，实际上承担着重要的国防与军事事务。汉民族与往往成为边患的游牧民族间展开军事攻伐，军马的数量与品质是战斗力的重要指标，太仆寺对国家的军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赵琦美在任时每借书事发挥，更使他业务精进。《常熟县志》载：“琦美官南京时，修治公枋（马房），费约而工倍，曰：‘吾取宋人将作《营造法式》也。’”一个寺丞取《营造法式》而实用之。



赵用贤像



在太仆寺管理马政，日常看视“各处马匹印烙、点视悉至滁（滁州太仆寺）”，按规定对马驹、种马、军骑须用相应各类印章烙字，后更有详细规定，如骑养马、五军等营印各种不同的字。（明杨时乔《皇朝马政记》卷10，第381页）下边做印烙之事，人莫敢欺，赵琦美的利器正如他说的：“吾自有《相马经》也。”后“升都察院都事，厘正勾稽，必本旧章”。所有这些，说明赵琦美认真而求实，他的藏书知识学以致用，使他有超出一般官员的业务素质，映证着他对书事痴迷与涉猎。

明神宗末年，建州（辽东）部落经常骚扰、蹂躏边地，赵琦美作为太仆寺丞出差将大批马匹解送出关到那里，得暇他匹马出山海关，考察周览扼塞要害，遇废将老卒，从容访问明朝所以败绩辽人部落所以取胜的原因，听到要害处他感动激发沧然流涕，慨然奋臂出其间。他上书条陈方略，上面仅作为“例报”——例行公事闻达而已。

赵琦美丰饶的内心一片黯然，好在回程中挨次到书肆搜罗书籍化解，穷时节现，读书藏书还是他的本色。

赵琦美生活中“以网罗铨序古今典籍为乐事”，父亲去世后，他已度过而立之年，正好袭父荫十年左右。此后他为官少见记载，却多有专意做“蠹鱼”的消息。蠹鱼是蛀蚀书籍的小虫，蠹鱼恋书，这仿佛是爱书人与生俱来的宿命。“蠹鱼”出自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枕席经史，沉湎青缙，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赵琦美早就开始了他的“蠹鱼岁月”。

赵琦美舍得花费时间倾心校勘珍本古籍，那些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和历史价值的书籍，往往自己刊行，以精美装帧署“清常道人”面世。有时得到别具价值残本，必尽力补缀之，使之完善，发出光辉。为了校雠杨銮之著《洛阳伽蓝记》，赵琦美百计购得珍贵的陈、秦、顾、孙四家抄本，一一认真比对、鉴别、推敲，先后改正错字、误植、蹀入或脱漏之文808处。此后并不稍歇，见到燕山龙骧邸版《洛阳伽蓝记》，如获至宝，认真核对，再改正此书50多处错讹。为抄校此书，前后达8年之久，斥资之大，竭思之巨，费时之久，前所未有的。最终辑成会校本《洛阳伽蓝记》，为迄今存世最完备，最精准的版本。

他凝神聚力的北宋建筑家郑州人李诫所撰《营造法式》，此是建筑业之圭臬，可称当时世界科技巅峰之作，明代此书已残缺不全。赵琦美决意校雠刊刻此书时仅购得部分内容，全书缺漏整整18卷。他暂停刊刻，深入民间，遍访各地藏书家，求得残本3卷；他为太仆寺丞时与内府有交往，又借到内阁本，手自抄录，比勘校正，删讹增脱，经20余年艰辛努力，将此书卷帙收集完整。他为求锦上添花，使这部建筑学专著图文并茂，不惜以五千金高价雇请高手绘制精美插图和良工刊刻付印，使这一濒于

失传的珍贵建筑学古籍得以传世。此书后辗转为钱谦益、钱曾等多位名家或收藏、或抄录，被视为珍宝。20世纪初中国古建筑研究家朱启铃在南京图书馆发现赵琦美刻《营造法式》，大喜过望，广为刊印，并成立包括梁启超、林徽因等名家在内的中国营造社。赵琦美刊刻《营造法式》在中国建筑史成为一个里程碑。

三

赵琦美的书业是多方面而深入的。宋至明时是我国俗文学的传奇剧时代。许多传奇剧故事生动，表演精湛细腻，结构精练完整，人物形象鲜明，许多曲词不但在舞台上演唱，坊间也常飘散情文并茂的低昂吟诵。长期流传中它像山野水畔花草随生随灭，赵琦美对这株文化奇葩痴迷爱好心有灵犀，一旦决定广泛收罗，即使穷年累月在所不惜，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他在北京抄录、校阅所见所藏各本杂剧，纂辑为丛书《古今杂剧》242种。其实这是最后确定数目，中间钞校的远远超出此数，仅后来到钱谦益、钱曾手里的就有340种。在此之前，研究元杂剧多仗臧懋循的《元曲选》，臧选刊于万历四十四年，选杂剧百种，而赵琦美辑《古今杂剧》，较前者起码多了一倍半。该丛书辗转传世，历经钱谦益、钱曾，一直到民国常熟丁祖荫等传藏，最后经现代文献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之手，历经三百年归藏于北京图书馆。这套全称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丛书，为我国古代戏剧瑰宝，是当代学者研究古代戏曲和社会的稀世珍品。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中将此书重新出现誉为仅次于敦煌卷子、居延汉简、内府大库档案的重大发现，由此可见这部46册、242种《古今杂剧》巨型丛书的历史文化价值。

对这样的巨制赵琦美投入的热情自非寻常，

他的整理方式已超出一般的校勘，形成一套自己的步骤：一考证，二抄录，三校勘。

赵琦美抄校杂剧，首先对杂剧作者进行考证。如《死生交范张鸡黍》作“宫大用著”，他批语为“于（小谷）本作费唐臣”。《大妇小妻还牢末》，赵琦美校内本说：“别作马致远，非也。依《太和正音》作无名氏。”他还进一步对作品题名考证，如《讲阴阳八卦桃花女》，赵琦美注：“《太和正音》作《智赚桃花女》”，他用并不鲜见的资料注释，其用力和细心却是显见的。

其次是抄录剧本。赵琦美抄录剧本十分注意保存剧作内容和行款格式原貌。如于小谷本实为演员的台词脚本，存在版式随意，行款、字数不等，曲牌外加括号，唱词重笔抄写、宾白轻笔抄写等情况，而内本的抄校，格式规整，不少地方又自成体式，他在抄录时都维持原貌，较好地保存了元曲稿本初时风貌。

第三，赵琦美校勘，更多地偏向文学。他不但注意改正字词、地名及知识性错误，如“试说”、“试看”、“试听”之“试”改前皆作“是”；又如三国题材的“刘封”，几乎所有抄本均作“刘峰”。在校勘中他更多注意语言的润饰，如《飞



虎峪存孝打虎》将唱词中“我这里”、“我去那”等衬词尽行删除，更见干净利落。适当校改不当语句，如《张公艺九世同居》第二折〔南吕一枝花〕“昨是春，今日春，到无常，万事皆休。”改为“昨是春，今日春，到中年，万事俱休。”更加合理。有些还作较大改动，如《伍子胥鞭服柳盗跖杂剧》，头折中百里奚有段五百多字的科白，他删去九十四字，增补、改动十六字，共计变动一百一十字，占内容的五分之一。改动后语言表达准确，通畅，文雅，富于节奏感，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为戏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对赵琦美好书校书勤勉之风极为钦佩，称“每睹清常（赵琦美）手校书籍，未尝不汗下如浆也”！

四

盛名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抄本，也使脉望馆这一累世而成的藏书楼扬名天下。

赵用贤宅，原在虞山镇程家巷（即望仙桥畔），当时赵用贤在此筑有“松石斋”藏书楼。嘉靖年间，常熟知县为抗击倭寇侵扰，将城址西迁，赵氏随之移居城内西南九万圩百叶街，就此置地建宅，百叶街也因此改名南赵弄。宅院东起西泾岸，西至金李庵桥北堍。宅内大厅东侧即赵琦美取名“脉望馆”藏书楼，后因书楼所藏声名远扬，人们惯以“脉望馆”统称赵氏故居。

脉望馆旧址坐北朝南，此宅建筑年代当在明万历前期，形制大体为品官中低级宅第。这样品级并不算高的藏书宅第却折射出浓郁的社会文化气候。自明嘉靖以后崛起的常熟派或虞山派藏书，就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明清以来，作为中国私家藏书中心之一的常熟，素有“藏书之乡”的美誉。明清二代，常熟一地项背相望的名家迭出，有藏书家近300人，赵用贤和儿

子赵琦美作为明朝隆庆、万历年间著名藏书家，其脉望馆与钱谦益的绛云楼、毛晋的汲古阁齐名，为中国古代藏书史上具有极高地位的江南著名藏书楼之一。

赵琦美受父熏陶，卓有文风，尤在搜访和校讎刊刻典籍方面胜过其父。据赵琦美编订的《脉望馆书目》著录，收藏图书近5000种、20000余册。据不完全统计，刊书达36种、126卷，抄校了大量秘本。他一生孜孜不倦地抄录了许多文献，除《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外，他又从书贾处搜得宋版孙逢吉《职官分纪》第7卷、世上罕传的《劳山仙迹诗》《东皋子集》等价值连城的孤本与珍本。

在这样的书香氛围中，赵琦美的搜书、藏书、校书、刻书事业，成为他终身功业的荦荦大端，他长期经营的脉望馆更见充实饱满，最终为明时社会性的藏书事业而争胜添彩。

还是钱谦益说得好：“君之于书，又不徒读诵之而已，皆思落其实，而取其材，以见其用于当世。诸凡天官、兵法、讖纬、算历、以至水利之书，火攻之谱，神仙药物之事，丛杂荟蕞，见者头目眩晕，君独能谙记而悉数之。”

赵琦美在江南文化史上居于令人仰视的高端——惜其撒手后，接手难得其人，后转翁同龢接手，中经多人。从另一方面看，也许这就是历史，书人就是这样一茬一茬接续，推动江南书香社会形成千人糕式的集体创作，赵氏则是痴心其中的重要阶段性人物。

书事如江水不尽流，痴者搏其间。

缪克 男，张家港市开放大学高级讲师。

父亲的名章

||| 谢 舒



桑宝松刻 陶白名章

父亲住医院了。那年探亲我就一直住在医院陪他，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太少了，也快没有了。回家拿换洗衣服时，推开父亲书房，进去站站，看看，出神。房间久无人住，落了薄灰。随他几十年的书桌上，有个樱木笔筒，里面几支毛笔，笔尖干结。铜水盂的底如旱田龟裂，几枚回形针散落，钢笔笔身笔套也分开了，线装书参差叠放，圆形端砚旁有一枚正方形章，刻：陶白。浅红格子纸上留下父亲的竖行钢笔字，他最后的笔迹：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那年深秋，父亲走了。

第二年春天，我回南京出差，站在赤壁路17号门口，一时不敢跨过门槛。望院子里看，香樟树高直，叶丛茂密，是父亲自北京南归那年栽的。沿狭窄的楼梯到二楼，也不大敢进客厅，父亲不在了这个事实，像沉重的固体压在我们

身上。走进书房各自坐下，都不说话。走到书桌旁，我拿起那枚名章，托在掌心，跟姐姐和弟弟说，我想把这枚章带回纽约，可以吗。他们说，你带回去吧。

我要带走父亲一件旧物，他生前常触摸的旧物，最映照他人生的旧物。

父亲跟书房总是不分，在书房看书，写杂文，沉思，跟三朋两友高谈阔论，“文革”初从早到晚孤坐书房写检讨认罪。从北京告老回宁，更在那里坐禅听蝉。墙上挂一纸未装裱的横幅“鸛鹑斋”，他的亲笔。

书房里的父亲是他最写意的身影，陶白名章最是他这个人。

章，是扬州篆刻家桑榆先生所刻，宝松是桑榆的号，也叫桑宝松，阿松。上世纪70年代初，母亲离开了镇江蚕种场干校，去扬州师范学院任职。未几，父亲也得解放，外放扬州任文教



陶白名章边款

处第七副处长。父亲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说，我一生里三分之一时间走路，三分之一时间开会，三分之一时间写检讨。所以在扬州的那些日子，便是他最放达的日子了，不开会不写检讨，就是常常走路去书店、古玩店、农贸市场，还有我们居所近旁的瘦西湖，那个走路是自由自在地走。在扬州，他结识交往的多是坊间的书家画家、篆刻家、收藏家、文人学士，总之“三教九流”。他们跟他在一起分不出他是个当官的人，轻松自在，谈笑风生，抽烟掸灰好像神仙。与桑宝松就是寓居扬州期间结识的，时间不很长。人生相识相知相惜，不在时间长短。

我与扬州是天然亲，或许因父母经过动荡，离开干校后去的是扬州，扬州便有容纳之恩。第一次从文工团去探亲，背着手风琴走过大虹桥，瘦西湖嫣然在望，就心仪那景致，好像前世的底片突然显影。父母住师范学院一栋小楼的二

楼，隔窗可见野外农田，湖边大片芦苇，平山堂的钟声也能听见。父亲常出去，双手背在身后，跨过边门踱步沿河走去，水中荷花气派。每与友人见过，父亲回到家总神清气爽，目光炯炯，说话声音响亮，猜他又看到一幅好字画，又有一番你知我知的说古道今。我很少看到父亲有那种自在奔放，一派闲云野鹤风采。如果后来他在扬州终老，我不会感到意外。

唐山大地震后，院内纷纷盖防震棚，以避余震之灾。父亲把小床搬到草席竹竿搭建的棚里，置书桌于内，空气潮湿地上长草，夜里虫鸣一片，他过得十分安闲，甚至不想搬出。在防震棚里父亲度过不短时日，烛光下写过很多长诗。朋友们去他那里抽烟，喝茶，聊天，忧国忧民，留下往来书信。

2017年初夏和家人去扬州，专到旧居看看。父母曾住过的小楼空无一人，不拆不修也就格外清冷。另三座同建于50年代的楼，虽有人住却人气寥落。墙外满是爬山虎，窗户栅栏生锈，只门前那棵老松还在，不复郁郁葱葱。姐感叹说，怎么成这样了？从前这里很热闹，天天高朋满座。我问她有没有见过桑宝松，她说，当然，他常来，个子高，清瘦，像电影《林家铺子》里的人物。寥寥数句，如见彼情彼景彼人。

1978年父母调离扬州回南京，将赴中央党校任职，那时父亲已年近七十，重新开笔写杂文，稿约不断。他有好几个笔名，常用的“广陵散客”就因在扬州的几年生活而取。数年后父母离开北京归根南京，扬州便在身后了。但扬州的许多人事，父亲念念不忘，他对扬州的感情几乎可比他对故乡江阴和南京的感情。在扬州买的一些字画古籍，他都带回南京，桑宝松为他刻的章珍藏身边。父亲去后，整理他看过的书，多盖有他本人的名章或闲章，桑宝松刻的这枚名章也用。

1993年父亲去世，那时桑宝松已走了14年，

脑溢血猝然过世，得年五十。当时，桑家人给时在北京的父亲发电报，父亲让弟弟去颐和园附近邮电局复电，大意说，他与宝松为忘年之交，感情很深，宝松去世，至为悲痛。这是弟弟说给我听的，他自幼喜爱篆刻，父亲带他去过桑宝松家，后来他也刻图章也练书法，都好。

桑宝松作为篆刻家的名声越来越大，林散之说桑章“搜却精灵，偷取神风”，高二适称他“刀法超奇，功深从容”，这两位都是著名草书大家。篆刻家韩天衡更赞桑宝松为“印魂”。我给书画鉴定家萧平先生发信问及桑宝松，他回说：桑印是很有水平的，南博老人王敦化即称其为江苏第一。还说，桑宝松与他关系很好，为他刻过不少印章。

我们往往对久居之地不知方圆，无感日深，也往往对身边的人不太用心用情，疏忽大叶，于是有很多遗憾，亡羊补牢仍是补不全。写这篇文章就是这样的遗憾促成。父亲收藏的印章、书画、瓷器和古籍书，他在世时我都不看。后来他捐赠文物给江阴博物馆以及南京博物院，既出自他对文物何去何从的忧心，出自对家乡和南京的感情，可能也跟我们对文物不懂不学生出的担心有关。

名章随我回到纽约，放在双层书桌的上层，每坐下写作，父亲的名章与我素面对。“陶白”二字是阴刻，填满红色印泥，经久不退。章料是普通寿山石，石下有纹，像冰裂纹也像云片纹，包浆厚，边角有细小磕碰，可见是常用。章另一端满工雕花，坨工的老活儿，蝙蝠云纹粗率拙朴，边款刻：甲寅大暑，阿松仿切玉法。

那时我正在翻看《赵汝珍鉴宝秘籍》，有一章专论章印，提到“切玉法”。在桑章上看到“阿松仿切玉法”时，不解其意，不料很快即从赵汝珍书中看到切玉法之解。行内话说切玉法刻章，平整工稳，线条方中寓圆，简洁无华，不激不厉。“陶白”二字正是这种风格。刻章，字

少尤难，不能躲藏，不能变法不能借边，像无伴奏合唱，全凭歌者的音质音准，更靠微妙天成的乐感。

赵汝珍说“凡是印，字简单就要有劲，要让它像太华孤峰”，“陶白”二字简单，但不像太华孤峰，孤字单薄兀立；“字长要开阔，使它像大石乔松”，“陶白”二字方正，不像乔松高拔；“字大就要健壮，就像大刀入阵”，方方正正的“陶白”二字也许最接近桑章的刀法取意。

桑宝松曾在扬州工人子弟小学做事，后调第七中学教语文和书法。这第二份工作，是父亲在离开扬州前，嘱托有关方面予以关照方才解决。这件事是后来从别人文章中知道的。2008年，扬州教育学院美术系教授张郁明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蓬莱文章建安骨，孤山明月广陵潮——写在桑榆先生八十诞辰纪念之际》，最后一章题为“桑榆生命中的三个人——蔡易庵、孙龙父、陶白”。他这样写道：

前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陶白，“文革”期间下放扬州，期间遍交社会名流，孙老和桑榆家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陶老喜收藏，精鉴别，孙、桑是他首选切磋人选。1977年春，陶老得到落实政策，扬州地委为之开了欢送会，送陶回省复职。陶老在欢送会上说，“扬州是文化渊源深厚、人才辈出的地方。在我下放扬州这些年中，有两个人令我叹服不已。一是卞孝萱，一是桑榆。希望你们以地方文化事业为重，人才难得，善待之。”陶老话一出，惊动了扬州地委。卞老其时在北京搁浅，很快调回扬州师院。而桑榆的工作环境也得到改善，调至市七中任教。

最生动的是，张教授描述了父亲离开扬州前一天，到桑先生家告别的情景，父亲在桑宝松家吃了午饭，临别时送给桑先生一方蕉叶白端

砚，微有磕，成色老旧，系清代珍品。桑榆赠父亲一幅李渔七言对联，书苏东坡诗句：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李渔的书体介于楷书之间，“取横势，极扁极扁，极佳，这种扁形的书体我至今再也没有见过，可谓书中奇品。”这是张教授原话。

所提李渔的七言对联，我没在父亲书房见过，见过的是李渔的五言诗对联，极扁极扁的书法：江湖归白发，诗画醉红颜。家兄数年前写过一篇关于李渔的文章，题目就是《江湖归白发，诗画醉红颜》，在《扬子晚报》登载，影响颇大。他写到此联时说：“上联下端盖有‘江都桑氏珍藏’章，这是桑宝松先生的印记。”此联终年挂在书房门与客厅转角处，一种极少见的浅红宣纸，扁横书体。那时，友人间送古玩珍品是平常事，只为表达对知己的感念，所谓君子之交，何曾如水之淡？

不知道张郁明教授所说的李渔扁体对联，是不是其实是家兄所写的这幅？而父亲赠给桑宝松的砚台是不是蕉叶白端砚呢？时光流程中，记忆错位也是难免。

2017年8月，扬州举办“萧平艺术馆签约仪式”，在西苑宾馆举办，仪式简单隆重。晚上扬州方面设便宴聚餐，本来我想当晚赶回南京，但萧平先生坚持要我们留下来，那一留竟让我有幸遇见了桑宝松的儿子。

席间，扬州中生代字画收藏家沈建南走到我座位旁说，那边有人说要敬你一杯。谁呢？我随他走过去，见一人站起来，五六十岁模样，高个，胖瘦得中，头发花白。他举着酒杯跟我说，我父亲是桑宝松，与你父亲是忘年交。我朝后退半步，向他微微鞠躬致意。他说，我父亲去世时，你父亲非常难过，从北京发来唁电的。我告诉他那是我弟弟代发的，又说不久前我们到扬州大学看旧居，姐姐对桑先生的描述，他听了眼睛一亮笑起来。说起我父亲和他父亲作别的情景，提到李渔

对联。我问他是“江湖归白发，诗画醉红颜”吗？他说是的，就是那幅，你父亲送给我父亲一方清代端砚砚榻，清代的，非常漂亮，上面有泥金片。“泥金片”他说了三遍。我不懂砚台，也不懂泥金片之于砚台的重要，但听得出那表示珍贵。说起前辈的情谊，他动感情，我也动感情。忽然觉得人生的磁场走到哪里都紧紧吸引着你的。

又是两年过去了，今年夏天旅美书画收藏家邓世勋先生和萧戈到我家来，邓先生说7月扬州举办了一场扬州画派书画展，非常热烈，观众涌动，他本人拿出三件八大山人的真迹借展。这也是扬州的艺术魅力和好人缘，不然谁愿意出借八大的真迹？一路飞去千山万水的。

“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造势亦要一年年持之以恒。设想没有陶老的知遇之恩，又会怎样呢？人生难求一知己，谁还敢进一步奢望一‘知遇’呢？如果真的碰上了，真是今世前生修来的。所以我说陶白先生是桑榆生命中的第三个人物的道理即在此。”张郁明先生此章以这段话结束。感谢张教授这段回忆和解析，没有他的文字，很多细节我无法得到。

如果说父亲是桑宝松修来的知己，那么桑宝松就是父亲修来的挚友，流寓扬州的日子里有他那样的朋友，散淡的日子有声有色。那几年的扬州，在我记忆中最是明亮，清纯的空气，五亭桥皎洁的月色，“冶春”窗下的浮萍，老屋墙上的青苔，轻荡的柳丝，都记载了父亲和扬州朋友，特别是与桑宝松的友情。写这篇文章，就像看到父亲脚穿布鞋身着褪色中山装，敲响桑家的门，桑宝松欣喜开门将他迎进，不及寒暄，父亲便问：阿松啊，最近有什么新作？拿出来看看？

如今，陶、桑已都不在，但桑先生为父亲刻的这枚名章，印泥依然色红不退。

谢舒女，作家，定居美国。

钱璎与《绣襦记·卖兴》 的三度复排

||| 顾 斌



钱璎 (1923-2018)

昆剧艺术宝库中有很多极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经典剧目,《绣襦记·卖兴》就是其中之一。一出戏,时隔半个多世纪三度排演;几代昆剧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剧情以外的故事,说来也许更动人。

《绣襦记》是明代中期著名的传奇作品,也是昆剧舞台常演剧目之一。《卖兴》一出以生角、丑角为主,丑角分量更重。昆剧舞台上,历来就有“俞家唱”、“徐家做”的赞誉。“徐家做”,指的就是昆坛名家徐凌云的表演艺术,当年他与“传”字辈老艺人沈传芷曾联袂演出该剧(分别饰演“来兴”和“郑元和”)。徐凌云深得名师传授,并从孩童身上汲取创作的灵感,通过真切朴实的表演,深入刻划了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几十年来,徐凌云演的“来兴”达到了最高境界,他也因而被誉为“活来兴”。

从1962年首度传承至今,《卖兴》这出戏的三次复排(1962年、2000年、2017年),离不开苏州文艺界德高望重的老领导钱璎。钱璎(1923-

2018),女,安徽芜湖人,著名剧作家、文学理论家阿英之女,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苏州宣传文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并致力于振兴发展昆剧、评弹事业,离休后担任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



徐凌云(右)扮演“来兴”,姚竞存(苏州著名曲家)扮演“郑元和”。(转载自《徐凌云口述——昆剧表演一得》)



1962年，徐凌云（右一）在苏州乐乡饭店向林继凡（左一）、刘继尧（左二）传授昆剧折子戏《卖兴》。（图片由刘继尧提供）

员会秘书长、苏州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顾问，曾获文化部“长期潜心昆曲艺术事业、成就显著的昆曲艺术工作者”表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江苏省苏昆剧团（现为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以主要力量开展继承苏、昆剧传统艺术，时任苏州文化局主要领导的钱璎决定到上海请徐凌云先生为“继”字辈青年演员传授他的拿手好戏《卖兴》。

1961年，苏昆剧团在无锡演出，趁此机会钱璎特意陪同徐老游玩宜兴善卷洞，游毕再陪徐老到无锡看望剧团演职员。钱璎对徐老说：辛苦你把《卖兴》教给我们的“继”字辈吧。徐老说：钱局长啊，你从苏州过来亲自陪我这个老的“白相善卷洞”（白相，苏州方言，“玩”的意思），原来是要让我给这些年轻人教戏啊！哈哈哈哈哈！徐老开怀大笑……为了昆剧表演艺术的代代相传，同时也被钱璎的真诚所打动，徐凌云随后专门到苏州，将这出戏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了“继”字辈青年演员金继家、刘继尧、周继康等人。1962年12月，江浙沪昆剧观摩演出大会，《卖兴》被专家评委一致推选参加闭幕式优秀节目展演，首度复排大获成功。

时隔近40年后，首届昆剧艺术节于2000年在苏州举办，徐凌云先生杰作《卖兴》由“继”字辈原班人马再次演绎。时任《姑苏晚报》文化记者的我到排演现场采访后，又去钱璎家里做进一步了解，听她介绍了事情的由来。

钱璎说，当年徐凌云先生到剧团为“继”字辈传授昆剧时，已七十高龄却丝毫不显老态，身子还很灵活。他经常从上海来苏州教戏，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直到病危时，他还托人将他的丝绒幕布、练功带、喷火嘴等个人演出用具赠送给苏昆剧团。刘继尧至今还记得，徐凌云先生70寿辰时天津戏曲学校送给他一条“天津裤带”。有一次，徐老特意把这条裤带给他，说：“继尧腰不好，这条天津裤带送给他，让他练功时缚在腰上。”结束此次采访后，我撰写了《四十年后再显身手，原班人马名家杰作重现舞台》一文刊载于2000年3月28日《姑苏晚报》。

昆剧是以人为载体的艺术，人在艺在，人绝艺亡。每一出戏，都是一代代名家艺人千锤百炼的艺术精品。时光流逝，浑身是戏的老一辈昆剧人已寥若星辰。假如将这些剧目比作一件件宋瓷精品，那么这些无价之宝已时刻面临着失手打碎的危险。2010年中秋的前一天，随着最后一位“传”字辈老艺人（倪传钺，102岁高龄）仙逝，昆剧的一个时代就此结束。这代人的离去，带走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于近现代昆剧史的记忆，更意味着大批传统剧目的失传。所幸的是，老先生们当年陆陆续续把一部分“无价之宝”传授给了下一代。

除了《卖兴》一出由昆剧耆宿徐凌云曾为苏

昆“继”字辈演员刘继尧等人传授外，还有两出经典剧目得到了传承。

《弥陀寺》是《琵琶记》中的一出“冷门戏”，“传”字辈以往演出时，一般作为“开场戏”出现，当年由时已90高龄的“传”字辈老艺人吕传洪传授给“继”字辈演员朱继勇，如今朱继勇也已年逾八旬。

《双思凡》更是昆剧舞台上的传说。新中国成立前，唯一的演出记载就是王传淞、周传铮的海上“双演”。1939年2月，上海“仙霓社”演出中，《双思凡》一出尤其引人注目。所谓“双演”，即两人分饰同一角色，出场后装扮、服饰、动作一致，唱念音调相合。但身段为一正一反，既热闹美观，又难度极高。数年后“传”字辈艺人散落飘零，该剧从此绝响舞台。新中国成立后，“传”字辈老艺人朱传茗、张传芳曾将《双思凡》传授给“继”字辈演员章继涓、吴继静，但也仅演出过一次。著名舞蹈家吴晓邦特别欣赏这朵昆剧奇葩，对那次演出曾给予盛赞。

这三出戏目前仍保存在“继”字辈老艺术家身上，如果不及时传承下来很有可能就会失传，对昆剧艺术的传承保护无疑又将是重大的损失。2017年9月，苏州市文化部门实施“昆剧经典折子戏抢救工程”，邀请章继涓、朱继勇、周继康、吴继静、柳继雁、尹继梅、张继霖、刘继尧等“继”字辈老演员出山，排演复原这三出戏，将其再现舞台并传承给年轻演员、收入昆剧影像数据库。

从被传承者到传承者，刘继尧已是第三次排演《卖兴》了。随着时光流逝，这三出戏的传承者已是迟暮之年。当年向老先生学这出戏的时候，刘继尧等三人都还是20出头的毛头小伙，如今年龄已80岁左右，1962年、2000年二度参与排演《卖兴》的金继家已于数年前病故。

此次复排抢救《卖兴》，除了刘继尧、周继康、



《卖兴》第二次排演时的剧照，摄于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期间，刘继尧（左一）、金继家（左二）、周继康（上图右一）分别扮演“来兴”“郑元和”“熊店主”。（图片由刘继尧提供）



2017年,《卖兴》三度复排的场景,坐在地上和站立者为刘继尧和陈滨(分别扮演“来兴”和“郑元和”)。

朱继勇、张继霖等“继”字辈老演员参加演出外,还特邀了沈传芷先生的关门弟子、“弘”字辈女小生陈滨加盟(在剧中刘继尧和陈滨分别扮演“来兴”和“郑元和”),当年与徐凌云联袂演出此剧的正是沈传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徐、沈二位大师当年珠联璧合的精彩演绎,如今恰好由他俩的弟子携手再度重现。无论对于已离开剧团多年的刘继尧还是始终坚守在昆剧舞台上的陈滨来说,先生传授给自己的那些戏份早已是刻骨铭心了。

钱瓔是苏州文艺界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与苏州戏剧相伴相守60多年。她和其他老同志一道,用毕生精力培养出“继”字辈演员,为昆剧舞台艺术薪火相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她与“继”字辈亲密无间,感情无比深厚。正如她在《幽兰飘香人欲醉——记苏、昆剧“继”字辈演员》一文(刊载于《苏州杂志》2002年第1期)中所说,“继”字辈演员没有辜负“继”的重任,他们从学艺到能上台演出,直到走出

苏州走向世界,这漫长的路程中,他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那众多的严师、名师是如何的关心、培养,他们亲自“拍曲”(教唱习曲)、“踏戏”(排练剧目)还和青年演员同台“演出”,使他们在昆剧舞台上站住了,站定了,站得传神,站得风度翩翩,站出了苏州一代昆剧演员的风采!从这段饱含深情的话语中,我清晰地读出了老人对于当年那些往事(包括传承《卖兴》等剧目)的生动记忆。

抢救传承工作2017年下半年正式启动,由苏州昆剧界老领导钱瓔、顾笃璜担任艺术顾问。钱老亲自组织开展前期准备,指导拟定抢救传承计划。报告起草完成后,刘继尧去钱老家里请她过目。老人戴上老花镜,反复看了三次,连声说好!同时很认真地说:书僮(来兴)的“僮”写成了“童”,少了个单人旁。据刘继尧回忆,90多岁高龄的钱老当时身体情况尚可,还说到时候要去现场观看彩排。

抢救传承计划上报文化部门后,很快得到批复并获得相应的经费资助。获知消息后刘继尧马上去了钱老家,却得知老人已经进了护理院。赶到护理院后,他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钱老。钱老对他说:“你看,组织上对继字辈是多么重视!拨款批复的时间(10月24日),恰好是党的十九大闭幕的日子,真是太有意义了。你们(继字辈)一定要齐心协力,克服一切困难把这三出戏抢救出来。将来录制完成做成碟片后,别忘了拿来放给我看。”钱老还说,《卖兴》这个戏她看过很多次,每次看都忍不住要哭。徐老把角色演得简直像“活了过来”一样:真实善良、乖巧懂事——“来兴”这个小人物被刻划得生动传神。徐凌云等老一辈艺术家身上,包含和体现了昆曲作为遗产的真正价值和时代意义。

在刘继尧提供给我的这份“抢救传承计划”



2017年12月27日,抢救录影工作顺利完成,典范精品重获“新生”。

中,我看到了钱老专门为这三出戏添加的说明。关于《卖兴》,她是这么说的:

昆剧前辈徐凌云先生,1957年在苏州新艺剧院表演《绣襦记·卖兴》。据张继青回忆,当时徐老已70多岁高龄,演绎12岁的孩童,一个倒地打滚,真把兴儿这个人物演活了,博得满堂掌声。

如今昆剧舞台上的《卖兴》已失去徐版的精华和表演之美,细节退化,隐形消亡。近期,两个昆剧院团在“昆博”演出《卖兴》,徐老亲授的一些精华已失落。当然,年轻人没有看过徐老的传神表演,不能怪他们。

所以,更觉得有责任把前辈传授给我们的经典昆剧折子戏教给年轻一代,让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昆曲薪火相传。

2017年12月27日,抢救录影工作顺利完成,典范精品重获“新生”。专家评价,对《卖兴》

等精品传统剧目的抢救,凝聚了数代昆剧人的心血,为传承与研究昆剧表演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于昆剧艺术遗产薪火相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卖兴》55年三度排演,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钱瓊。这位令人敬重深受爱戴的老人,为了她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陪伴着她终生牵挂的那一出昆曲走到生命的终点,2018年春节过后与世长辞。所有参与抢救传承工作的人都说:同钱老最后一共工作的那段时光,令人无限感伤终生难忘。

顾斌 男,毕业于苏州大学汉语言文学(昆曲艺术)专业、传播学专业,中国昆剧研究会会员。

江南才子自风流 ——文教视阈中的江苏（上）

||| 诸荣会

在中国传统才子佳人戏里，古代文人出场，大多数都是这样一个经典的造型和场景：操吴侬软语，着素衣一袭，随三尺书童，奔走在进京赶考的途中。的确，在中国古代，多少读书人的整个人生似乎都在做这样的一场奔走，甚至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这场没完没了的奔走；就因为这场奔走，他们生活本身的乐趣，人生的根本意义反倒常常被遗忘；就因为这场奔走，中国的读书人无可奈何地任青春流逝，任心境苍老，任生命本身也一天天消蚀殆尽。

这场奔走的那一端就是科举。

科举是一种考试，而说起这场长达 1300 年的考试，江苏则是中国最绕不过去的一个省份了，因为差不多正是科举成全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江南才子，他们在科举史上创造了太多的辉煌、自豪和骄傲，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屈辱，甚至血泪。

南京的秦淮河边至今还有一座“江南贡院”，

只是实际早已被改造成一座规模很大的“中国科举博物馆”了，为此它成了今天全国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贡院。

“贡院”就是古时科举考试的考场。

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公元 1168 年），至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最初它只是县、府学的考试地，占地面积也不大，后经明、清两代不断扩建，规模日益扩大，最终拥有考试的“号舍”两万多间，加上官房、膳房、库房等附属设施，占地面积近 30 余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全国各省贡院之首。仅凭这一点，就不难想像江苏科举文化过往的发达。

今天，走在江苏的一些城市，不要说南京和苏州这样的大城市，即使有些县城，一不小心就会或走进一条“状元巷”，或看到一座“状元坊”，仅以南京为例，城内至今还有多处以“状元”命名的地名，如朱状元巷、焦状元巷、秦状元巷等，它们如同一枚枚活化石一般，见证着各地科举文化的一段段曾经的辉煌。

的确，江苏是古代科举文化最发达、成绩最

优异的省份，这只需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就足可证明：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开始科举制度，到清光绪三十年（1905 年）废止，经历了整整 1300 年，其间产生至今有姓名可考的状元共 592 人，其中江苏籍状元就有 81 人；仅有清一代，从清顺治四年（1647 年）武进人吕宫考中丁亥科状元，到光绪二十年（1894 年）南通人张謇考中甲午科状元，247 年间，江苏共有 49 人考中状元（第二为河南省，仅有 34 人），仅苏州一府就有 35 人。至于考中进士者，明代江苏考中进士人数占全国 11.84%；清代约占全国的 11.1%，高居全国第一位。因此，说江苏是“中国科举第一省”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二

在人们印象中，江苏的科举成绩是辉煌的，但其辉煌的获得其实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河南、江苏两地科举考试状元人数表				
	唐	宋	明	清
河 南	15	16	2	1
江 苏	7	8	17	49

从上面这个表格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么一点，即：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如果将获得状元人数作为科举成绩的标准，其科举成绩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而逐渐衰退的；而江苏与之相比正好相反，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辉煌。

为什么会有这样？其实不难解释。

宋元以后，随着江南的不断被开发，中国人口、经济、文化重心呈逐渐南移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北方自不必说，就中原地区，相对于江南来说，汉文化受元代统治的破坏又较为

严重，时至明清两代，江南的人文水平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北方甚至中原地区，总体水平已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再加上，江南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也急剧增加，单从人数的概率上来说，江苏地区报考人数多，最终较之于别的地区多考中一些人，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然而就是这情理之中的事情，有时候竟也发出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

那是明洪武三十年（公元 1397）暮春，随着一声齐鸣的鞭炮声，江南贡院会试正式放榜，写着中选人名单的金榜被高高悬出辕门。已在此等候多时学子们霎时蜂拥而上，一双双眼睛在榜上搜寻着自己或亲朋的名字，一张张因紧张而显得蜡黄的脸孔与黄色的金榜相映成趣。这次会试，共录取贡生 52 名，榜文朱笔楷书，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金榜前，看到自己名字者顿时欣喜若狂，没寻得者垂头丧气，另有不甘心者，生怕漏掉了，则在榜前依次反复寻找……天近中午了，肯定自己名落孙山者有些已开始快快离去，但尚有不少聚集在榜前议论着……

忽然，有一位士子似乎发现了什么秘密，似自言自语，也似故意说给身边的人听：“奇怪，奇怪，52 位贡士都是南方人，北方人就连一个合格的也没有！”就他这轻轻的一句，竟很快引起了在场人的注意，一时间大家纷纷仔细再看那金榜，名单从第一个“宋琮”，直到最后一个“刘子信”，还真都是南方人。这时又有人以更高的声音叫喊：“主考官刘三吾是茶陵人，副主考白信蹈以及各房考官都是南方人，他们这是压制北方才子！”那些本来已经失望的士子，一个个本如泻了气的皮球，此时就因为这一喊，立刻就如被打足了气一般，跺脚乱跳者有之，呼爹骂娘者有之，破口大骂者有之，随后，他们纷纷用泥团、石子掷向黄榜，一瞬间，



1912年由美国人那爱德拍摄的南京江南贡院。

(转载自《故时风物》，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那高悬的黄榜已经被泥团涂得一塌糊涂。不仅如此，随后，这些人索性簇拥在一起，高呼呐喊着游起行来，一会儿便从贡院游到了礼部衙门前，声称要面见考官，并要对本科会试的不公查出个水落石出。礼部急请锦衣卫派军前来弹压，但哪里能压得下去？不到两个时辰，南京城里便传单满天揭帖满墙，指责考官选人有私，连街头巷尾也几乎是一边倒的舆论，这就是，本科会试尽取南方人，其中必有人作弊。事情就这样越闹越大。

“这还了得！”朱元璋勃然大怒，很快便以一种要替北方士子做主的架势宣主考官刘三吾觐见。

其实对于贡院那边的所有风吹草动，朱元璋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他之所以到这时才召见刘三吾，一是他要看看事态的发展，二是对于

怎么处理此事他还没拿定主意。对于本科科考结果其实他并不怀疑其公正性，因为他对于主考官刘三吾学识的渊博和人品的耿直都是不怀疑的，他当初选中他做本科主考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是，偏偏是这个刘三吾竟给捅出这么大一个篓子——你怎么能一榜贡生全是南方人而一个北方人也没有呢？要知道，北方人在元朝统治下过了几十年，已做了那么长的大元臣民，对于新建的明王朝，他们总还有个观望、了解的过程，如果处不好关系，很可能使北方人把新王朝和元朝等同起来，产生一种敌对情绪，那样，北方就不好统治了。而北方又恰恰是大明朝的军事重地，失去北方的人心，也就失去了北部边陲的安定，使新王朝随时受到威胁。因而利用科举考试笼络北方知识分子的人心，是有利于巩固新王朝基础的。但是刘三吾

这个书呆子，只凭考卷文章取舍，一点不给北方士子照顾几个名额，显然是缺乏战略眼光，没有政治头脑，朱元璋对他不满的是这个。

朱元璋将刘三吾召到了内庭，内心的这些话当然又不好对他明说，只是表示希望能将已公布的名单稍作些调整。而刘三吾呢，一是自恃阅卷的细致，并没有私心和不公；二是内心里想，若是自作调整，便等于承认了前一榜确有私心与不公。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竟发起了书呆子气，决不肯更改已发出的录取名单。这倒是朱元璋所始料未及的，于是他再次大喝一声：“这还了得！”刘三吾随即便进了大狱。

随即，朱元璋命平素与刘三吾有隙的张信复查试卷。然而结果再次让朱元璋下不了台，这个张信竟然不但在大庭广众之下替刘三吾公开鸣冤，而且肆无忌惮地当堂顶撞皇帝，说北方人中最好的一份答卷，水平也不如前榜录取的最末一名刘子信。怎么办，朱元璋只得再次大喝一声：“这还了得！”至于张信等人，自然是又进了大狱，与刘三吾一并交刑部审讯。

刑部的官员自然不像刘三省和张信那样书生气，他们对于圣上的旨意心领神会。不久，刑部便将刘三吾和张信等人判罪了，但刑部可能也实在难以找出他们科场作弊的证据，有意味的是，判给他们的罪名都与科案无关：刘三吾以“蓝党”罪流放充军，张信以“胡党”罪与同科试官20多人，全部凌迟处死。至于原榜所录贡生，则全部罢黜。

最终，一份由朱元璋亲自圈定名单61人的新榜被悬于贡院辕门外，所有榜上有名者皆为北方人，江南人无一得中——江南人有史以来第一次遭遇了科场的全军覆没。然而江南人这次在科场的全军覆没，又实在与科场无关，更与教育无关。

中国的科举制度，从形式上来说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自学考试，只要你能通过考试就行，你的学习过程我全然不管。尽管考生也可以拜师求学，但更多的是靠自学。那时的书生，也不能说不被人们重视，但人们重视和关心的是你参加那场考试后能不能“一朝成名”，如果不能，任你“寒窗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终究也只会“无人识”。千百年以来，中国教育就是沿着这样一条“以考代教”的道路走过来的。

好在中国还有文庙！好在还有书院！

贡院作为科举的乡试的考场，乡试是省级考试，所以一省或邻近几省只需一座就够了，所以在中国大地上它并不多见；倒是中国稍大一点的城市几乎每一座城市里都会有一座文庙和一座或多座书院。

那些经年都在为科举这场“自学考试”而努力的读书人，灵魂总得也有一个寄托之所吧？那就是文庙！里一般都供奉着孔子，那是读书人的祖师爷，也是斯文、礼义的象征；虽以“自学”为主，但如果能进行必要的切磋、探讨和交流，那肯定更好吧？那就去书院！就这样，文庙、书院和贡院这“三点”，不但将天下多数读书人的人生“成一线”，而且也“决定”了他们的多数人命运的那“一个平面”——是平衡，还是倾斜，甚至翻覆。

南京文庙（夫子庙）就在江南贡院旁边。二者共处一地的原因想来不难理解，一定是方便考生，在科举前后能或得到先师的保佑，或求得圣人的安慰。然而，文庙的作用似乎远不止于此，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曾暴发了一场“学潮”，江宁城里，愤怒的考生，出于义愤，



太倉孔廟（攝于1978年）

把江南贡院匾额上的“‘貢’院”两字涂改成了“‘賣’完”；还将财神庙里的财神泥像抬到了夫子庙，这一切都意在讽刺主考官认钱不认人，收受贿赂，出卖功名。更有甚者，有人还将一副对联贴到了江南贡院的大门上：“左丘明双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指斥主考官左必蕃对舞弊行为视而不见，副主考赵晋胆大妄为，贪赃枉法。苏州生员千余人集会玄妙观，推廪生丁尔戡为首，然后将财神庙里的财神像抬入府学和文庙。显然，考生们是将文庙不但当作了一个精神的圣地，而且也当作了一个正义的法庭和战场。

那次“学潮”最后似乎是以书生们的胜利而事实上只是不了了之了，但是更多的时候，都是以书生们的失败而告终。

清顺治十八年二月，顺治皇帝驾崩，哀诏传到苏州，大小官员都设帐哭灵，而就在此时，一场学潮却在悄悄的酝酿和组织着。江南士子们天真地想借百官哭灵的机会，掀起一场声讨和控诉贪官吴县县令任维初的风潮，以期达到驱逐他的

目的。

二月初四日，一群秀才书生一百多人，跑到文庙大哭，并散发揭帖，控诉任维初“监守自盗，盗巢仓米”，请求苏州知府朱国治驱逐任维初。然而单纯的书生们哪里知道，一是他们实在是选错了时机，二是他们原本哪里是老奸巨滑的官僚们的对手呵！官僚们只略施小计，书生们便败下阵来了。

朱国治不但对书生们的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与任维初上下巴结，抓住当时乃顺治帝治哀初临之日，上奏称诸生在文庙“鸣钟击鼓，震惊先帝之灵”。

如此一上纲上线，还得了！参加哭庙的书生中，有18名获罪被捕。清朝统治者当然清楚苏州人的厉害，因为在明朝时，苏州就曾多次发生过劫抢法场、冲击官府的事件，更何况此时清朝立国不久，江南人并没从内心完全归服，稍不小心，一个小火星就会生成燎原之势，这是清廷统治者所绝不愿意看到了。因此，几乎是在对18名书生实施逮捕的同时，便迅速将他

们押解江宁研审，不久便被杀，其中就有一位落榜的生员，名叫金圣叹。

金圣叹的悲剧，似乎正应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铁律。这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悲哀！

四

如果说文庙是读书人的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圣地，那么书院在他们的工作学习中的作用则是实实在在的，对于读书人来说，书院既是学校，也是研究院、图书馆，当然也是发表学术见解、传播思想成果的一方圣坛。

江苏带有书院性质的教育可谓源远流长，最远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常熟人言偃，是孔子学生中唯一的江南人，被誉为“南方夫子”，人称“言子”，他在故乡的办学，有“文开吴会”之誉。南朝宋元嘉十五年（438），官方在南京建立儒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和玄学馆，并分专业招生，南朝梁时，由梁武帝亲自参与编辑的《千字文》，成为了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启蒙教材。不过江苏真正的书院教育的兴起，则以茅山书院和安定书院的建立为标志。茅山书院建立于北宋仁宗初年，由当地处士侯遗所建，因院址有江宁府句容县的三茅宫后侧而得名。侯氏自筹经费在此授徒讲学十余年。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由江宁知府王随奏请朝廷，获赐“院田”，书院办学经费得到大大改善，书院规模也不断扩大，办学声名也随之远播，时为北宋全国“六大书院”之一；时至南宋，又被著名诗人范成大列为宋初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南宋时，与苏南的茅山书院遥相呼应的是泰州的安定书院。泰州人胡瑗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其于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在其讲学旧址创

立安定书院，并在此长期讲学，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影响深远；且难能可贵的是，自此以后，安定书院旧址上一直文脉不断，今江苏省泰州中学校园正建于其上。而就是这座中学1959届的毕业生中，有一位在毕业50多年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的名字叫胡锦涛。

若说江苏最著名的书院，不能不提到东林书院。

无锡的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本是当时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弟子、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杨去世后渐废，直到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与高攀龙、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一同发起，在无锡东门内重建兴复东林书院，并将一副自撰的对联亲自书写上东林书院的大门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同时成立“东林大会”，制定《东林会约》，似乎一夜之间，贯喜吟诗属对的江南士子们，一改生活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被时人称之为“东林党”。至明天启年间，东林党人不断以书院为根据地，进行各种讲学活动，议论朝政，抨击时弊。

当然，秀才们的“造反”如果仅仅限于在文庙闹闹“学潮”，在书院议论朝政、抨击抨击时弊，那对于统治者来说似乎并不难摆平，最多只需要几颗替罪羊的头颅；最要命的是那些科场失意的秀才们，一气之下竟入了绿林，这对于皇帝的宝座可直接产生了威胁！

就说那东林党人，竟在议论朝政抨击时弊的同时，竟直接与把持朝政，凶残专横的“阉党”魏忠贤进行斗争。那是天启年间，苏州进士周

顺昌等一批义士被魏忠贤所捕杀。苏州市民怒不可遏，聚起万余人到巡抚衙门请愿。小井市民颜佩韦等挺身而出，要与苏州抚台毛一鹭（魏忠贤的义子）辩论，毛被吓得藏进了茅厕。事后毛竟诬奏苏人造反，捕去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扬、马杰等五人，并处斩，但五人临刑时，谈笑自若，面无惧色，痛骂魏阉不绝口，远近民众，无不泣下。五人被杀后，苏州人士捐金将五义士殓葬于毛一鹭为魏忠贤修的生祠内。此后，题咏五义士的诗篇不一而足。明末清初苏州戏曲家李玉据此写成传奇《清忠谱》；复社领袖张溥有感于五义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撰写了《五人墓碑记》，赞扬五义士的高风亮节，成为不朽名作，至今还被收在高中语文教材中。

是科举把他们逼上了“造反”的这条不归路，而书院在为封建政权选拔和培养了大量孝子贤孙的同时，也为自己培养和造就了不为少数的掘墓人。

当然，像东林书院那样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书院并不多，更多的影响都还是在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其最著名者要算是钟山书院了。

院址在南京的钟山书院创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最初为两江总督查弼纳倡建，“选通省士子肄业其中，延师教训，门给廪廩”，崇尚“敦崇实学”的学风。若论起来钟山书院只能是中国书院中的后起之秀，但是它一经创立便迅速崛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后期桐城派领袖姚鼐曾任山长二十多年，使得钟山书院不但当时名噪天下，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钟山书院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其所在地拥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源；其次最直接的原因便是与科举有关——南

方最大规模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就设在南京，每年秋闱，江南各地考生云集南京，这为书院传播其学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书院选拔入院的生员等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钟山书院的成就与影响，首先表现为从书院曾走出了一大批在文化、学术、思想领域各有所长的佼佼者，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所谓的“姚门四杰”。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中云：“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其中的梅曾亮，晚年主讲扬州书院，从者甚众，似乎也可算作钟山书院之学术余绪。其次，作为清代最著名的一个文学流派“桐城派”，其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当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与姚鼐长期主持钟山书院所进行的推广与传播绝分不开。再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兴起后，当时许多保守派文人，竟然一时聚集于南京，原本常常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南京，这一次竟然成了与新文化对垒的一隅，这也从另一个特殊的角度可以看出，钟山书院和桐城派文化主张在当时当地影响巨大之一斑。

好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展开，本就以包容和开放为城市文化特征之一的南京，很快便又汇入了时代的洪流，而江苏的文教事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诸荣会 男，凤凰传媒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风景旧曾谙》、书法理论专著《读碑帖》等23部著作。

文心雅趣 铁画银钩 ——漫谈张謇的书法人生

||| 吴开宇

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精致而考究，如园林营造、书斋装潢、家具设计等等，都可见文人化的倾向。又如“梅、兰、竹、菊”，这四种植物占尽春夏秋冬，中国文人以其为“四君子”，正表现了他们对时间秩序和生命意义的感悟。梅，高洁傲岸；兰，幽雅空灵；竹，虚心直节；菊，冷艳清贞。中国文人在一花一草、一石一木中负载了自己的一片真情，从而使花木草石脱离或拓展了原有的意义，而成为人格襟抱的象征和隐喻，代表了历代文人的风度。

这种清雅高洁的生活方式，乃是基于他们经济的自足与心情的闲适而来。“琴、棋、书、画”中的书法更是如此。中国古代文人不像现代人，没有现在那么多干扰，所以可以静下心来吟诗作画，书写怀抱，书法于是就有了用武之地。评价一个人的人文素养和文化追求，书法无疑是一种理想的载体。“琴、棋、书、画”作为文人的雅好，传承了几千年，其中必然有相同的意趣和韵味。文人的情怀需要宣泄，更需要共鸣，这种共鸣式的宣泄就是以文会友，去沟通双方心灵。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3月3

日，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等41人，为过修禊日，宴集于会稽山的兰亭，每人吟诗两首不等。当诗稿汇集成册时，由谢安等人提议请王羲之为序，王羲之已是酒醉微醺，兴致所至挥笔写下了深为后人称道的《兰亭集序》文，文绝字绝，成了名冠千古的书法绝品。后来，唐太宗因为太喜欢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下令将这幅书法作品随葬，此后，《兰亭集序》的真迹便不知所踪。大概也算是一种流行风尚，过去的时代，书法常常作为高雅的礼物来赠友送客。其中，以字题扇尤为常见。纸制的扇子是古人降暑的常用工具，而扇面用于写字作画，也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形式之一。往来应酬，互赠扇子及在扇面上合作书画，更是中国文人之间的一种雅事。古人书法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而不知何时，这种原本风雅清淡的交流方式开始变味。当下的时代，很多浮躁和浅显的东西一时盛行，大家都忙于刷抖音，看15秒的短视频，再也耐不住性子，细细观详一幅字，或是一幅画。今人书法有些是直接建立在功利之上的，趋炎附势也并不少见。在古代书法本身是没有什么功利

又聞趙少為雪子却以國事利將
軍擒獲之吁以慰也 顏真卿

昔余作郡中原拒胡羯而清與從
事掌銓吏部第兄而超升等夷

州縣軍城之禮亦然未始朝廷公議之宜不應
若此今既以此僕射意只應以為尚書之與僕射
若州佐之與縣令乎

賊軍未平使僕不憤見故先修書但召
諸弟子與語不具真卿

仲仰仁兄索書

張齊

张齐 节临《颜真卿书帖》

性的，而现代拿起毛笔就是直奔名利去的。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古人的书法往往率真而天然成趣，各有各的韵味。与之相反，某些现代书法家的字倒是越来越好看了，但却不大耐看，总感觉是太露，太过张扬。古代书法的那种含蓄、儒雅、自由以及书卷气已经不复再见了。

如果以字度人，那么张謇的书法人生也是很值得一说的。他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影响颇深，大概从小自从说话便开始握笔学写字，书法的底子不可谓不深厚，否则，也不会有人专门研究他的书法。

张謇在他的一生中，对书法的嗜好是显而易见的，他曾刻苦临写各种碑帖，从《张謇日记》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他沉醉于书法的一些痕迹。依照他的时间轨道，他曾反复临写的碑帖主要有：

- 21岁，临褚遂良《枯树赋》；
- 22岁，临钟繇帖、孙过庭《书谱》；
- 23岁，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告身帖》；
- 26岁，临《藏公碑》；
- 27岁，临《醴泉铭》《皇甫碑》《元妙观碑》；
- 41岁，临《瘞鹤铭》；
- 45岁，临《曹娥碑》；
- 74岁，临怀素帖。

临帖，几乎横贯了他的一生。张謇临写碑帖时，并不拘泥某碑帖，而是从各家碑帖中汲取营养，为己所用。他的书法以才为书，以气为书，以功用为书。融汇诸家而笔出自意，厚朴沉着，形成了“张书”气象。

留下来的代表作主要有《张謇临伊阙佛龕碑》《墨竹赋》《张季直书千字文》《狼山观音岩观音造成像记》《张啬翁书千龄观记》《唐孝子祠校记·观世音咒》《东奥山庄记》《望稼楼联》《张母八十寿辞》《钱处士行状》等20余种。

他还亲自给伶工学社的学生批阅书法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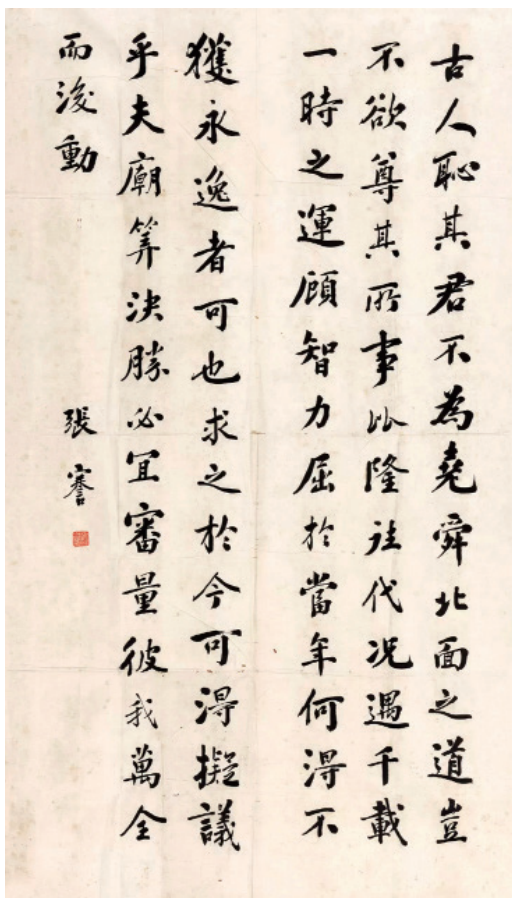
为了使学生学好书法，张謇亲自选取碑帖，印为课本。他在1903年致友人的信中提到：“此间定四月朔开学，因思国文中有书法一门，兼真、行、草三者，若人人求精本临摹，断无是事，即一人照备一份，书本亦不整齐。弟顷思得一法，取真、行、草各三、四种，用影照石印，装订成本，即为各处学校教学课本。”如何用书法化人，张謇作为师者，自有他的考量。一个人的审美的意识，其核心理念是“真、善、美”，而书法的传统理念正是“真、善、美”，书法艺术是一个用眼观察美，用心感悟美，用手创造美的过程。张謇在艺术上的孜孜以求，在道义上的直面人生，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正义、良心、人性，其精髓就是“真、善、美”，在严格的书法训练过程中，学生可以养成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和从容不迫的美好操行，这既是一个积累知识、丰富人生的过程，又是一个道德熏染、涵养气质的过程。

如果张謇与书法到此为止，也就是一段一般的文人以书法修身养性、以书法传德立礼的常规操作。但张謇毕竟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改革中坚，他顶着自己“状元”的头衔，干过好几票鬻字的“把戏”。而且是公开鬻字，明码标价，这似乎跟中国文人的风骨有些背离了。

如果对张謇鬻字也作一番统计的话，那么他一生鬻字大致有四个时期：

- 光绪三十二年，鬻字两年；
- 民国五年，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
- 民国十一年，为慈善公益鬻字；
- 民国十五年，为慈善鬻字。

其中，育婴堂初成，张謇乃以卖字筹钱捐得款项为继。其时计划每季鬻字得500两，一年便有2000两收入，足够收养一百多名婴儿。至1922年，大生集团经济滑坡，张謇个人分红和



张謇 节临王羲之《与会稽王笺》

薪俸骤减，直接影响慈善事业，张謇乃再次登报鬻字筹措善款。持续两年多，至1924年张謇已届71岁高龄时方始停笔。

如果用中国古代文人的标准来衡量，张謇鬻字似乎是有失体统，不够高洁了。然而，张謇与古代一般文人的区别正在于前者往往爱惜自己的羽毛，而后者始终以民生国运为大计。对于一己之私誉，张謇淡而轻之。

张謇用他一生的短暂生命所架起的，是一个重大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心灵答案：民生至大。他的理想国，与千万中国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他追求的是一个新的世界，富者无权轻视贫者，贫者无权轻视富者。

突然想起苏轼的《黄州寒食帖》，这两首诗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到中年的命运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正表达了苏轼彼时惆怅孤独的心情。而写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生命的吟唱。《黄州寒食帖》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

在书法史上，《寒食帖》影响很大，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自己书法作品中的上乘，可遇而不可求。开篇之始，书写平缓，字体端正，其后由于感情的变化而使作品的用笔、结字急剧变化，字越写越大，笔势也越来越急促，最精彩的是中段，感情象火山喷发一样不可抑制，最后又复归平缓。苏轼写这件作品时，由于被贬职流放，正是处于人生的低潮。“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途）穷，死灰吹不起！”读其文句，感其心境，观者莫不为之动容，书为心画，此言不虚也。难怪黄庭坚为之折腰，叹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苏轼的书法，自然是好的，但平心而论，并没有达到书法顶级的水准，为什么这部《寒食帖》如此受到盛赞，又如此广为流传？细想起来，苏轼的字大概跟张謇的字有一样的玄妙之处。字由心生，与它背后写字的那个人紧密相依。一旦联系到永恒的精神层面，答案就不言而喻了。他们的字里不仅仅是个人的情绪与感怀，包容的是整个天下沧桑，对国对民的希冀与追求。所以，书法里的“我”与“天地”间的“我”，成为美丽的叠影，耀照着同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人类世界。

吴开宇 省职教语文名师工作室领衔人，任职于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樵歌杂说

||| 薛国安



钟子期橡

苏州城西南郊的穹窿山，是苏州海拔最高的山，林壑幽深，又傍依太湖，云烟氤氲，气象万千，故有“吴中镇山”的美誉。

汉武帝时，穹窿山下出了个奇人。这人出身贫寒，但好读书。小时候靠帮人放羊贴补家用，放羊时因为偷偷在山上读书，不好好放羊，经常被家人收拾。年长成婚后，他也不治产业，只是日日到穹窿山里砍了柴薪“卖以给食”，勉强度日。常常是在山道上一面挑着柴薪，一面读书，读得高兴起来，还“歌讴道中”，弄得别人以为他脑子有毛病，他老婆劝他，他不但不理睬，反而唱得更加起劲了。终于，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老婆“求去”，改嫁了。等到他五十岁那年，经同乡推荐，为武帝说《春秋》、讲《楚辞》，武帝甚是欢喜，拜他为中大夫，不久又拜会稽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

这个奇人叫朱买臣，《汉书》有他的传记。苏州穹窿山上，至今还有盘石一方，刻有“汉

会稽太守朱公读书处”。而朱买臣也因“负薪读书”的事迹，使他与垂钓终老的严子陵、历山农耕的舜帝和锥股苦读的苏秦并列在一起，在古代士人心中成了渔樵耕读中“樵”的代表性人物。

朱买臣当年在穹窿山道中唱的是什么歌，《汉书》并没有记载和说明，想来应该就是后来士人津津乐道的“吴歌”吧。《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而且吴歌其实是一种“徒歌”，是不用乐器伴奏、节奏灵活，甚至是即兴的演唱，所以很适合朱买臣“歌讴道中”。

如此说来，这个朱买臣也可说是知天乐命、逍遥善歌的樵夫了。

渔樵耕读，是中国农耕社会士人隐逸情怀的精神寄托。《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云：“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隐逸文化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伯夷、

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因为他们进了首阳山就不出来了，不用采薪“卖以给食”，所以只好采薇食之，最后饿死在山里。虽不是樵夫，但他们是早期的遁世于山中的隐逸之士。

说到樵夫，有两个人是必须要说一说的。一个是钟子期，另一个是王质。

其实世人熟知的钟子期，更多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口口相传、共同塑造出来的一个樵夫形象。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最早见《列子·汤问》，原文很简约，并没有说钟子期是樵夫，也没说子期死后伯牙如何，只说“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其中“伯牙游于泰山之阴……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一节文字，倒是有两人共同游历的意思。到了《吕氏春秋·本味篇》里，这个故事就有了发展，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为鼓琴者”，但也没说子期是个樵夫。钟子期作为樵夫形象出场，则是在明代冯梦龙的话本小说《警世通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里，说钟子期“头戴箬笠，身披蓑衣，手持尖担，腰插板斧，脚踏芒鞋”，是隐遁避世于汉阳江畔集贤村钟家庄的一个知乐理、通《毛诗》、尽孝道的樵夫。虽然是小说，但钟子期的这个樵夫形象，却契合世人心中对隐遁避世的樵夫的形象，因而深入人心，被世人广为传诵。中国十大古曲之一的《高山流水》，演绎的即是伯牙和子期“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心与心同的知音之趣。作为琴曲的《高山流水》，见于明《神奇秘谱》，归入《太古神品》中，其解题曰：“《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至唐分为两曲，不分段数。”

而王质则是烂柯山故事中的人物。烂柯山故事，最早记载的是晋人虞喜的《志林》：

信安山有石室，王质入其室，见

二童子方对棋。看之，局未终，视其所执伐薪柯已烂朽，遽归乡里，已非矣。

至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又有记述，原文写道：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而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其后，《水经注》《广舆记》等也都有涉及。至明万历年间，在王世贞、汪云鹏的《列仙全传》中说，王质入山采薪，至石室见二老者弈棋，便置斧旁观；老人与之食，似枣核，吮其汁便解饥渴；后老者对王质说：“你既来已久，可回去了。”王质遂取斧，而斧柯已烂。王质回到家中，竟然已历数百年，亲人无复存世，后入山得道。烂柯山的故事，从《志林》《述异记》到《列仙全传》，所记类同，但著述者的主旨却从“异”发展为“仙”。王质因樵遇仙，因仙得道，就樵夫的形象而言，顿时生出许多烟霞气。这显然是魏晋以后儒、释、道三家思想相互交融的结果。因此烂柯山的传说，不仅成为民间津津乐道的故事，广东、山西、河北等许多地方都衍生出相似的民间传说。南京牛首山上至今也还有仙人溪、棋盘石。而烂柯山也成为一个人文符号，成为千百年来士人们寻求精神慰藉、聊以自我解脱的寄托所在，为此留下无数诗文。如“洞天春远日行迟，几点残星仙子棋。樵斧烂柯人换世，碧桃花影未曾移”（唐杨明）；再如“局上闲争战，人间任是非。空教采樵客，柯烂不知归”（宋朱熹）。这些诗文，或慨古，或遣怀，或说理，俨然成为别样的“樵歌”。而明末传奇《烂柯山》，则把朱买臣的故事放到了烂柯山下，使“洞天福地”的烂柯山又回到了

人间。仙界和凡间，仙人和凡人，孰是孰非？真耶幻耶？这就是烂柯山这个故事的魅力所在吧。

因为有了“负薪出山行且歌”的朱买臣，因为有了旷世知音钟子期，因为有了烂柯樵人王质，我们在诗词杂曲的绿水青山里徜徉，便时时能够看到樵者的身影，并依稀听到樵者的歌声……

我们可以刚随着王维从终南山太乙峰下来，“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接着就跟李白一起在谿山问道途中，看见“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我们才在五祖山随王之道跟樵夫问答，“试向樵夫问端的，白莲生处是吾乡”，又跟罗仲舒一起听到芦山樵唱，“幽歌出谷，金石有余音”；樵夫唱的什么？原来是“松风十里云门路，破帽醉骑驴。小桥流水，残梅剩雪，清似西湖。而今杖履，青霞洞府，白发樵夫。不如归去，香炉峰下，吾爱吾庐”（元张可久）；这边厢刚唱罢，那边厢又唱起，“老樵夫，自砍柴。捆青松，夹绿槐。茫茫野草秋山外，丰碑是处成荒冢。华表千寻卧碧苔，坟前石马磨刀坏。倒不如闲钱沽酒，醉醺醺山径归来”（清郑燮）；归来做什么事？只见那老樵夫“归来涧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谋”（宋萧德藻）……

磨好了刀斧，那老樵夫也该倦了，困了，且让他睡去吧，或许梦里他就到了顾渚山下，跟皮、陆两位先生听着樵歌渔唱，煮茶喝酒去了呢。

陆龟蒙自号江湖散人、天随子、甫里先生；皮日休自号鹿门子，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因唐懿宗咸通以后，兵连祸结，时事动荡，加上求仕受挫，皮、陆二人和许多士人一样，都以隐士自诩，效法白居易晚年“忘形任诗酒，寄傲遍林泉”，寄情山水，陶醉于诗酒唱和之中。“林泉隐事，恣用研咏”的闲适诗，成了皮、陆

创作的主要题材，他们因此也成为晚唐隐逸诗风的代表，在《樵人十咏》存世。

皮、陆之后，到建炎元年（1127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一年四月金军攻破汴京，徽、钦二帝被掳北上，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高宗即位后，率众南渡，偏安江南，史称“宋室南渡”。

“靖康之耻”和“宋室南渡”，作为政治、历史、社会的一次巨变，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士人、对词坛的影响，尤为直接和显著。这时候，南宋初期词坛上，出了一个叫朱敦儒的词人，他是河南洛阳人，字希真，号岩壑，又号伊水老人、洛川先生、少室山人。他在北宋生活了四十五年，在南宋生活了三十二年，向以避世隐居、闲旷自适而有盛名，晚年隐遁嘉禾，放浪烟霞之间，写下了大量的隐逸词，其词集即取名为《樵歌》，又称《太平樵歌》。虽然我们翻遍《樵歌》，找不到一首直接写樵夫或者樵歌的词作，但是其隐逸词却占到《樵歌》总数的大半，其词旷逸俊迈，随缘自适，自成一家，与士人隐遁避世的心理神合。我们不妨听听朱敦儒式的“樵歌”：

元来尘世，放着希奇事。行到路穷时，果别有、真山真水。登临任意，随步白云生，三秀草，九花藤，满袖琼瑶蕊。何须曲老，浩荡心常醉。唱个快活歌，更说甚、黄粱梦里。苍颜华发，只是旧时人，不动步，却还家，处处新桃李。（《蓦山溪》）

先生筇杖是生涯，挑月更担花。把住都无憎爱，放行总是烟霞。飘然携去，旗亭问酒，萧寺寻茶。恰似黄鹂无定，不知飞到谁家。（《朝中措》）

读朱敦儒的《樵歌》，真个是洗尽凡心、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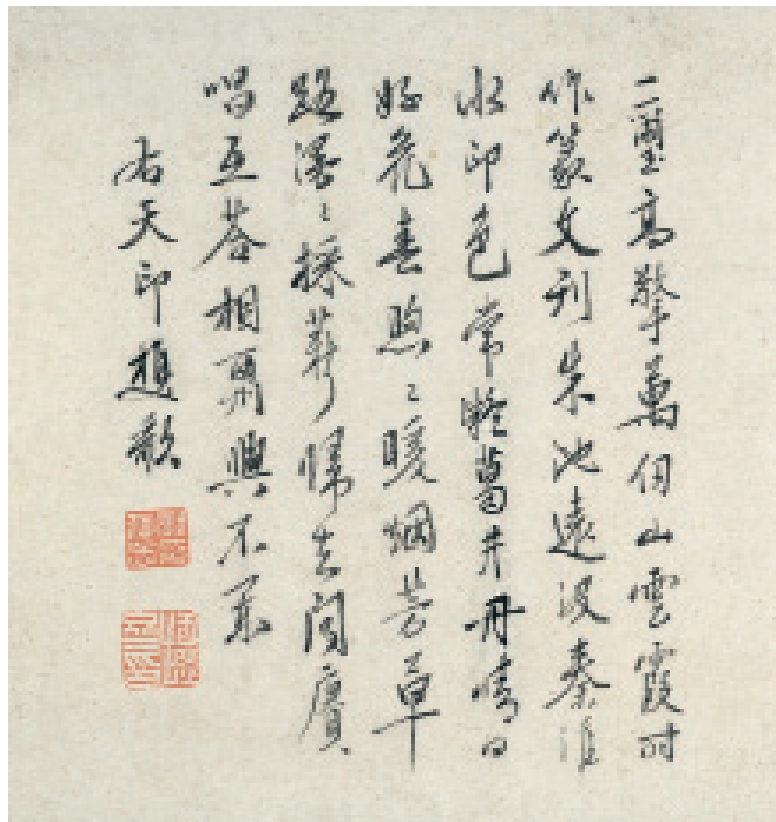
天自适的樵夫形象便恍在目前，超然物外、虚空飘逸的樵歌便如在耳畔。正是从朱敦儒的《樵歌》开始，南宋词坛开始有“希真体”、“樵歌体”，歌咏隐逸生活的词作就盛行开来，形成了“多尘外之想”的隐逸词派。而“樵歌”，居然也成了宋词的众多别称之一。

有趣的是，到南宋末年，浙江三衢（今衢州）出了一位很有成就的琴家毛敏仲。三衢石室山，也是流传烂柯山故事的地方。毛敏仲以制曲名世，所制琴曲《樵歌》《渔歌》《佩兰》流传至今，依然是琴曲中的经典之作。

就古琴而言，有宋一代实在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时期。两宋文教昌盛，历代帝王都好琴，宫中设有琴待诏，并置局制琴，即所谓“官琴”，而民间制琴则呼为“野斫”。在皇室的带动下，朝野上下无不以能琴为时尚，加之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和减字谱的成熟，极大推动了琴学流播和发展。北宋苏州人朱长文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琴史专著《琴史》，它在琴学和古代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南宋则出现了最古老的琴派——浙派，创始人郭沔（字楚望），有《潇湘水云》《泛沧浪》《秋鸿》等著名曲目传世。毛敏仲即是浙派传人。我们现在看到的琴曲《樵歌》，原名《归樵》，最早的谱本见朱权所编《神奇秘谱》。朱权为《樵歌》解题云：

是曲之作也，因元兵入临安，敏仲以时不合，欲希先贤之志晦迹岩壑，隐遁不仕，故作歌以招同志者隐焉。自以为遁世无闷也。

《神奇秘谱》中《樵歌》谱本十一段，各段标题依次是“遁世无闷”“傲睨物表”“远栖云峤”“斧斤入林”“乐道以书”“振衣仞岗”“长啸谷答”“咏郑公风”“豁然长啸”“寿倚松龄”“醉舞下山”。《神奇秘谱》以后，各大琴谱都收入《樵



歌》，传谱有十至十三段不等。如今琴人所奏谱本为《蕉庵琴谱》，十三段加收音，无标题。各谱对《樵歌》多倍加推崇，称之“有苍松古柏之韵，娴雅和静之声”。（《枯木禅琴谱》）

时至近代，琴曲《樵歌》一直被视为广陵琴派的代表曲目之一，广陵琴家的代表性人物孙绍陶、刘少椿、梅曰强都善操此弄。1936年6月，刘少椿赴苏州参加今虞琴社第五次月集，献奏《樵歌》一曲，赢得在场琴家一片赞叹，从此，刘少椿就有了“刘樵歌”的美誉。1963年，在扬州萃园举行的欢迎著名琴家徐立孙的琴筝演奏会上，刘少椿登台演奏的也还是《樵歌》。刘少椿之后，广陵琴派传人梅曰强也是以《樵歌》独步琴坛。



明《金陵八景图·天印樵歌》 南京博物院 藏

关于“樵歌”的闲话拉拉杂杂快要说完的时候，忽地想到“天印樵歌”来。

南京江宁方山，一名天印山，六朝以来即为游客寻胜探幽之地。明初史谨《独醉亭集》写金陵八景中有“天印樵歌”，云：

夹路青山拥翠螺，每闻樵唱隔烟萝。
暗惊鹤梦穿云杪，细答松声出涧阿。
几度半酣扶杖听，有时一曲傍林过。
晚来弛担长松下，复和岩前扣角歌。

明郭仁所绘《金陵八景图卷》中也有“天印樵歌”。其后，朱之蕃将“金陵八景”扩为四十八景，嘱陆寿柏绘图，自拟小引和题咏，刊为《金陵图咏》行世，其中就有“天印樵歌”的诗图，诗云：

巨灵斧削青芙蓉，覆斗秣陵印作峰。
曲径逶迤凌陡壁，山樵攀扪历高墉。
丁丁木韵传幽谷，隐隐歌声杂古钟。
四望砥平空翠合，探奇何处见行踪。
至今，江宁方山脚下尚有一条路，名为“樵歌路”。这应该是江宁人为“天印樵歌”所做的人文纪念吧。

薛国安 男，民革江苏省委专职副主委，省政协常委。

造园宝典《园冶》归乡之路

||| 汪向荣

去年秋季一日，江北小城仪征，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中国风景园林界泰斗、年近 90 岁的孟兆祯院士。他为本届园博会亲自规划了地标性建筑：园冶园。园冶园，雄踞园博园中心，亭台峥嵘，花溪蜿蜒，

云栖鹭飞，天开图画。它决非普通景点，90 亩方圆是对世界最早造园专著《园冶》的隆重纪念，更是美丽中国、生态文明样本的时代展示。《园冶》，这本被国际公认的造园宝典，在中国问世 380 多年，历经岁月沉浮，海外辗转，终于荣归故里。

生不逢时的旷世奇书

早在 1913 年，瑞典著名的园林艺术家玛丽·路易丝·歌特就认为：“世界上所有风景园林，包括日本园林，它们的精神之源在中国。”对此，可作重要书证的是：明朝末年，造园名师计成就完成了专著《园冶》，它比欧洲、美洲同类著作和学科的出现要早两三百年。

崇祯四年（1631 年），从小以绘画成名、天性猎奇，又好游山川的苏州人氏计成来到长江北岸、水运枢纽仪征，受大盐商汪士衡之邀构筑私家园林寤园。此园宽逾百亩，高岩曲水，构置精巧；园成后，名流云集，诗赋连连，被誉为“江北绝胜”。造园间隙，计成开始总结历



孟兆祯院士在园冶园留影

代造园经验和个人实践体会，结集成书，包括文字 1.4 万、图 235 幅，并听从好友建议命名《园冶》。冶者，开辟，前所未有的也；冶者，精工冶炼也；冶者，熏染、陶冶也。此书共分三卷，既有《兴造论》《园说》等总论概述，也有《栏杆》图式专述，以及《铺地》《掇山》《选石》等技法描述。该书独辟蹊径，运用骈骊对偶文体，描述自然风光，充满诗情画意，全书引经据典，谙古通今，借物喻理，雅致隽永，融宗教、哲学、美学、书画、文史乃至西方力学于一体，首次提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营造准则和“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实践要义。既是生态宜居的理论专著，也是林泉生活的百科全书；既可当作造园指南运用，也能视为精美小品欣赏。后人将《园冶》与战国时期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相提并论，足见其在造园领域的启蒙、示范价值。

应当说，计成迫于家贫，传食朱门，实属无奈，从心底里他并不甘心自己的心血仅仅作为了豪门的私享玩物，胸中丘壑寄托着更大抱负：“妄欲罗十岳为一区，驱五丁为众役；悉致琪华瑶草，古木仙禽供其点缀，使大地焕然改观！”（《园冶·题词》）他渴望纳大千之美、万物之秀、天工之力，打造大园林、美化大环境、造福老百姓。这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同属经世济民的“大治”精神！可惜，书如人运，时值乱世，出版后并无什么反响。

辗转海外的艰辛返乡

《园冶》刊行后寂然无名，只是通过民间渠道流落四方和海外。1921 年，留学日本的陈植在其导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本多静六博士那里，发现了淘自北京书摊的三册木版《园冶》，彼时，

《园冶》已被日本诸多高校列为重要教材，被日本造园学泰斗上原敬二（1884—1981）作为研究重点。而更体现《园冶》理念的造园作品要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著名园林“后乐园”，抗清无望的明朝遗民、爱国大儒朱舜水流亡日本倾心讲学，力倡“学以致用”，被尊称为“日本孔夫子”。1665 年，他受日本首相德川光国家族委托，对私家园林改造进行规划。朱舜水精巧借景，在园中设置蓬莱岛、西湖长堤、圆月桥、得仁堂、涵得亭、小庐山等中国元素景点，并取范仲淹“后天下之乐而乐”诗句命名“后乐园”。该园“不肥不瘠，亦精亦雅，远近合宜，天然高下……未有若斯之胜者，殆甲于天下”，进而成为日本九处特殊史迹，影响至今。

1922 年，回到中国的陈植辗转各大城市书肆



《园冶注释》，张悟静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是我国著名林学家、造园学家陈植为明代造园学家计成所著《园冶》做的注释。

寻觅《园冶》踪影，皆无所得。时隔10年，经爱国人士艰辛奔波，方才从日本获得《园冶》残书，终由中国营造学社重新影印。惜乎抗日战争爆发，许多宝贵历史文献灰飞烟灭，《园冶》又一次颠沛流离，其原始档案从中国大陆流散到海外。1948年，瑞典造园学家奥斯瓦尔德·西润出版了《中国庭园》两卷，直接引用了《园冶》图式73幅，数年后，英、法译本相继问世，为西方全面了解中国园林打开了窗口，也在欧洲培育了许多《园冶》的忠实粉丝。

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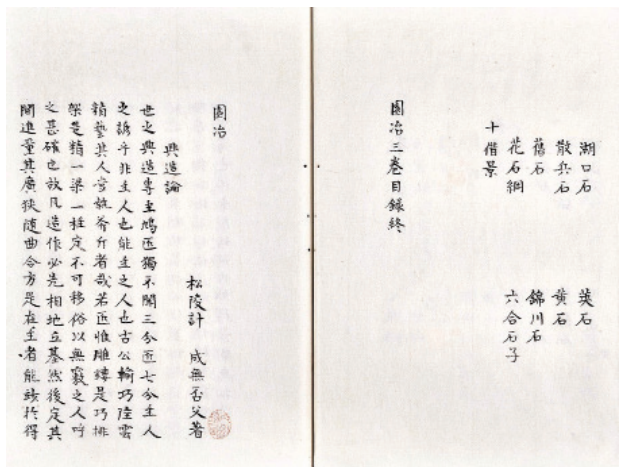
1978年，中国刚刚打开开放的大门，对《园冶》崇敬有加的德国园艺学家玛丽安娜·鲍榭蒂就克服种种障碍，踏上寻根之旅。她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在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开辟专栏宣传，推广中国园林，讲述《园冶》理论，并多方奔波，帮助中国在欧洲建成了当代第一座东方园林慕尼黑“芳华园”和法兰克福“春华园”，她还捐献自己的稿费作为中国园艺进修生

专款，由她资助的对象屡屡获得国际插花大奖。玛丽安娜出版了《中国园林》一书，反复引用《园冶》论述，该书前言“德文出版者的话”，强调“世界园林之母是中国，是中国最早创始了园林并把自然风景融于整个园林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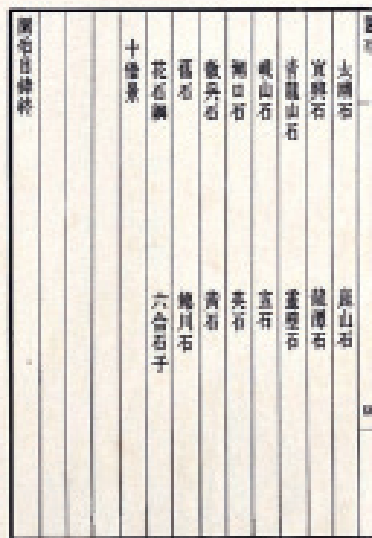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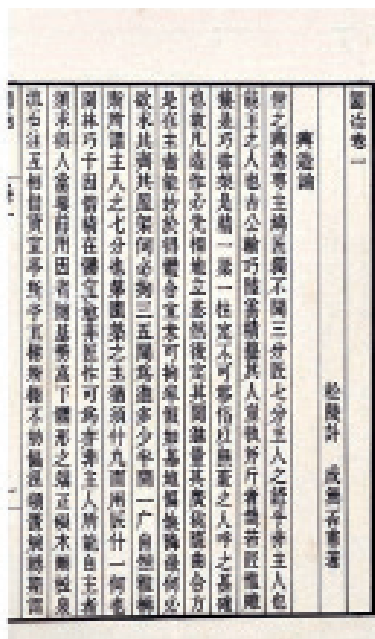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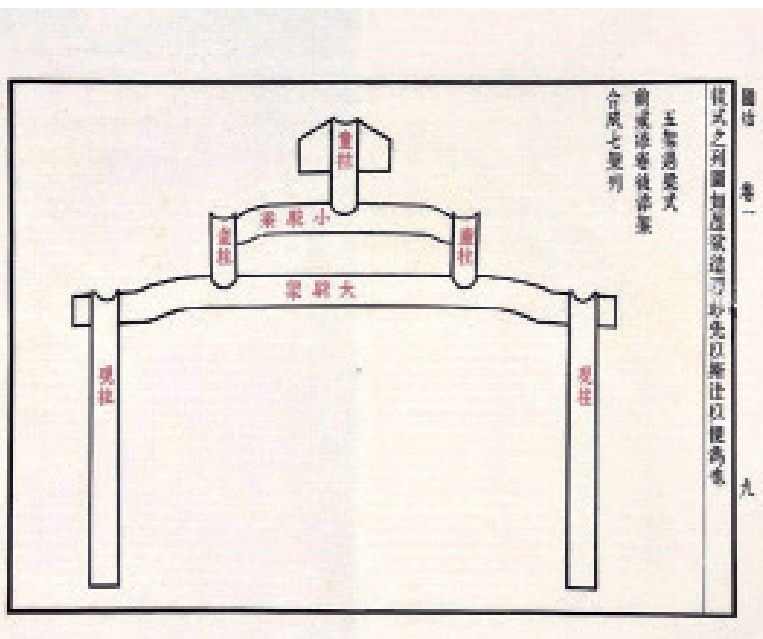
而在中国，对《园冶》的重新关注、热心研究同样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时年82岁的陈植所著《园冶注释》正式推出，随后其他学者的《园冶全释》、《园冶图说》等也相继问世，中外对《园冶》的释读类版本增加到九种之多。

在汇聚了国内外众多大伽的《园冶》研究队伍中，堪称呕心沥血的典型不乏其人。苏州教育学院金学智教授，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历时7年，2017年完成了96万字的《园冶多维探析》。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孟兆祯院士，为了精确理解《园冶》的文字释义，先后拜三位语言专家为师，到了晚年仍坚持跋山涉水，实地考察名园胜迹，以致膝盖磨损受伤，不得不坐着轮椅出行。在国内，他率先为硕士、博士生开设了《园冶例释》课程；耗时6年，参照《园冶》章节完成了厚达500多页的《园衍》，以示薪火相传，衍生不断，后续有人。

2010年，由中国、日本、韩国等发起的《园冶》杯国际竞赛，开始面向全球景观师、建筑师和高校师生开展专项竞赛，组织国际论坛，此后每年都有美国、英国、法国等近30个国家200多所学校、5万多名学生报名参与，2000多件作品公开展示，国内外500多家开发、景观设计、施工企业1000多个项目参赛，涉及现代人居、环境整治、特色城镇多方面，成为具有国际一线水平的权威性赛事。2018年，竞赛作品中的生态景观修复个案成功亮相联合国舞台——第九届世界城市论坛。



《园冶》日本抄本



《园冶》书叶

美好生活的经典指南

《园冶》如同陈年老酒，时间赋予其灵魂的醇香。如今，生态文明新潮澎湃，美丽中国大旗高扬，作为理想生活“容器”的园林，其宜赏宜居宜游宜养的功能得到了全面确认和光大。《园冶》所力主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思想在拂去岁月的尘灰后大放异彩。用现代视野重新审视《园冶》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早在三百年前就已在计成笔下勾勒成型：美好人居在于因地制宜，顺势而为，“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宜斯宜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所谓精而合宜者也”（《兴造论》）。美好生产在于循环利用，“废瓦片也有行时，当湖石削铺，波纹汹涌；破方砖可

留大用，绕梅花磨斗，冰裂纷纭”。美好享受，在于万物平等、友好共存，“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白萍红蓼，鸥盟同结矶边”（《图说》）。美好环境，在于维护生态，反对乱伐乱采，“开林须酌有因”“石非草木，采后复生”，当建筑与古树产生矛盾时，“须陈风月清音，休犯山林罪过”。而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的方法和路径，就是把“借景”视为园林之最要者。建设开发，不是大兴土木、盲目人造，而是要凭依四周，博采众长，远借、近借、俯借、邻借，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并且把园林的意义从单一的感观欣赏上升到陶冶情操、提升修养，由私家专用走向社会共享。“静抚一楫琴书，动涵半轮秋水，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园冶》），为身居闹市渴望田园，困于竞争、向往平和的现



代人描绘了绿色、生态、健康、协调的理想愿景。

不朽宝典的归乡之所

盛世造园，《园冶》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回归时点。2018年江苏省第十届园艺博览会，在《园冶》成书之乡仪征举办，“园冶园”被列为标志性建筑，选址在云鹭湿地湖岛之上建造。

为了设计好园冶园，受邀出山的孟兆祯院士整整一个月，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两三点钟。虽然腿脚不便，只能靠轮椅出行，孟老仍多次现身于扬州和园博园现场实地调查、勘察。从独一无二的扬州琼花（又名聚八仙）的美妙意象和瘦西湖、何园、个园等深受《园冶》熏陶的历史名园中得到启发，园冶园被赋予“琼华仙玢”主题。全园按照“比兴”手法，“敬哲亭”为起，“云鹭仙航”为承，“八仙水榭”为转，“停云台”

为合，迴旋递进，浑然一体。

“敬哲亭”顾名思义是用来纪念计成、敬仰哲匠的，如同《园冶》的序言。中轴尊崇迎客，洞门庄严框景，亭中立石镌刻计成像，内配篆文：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外悬楹联：计成乃人师，园冶为世范。“云鹭仙航”，乃集亭、台、楼、阁于一身的石舫，舱中宽敞，可品茗、可闲聊、可操琴、可诵读，为民众聚会同乐之所，象征同舟共济，扬帆远航。

“八仙水榭”，平台上树立“津标”，屋脊上饰有“八仙过海”图案，屋檐下悬着“小广寒”匾额。与云鹭仙航、步月桥、水八仙桥形成呼应，再加之榭两侧点缀的吮露、鹊会二亭，天人合一，万物共荣。诸景环水而筑，水中竖置“砥柱中流”太湖石，横置“雁奴矶”象形石，分别寓意勇于担当和团队坚守的精神。

园冶园的点睛之笔也是整个展园的制高点，



园冶园夜景

凝聚于“停云台”之上。它垒土 5 米，筑“后土岗”，举“琼花台”复制扬州“琼花观”石坊，上建“不二阁”。登高望远，山色湖光，吴风汉韵，尽收眼底；鸥鹭入目，铜铛盈耳，胸襟开阔。

园冶园尊享了最美的水土，气势雄壮，大开大合，然而 6 万平米方圆，固定建筑只占 1000 平米；整个省园博园，硬件设施用地也只有 200 多亩，不到全园面积的 15%，敬畏生态、尊重自然，原生水土、乡间草木依然是主人。大地艺术，知行合一，形象体现了《园冶》道法自然的原则。

园冶园的精彩收尾，是西北侧的临水区域建起的弧形长廊，中有“归帆阁”，以“思乡亭”与“归根亭”二亭呼应，这些建筑是“双关语”和“多义词”，既寓意人生的落叶归根，更象征《园冶》380 多年后的荣归故里。只是它不只是刻印在纸页上，用油墨铅字表达，而是用亭台楼阁、奇石秀水、芳草嘉木，自然地根植在水土中，

融入到自然里，是以“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满足广大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 2021 扬州世园会增添中国“园林之母”的厚重注脚。

汪向荣 男，扬州市天风企业策划有限公司、江苏天乐湖旅游度假区总顾问。

节令之美

||| 王 芳



瓶子 摄

寒露

“寒露”二字，尽带苍茫意象，告诉人们秋已深，冬不远了。这个季节，芦苇都白了，湖岸的风一待轻起，如拥如簇的白色芦苇花飞舞轻扬，像临水而立的白衣女子，遗世而独立，诗经里的“蒹葭苍苍，白露茫茫”正是这景象。

寒露意味着秋的落幕。这时节，各种果实相继成熟，而桂花却要谢了。桂花是中秋时盛开，正是一年好景之时。而随着桂花的凋零，浓香的散尽，秋也要渐行渐远了……

秋水渐瘦，露出浅浅的湖岸，想起简桢的名句：“请千万记住，在我们菲薄的流年，曾有十二只白鹭鸶飞过秋天的湖泊。”有什么诗句能比这更配得上如此的景象呢？

立冬

立冬，是路边刚出炉的糖炒栗子。人们在寒风中很有耐心地排着长队，终于等到出锅时，手捧热乎乎的一袋栗子，温暖而甜蜜。

立冬，是红泥小炉上水壶里冒着的氤氲热气。星星点点的炉火哗啦有声，猫儿依偎在炉子旁，贪恋这炉边的温暖，不肯离去。

立冬，是挂在柿子树上的几只柿子。大部分柿子都摘了，只留些许，为了冬日觅食的鸟儿。火红的柿子挂在褐色的树枝上，像空旷的天空下跳动的音符，灵动而活泼。

立冬，是一地焦黄的梧桐落叶。江南的冬天要来得晚些，不像北方早就北风呼啸，一派凋敝了。江南的冬天只是比晚秋更萧瑟些，待到

初冬，方落叶纷尽，冷雨湿地，寒气渐侵。

立冬，是运河沿岸的黑瓦白墙的老宅。古老的运河水静静地流淌，映照着江南独有的鳞次栉比的老宅，人们悠闲地在老宅旁晒着太阳。如一幅旧时的冬景水墨画，这辰光，咿呀的船橹声也入了梦乡。

立冬，是渐行渐近的寒冷，也是寻寻觅觅中的温暖，进了冬日，阳光变得可亲起来，就让这冬日暖阳照拂一身、温暖一冬吧。

小雪

小雪，初冬，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天气渐寒，水凝为雪。这时的雪还不大，故称为“小雪”。

小雪节气，是一年一度的腌菜时节，江南的家家户户门口都晒着洗净、码好的雪里蕻菜。翠绿的锯齿状的叶子新鲜欲滴，雪白的菜梗像一段白玉，晒在冬日的阳光下，像待打磨的未经世事的新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密封、盐渍，就要变成另一种颜色、风貌了。

小雪，雪将下未下。天色暗沉沉的，能和老友一聚，围炉夜话，在这寒冷的天气里是多么难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小雪，天寒红叶稀。山中小径人烟稀少，树叶也稀疏了，薄薄的雾霭升起来，在月光下若有若无。

小雪时节，细雪霏霏，稍纵即逝，一切都是淡淡的，像小巷中的旧木门，在昏黄的灯光下，“吱呀”一声刚打开，又关上了……

冬至

冬至，到了一年的尾声，是真正的冬天到了。“冬至大过年”，对于古人来说，冬至是比过年更重要的节日，因为它意味着一年劳作辛苦的开始，

可以好好地休养生息了。

冬至，深秋的景色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枯叶落尽的枝桠和干涸的池塘，而腊梅，这时悄悄地开了，隐隐的香气从镂花的山墙里散发出来，却寻不着它的身影。

冬至，万物萧条沉寂，比任何时令都安静、冷清。日本平安时代的清少纳言在《枕草子》的《四时的情趣》中写道：“冬天是早晨最好。下了雪的时候是不必说了，有时只是下了雪白的霜，或者就是没有霜雪也觉得很冷的天气，赶快地生起火来，拿了炭到处分送，很有点冬天的模样。”冬日的清晨是让人感到清冷静净而向往暖意的，这是含蓄朴素的冬日之美。

冬至，天气更加寒冽，这时若下雪，就是鹅毛大雪。雪景以苍茫寂寥为上。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开篇写道：“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这已成为日本文学的名句。简洁的寥寥数语，像电影镜头一样把我们带入雪国虚幻清寂的世界。

冬至，是呵气成霜的季节，也是辛苦晨习的季节。过了冬至，就是数九寒天，也是磨练意志的时候。孩童冻得发红的脸颊，不愿伸出袖笼的双手，望着淡而远的太阳，念着“两小儿辩日”，这是学童们的辛苦冬日啊。

江南的冬至夜是要吃“团子”的，那是一种大个的菜肉馅汤团。煮熟的汤团一粒粒飘在碗中，像诱人的白玉。在寒冷的冬至夜吃上一碗热气腾腾、馅料十足的汤团，是多么慰藉那颗孤独又漂泊的心啊……

王芳 女，《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



故乡流均

||| 陆汉斌



我的故乡流均镇位于淮安城的东南，离县城 50 公里，处于淮安、扬州、盐城三市四县的结合部，境内有溪河、唐河、涧河、姚河、密头河、市河等九条河流流过，湍湍水流汇集入射阳湖后得以平息均衡，遂称流均。其实这也是故乡人对水的一个期望，就是希望水流到我们这里能够安祥平和。这可能与淮安得名一样，希望淮河之水能平静安澜，淮安城千年的兴兴衰衰，都跟流过三条河——大运河、废黄河、淮河有着直接的关联。我家住在溪河边上，溪河在我们那里拐了一个弯，又因为以陆姓人居多，称为陆家湾，那里紧靠射阳湖。射阳湖有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的湖面与湿地，连接湖水的大河叫射阳河，绵延上下近 200 公里，东流射阳县入海。

那时，流均的交通很是不便，淮安县城的公路到流均镇上为止，当地人称为“绝头路”。一天只有几辆去淮安城的班车，很少有外人进来，消息非常闭塞。我曾经偶然在西祠胡同的知青

论坛看到这么一个故事，是一个曾在流均插队的南京知青写的。

记得刚下农村时，一天荡里飘来一只小船，驾船的是一白发老妪。上得岸后，她蹑手蹑脚，四处张望，僻静处她拽住一位老头低身问道：“鬼子退了没？”老头先是一怔：“这不是三奶奶吗？鬼子早退二十年了！”听老头这么一说，这位叫三奶奶的老人便寻问起他那当新四军的儿子来。听到儿子牺牲的消息，三奶奶嚎啕大哭。后来大队帮她在岸上盖了间丁头舍草屋，我们也经常帮她做些活。……二十三年才出湖荡，消息如此闭塞，这是外人无法想象的。我们就是生活在那块土地上。当地人称我们“大学生”。小朋友早上挤在窗口看西洋景似的望着我们用涂着牙膏的牙刷刷牙，相互间说着什么，不时发出莫名其妙的笑声。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整个一个大约 1600 人的村庄，只有一个人骑自行车，那就是我在公社上班的爸爸。因为到处是水，有路也是羊肠小道，路边芦苇杂草丛生，人们平时出行交通工具主要是船。到镇上赶集、交公粮，去田里收庄稼，下湖打草捕鱼，婚丧嫁娶，都离不开船。而且当时去镇上的路很不好走，碰到下雨天，简直没办法走，流均的泥土是黑胶泥土，除非你赤脚走，穿鞋没走几步鞋就被粘住，走一路，要甩一路泥。春天夏天碰到雨天，我都会干脆赤脚行走，要到学校时，到河边洗脚，再穿鞋走进学校。到了冬天，更是遭罪，因为早上上学路冰着，很好走，而中午放学，太阳出来化了冻，便不好走。有一回因为土太粘，我用力拔泥时，把雨鞋撕成两截，只好从别人家的草堆扯把草扎在脚上走回家。

80 年代初的时候，溪河上的桥是木桥，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桥的缝隙很大，能看见下面哗哗的流水，刮大风的时候不敢过去，除了有顺路过桥的大人帮忙，否则就要等风小些时，自己慢慢爬过去。小时候做梦最多的就是被风刮下河去，猛然惊醒，才知一梦。

我上学的赵铺小学，说是小学，其实分成四个地方，一二年级分别在两处，三年级在一处，相互间隔很远，最好的是四年级、五年级所在的地方，在溪河边上的砖头房子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赵铺小学。当时那是我最盼望的地方，盼望快点长大上四年级，到那里上学，才觉得是个真正的学生。我们一年级的教室是个土坯房子，很矮，所谓的课桌，就是用土坯在教室两端大概间隔两米的地方各砌两个墩子，再用一块长木板放在上面。下课后，我们常常在长木板上走，晃晃悠悠，就好像走在溪河的大木桥上。板凳每个人则从自己家里带，一排

可坐五六个人，当时的学费 1 块 8 毛，但就是这样的费用很多家庭都交不起，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便常被老师罚站在外面。我记得有位李同学因为拖欠学费，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外，冬天穿件黑棉袄，夹着用布包的书，站在教室外的寒风中，低着腰，瑟瑟发抖，鼻涕直流，想起来令人唏嘘。

到了四年级，终于教室像了教室，也有了操场、跳远的沙坑、像样的厕所。教我们的是来自南京的知青赵老师，这是我学习生涯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位老师，我们叫她“赵先生”。她教我们语文与自然，还兼着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印象中，白白的，胖胖的，对学生很严厉。因为我的作文常常能得到赵老师的高分，所以我对她所有的课都感兴趣。她让我们平时收集废纸，再统一卖到供销社去，作为少先队的活动经费，再用这钱订书报杂志，买来《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书籍。她还教我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找啊找，找到一个好朋友》《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音犹在耳。

前几年，带孩子去北欧丹麦旅游，看到美人鱼塑像静静地立在海边，感慨万千，我跟他们讲起了小时候如何捡废纸，如何知道安徒生童话，讲起故乡的赵老师……现在回过头想一想，当年这些知青老师，可能跟现在的老师学历不能相比，但在当时，他们却是我们闭塞乡村的春风，为我们带来了外界的新鲜气息，在那样的环境下，赵老师让我们也受到类似南京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这对我们是多么可贵啊！我要感谢赵老师给我最初的文字启蒙与理想培植。

学校因为在溪河边上，夏季放学时，我们便会偷偷在溪河里游泳嬉戏，追逐溪河里经过的帆船，直到帆影远去，有时还在发呆，这船到哪里？这水流到哪里？真的到大海吗？真想随

着这帆船，走向外面的世界。

小学毕业后，到镇上读初中，再到外地读高中、大学，然后又出国，为学业、生活四处奔走，走过了常人的俗俗套套，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游历海外，拥有了小时候所没有的一切。父母住在苏州，我有时住在上海，有时住在国外。儿子五岁时回上海接受母语教育，假期常常带他回苏州看望父母，给孩子们的印象，就是爷爷奶奶从来都是住在苏州的。孩子上中学时要填籍贯，问我如何填，我说填“江苏淮安”，孩子很诧异：“淮安我就去过一次，我怎么会是淮安人？”“我是淮安人，你当然填淮安！”我如此回答，虽然我知道，他可能不会理解的。

故乡离我渐行渐远，但是越是这样越让我留恋。朱自清先生谈起故乡有这么几句话：“青灯

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这样看来，在哪儿度过童年，就算哪儿是故乡。”朱先生这样的说法对于儿子，故乡依然没有答案，厦门、苏州、上海都是他小时候呆的比较久的地方，都有我们的家，都在那里读过书，一个人难道会有三个故乡？少年时，想拼命地逃离故乡，现在却又刻骨铭心地想念，难道当初的逃离就是为了今天的思念吗？人有时是那么矛盾，这些都让我一个成年人感到迷失，时代的进步，以后像我孩子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吧。

陆汉斌 男，捷克华商联合会副会长，江苏省政协特邀委员，江苏省侨联海外委员。



蓝印花布

——南通记忆和百姓梦想

||| 王金泉



包袱布 《牡丹拜寿》 民国 118 厘米 x 115 厘米

牡丹有“花王”之誉，牡丹花开，花容盖世，色绝天下，是富贵的象征。画面中团寿及蝴蝶角纹，寓意福寿如意的美好愿望。此纹样蓝白底纹相交，阴阳相衬，展示了蓝印花布图案所具有的独特民族风格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寒来暑往，离开家乡南通已三十九个春秋，家乡的记忆深深刻在脑海，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清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还很贫乏，冬夜也格外漫长。茅草屋内，橘黄的煤油灯下，“车转轻雷秋纺雪”，那是外婆在纺纱，唧唧复唧唧，那是妈妈在织布。在纺纱和织布的交响曲中，蓝印花布的棉被下，童年的我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梦里，大片的棉田，成片的绿油油的棉叶，点缀着粉红的、白的花，在夏日的风中摇曳；秋日的阳光下，如巨龙般的长长的芦苇帘上，白云朵朵的棉花绽放着笑意，然后在妈妈和婆

婆们的巧手下，变成我们身上的衣和被，温暖着少年的身心；梦中，更多的是妈妈和婆婆身着蓝印花布的襟衫，用有限的食材，尽可能地安慰我们姐弟的味蕾和胃。

面对蓝白两色构成的淳朴自然、千变万化、绚丽多姿的蓝白艺术世界，少年的我充满好奇。我一一指着蓝印花布的图案问婆婆：“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

婆婆对着图案告诉我：“这是龙、那是凤，这是喜鹊、那是牡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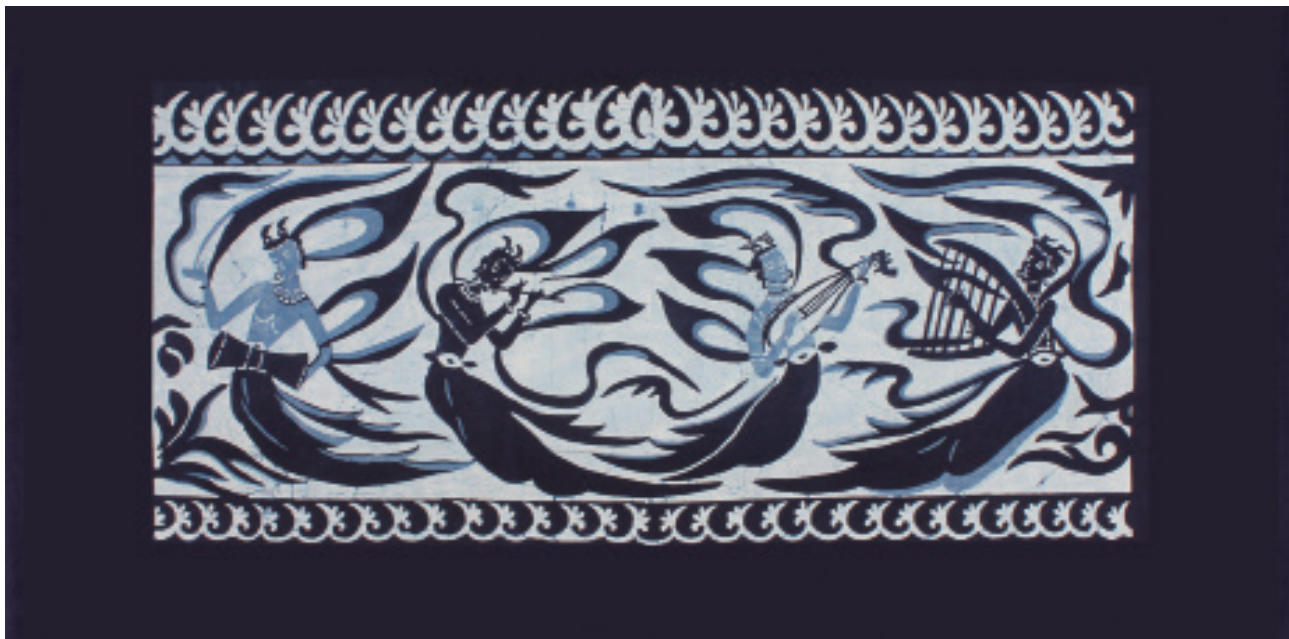
我又问婆婆：“龙、凤和牡丹是什么意思呀？”

婆婆想了想，告诉我：“以前皇帝比喻龙，



被面《吉庆有余 平升三级》 清代 220 厘米 x 135 厘米 收集地：江苏启东

这种被面纹样在民间流传数量最多，范围很广。主题纹样是由磬与双鱼构成的，磬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外形呈三角，与“庆”同音，象征好运气；“鱼”同“余”谐音，象征年年有余；辅助纹饰为“瓶升三戟”，寓意平升三级。



壁挂 《飞天》 吴元新、吴灵姝、倪沈键制作

作品以敦煌飞天为题材，突破性地将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与飞天优美的形象相结合，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在蓝、白两色的基础上，用中途停染二次刮浆的方式，使画面呈现深、浅两种蓝色，进而使画面更富层次，突出了飞天优美动人的舞姿。

皇后比喻为凤，龙和凤，意思呀要家庭和谐；牡丹意味着花开宝贵，这些图案都寄托着我们百姓对美满生活的梦想。”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小脑袋。

“蓝印花布怎么来的，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外婆慈祥地望着我。

“传说？”我兴奋地用小手托着下巴，仰望着外婆，外婆点点头，然后向我娓娓道来。

从前南通这里是一片海滩，人们靠打鱼为生，用麻丝结网，麻片遮身，日子过得很辛苦。有一天，王母娘娘做寿，在瑶池大摆筵宴，请来了西天老佛、东海龙王、南海观音、四方菩萨、八路神仙。王母心里高兴，亲自带领仙女去花园摘蟠桃，无意中向下界一瞧，正好瞟见（南通话“看见”的意思）通州（古时南通称为“南

通州”），只见那里人们披着麻片，没有衣穿，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立即让鹊神回宫取出三粒棉籽，又命牛郎织女下凡传授男耕女织，限期一年教会通州百姓植棉织布。鹊神奉命衔去了三粒棉籽，正待飞回花园复旨，不料路经瑶池，闻到酒香扑鼻，馋涎欲滴，嘴一张开，一粒棉籽掉进玉盏，沾上琥珀色的琼浆。鹊神连忙拣了起来，趁无人注意，赶紧到花园将棉籽交给牛郎。织女和牛郎高高兴兴地下凡去了通州。暑往寒来，不觉一年过去，各路神仙又来为王母娘娘贺寿。牛郎织女也如期归来，完旨交差，献上纱支若干，却见其中有的不是白色而是黄色，王母娘娘感到诧异，便问何故。织女禀道：“通州棉花中有一种花色微黄，人称紫黄色，不知何因？”鹊神知道无法再隐瞒，便如实说出棉籽



包袱布《梅兰竹菊》141厘米 x 131厘米 收集地：江苏海门

梅开五福是喜庆的象征，兰花清雅芳香，竹子四时常茂，菊花凌霜盛开，梅、兰、竹、菊喻高风亮节，同时也寓意冬夏春秋四季如画。凤凰飞舞，更是一派生机。

掉落酒杯沾上琼浆的实情。王母娘娘非但没有责怪，还论功行赏，赐牛郎仙酒三盏，织女仙桃三个，对鹊神也不怪罪，但要他每年七夕带天下喜鹊搭桥让牛郎织女相会。王母娘娘趁着酒兴要八方神仙各显神通，让通州百姓穿上花布衣服。于是观音菩萨摘下柳叶，龙王取下缠在脚上的海草，一齐向通州抛去，田野上顿时长满了叫“大蓝”、“小蓝”（统称蓝草）的植物，通州百姓用它染起了蓝印花布。

原来，蓝印花布还和牛郎织女、七夕连在了一起。

长大后，我知道了更多蓝印花布的故事。南通民间蓝印花布始于明代，是南通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工艺品之一。蓝印花布为纯手工制作，图案有断刀特点，产品上具有在染色过程中自然形

成的冰裂纹，色花比较完整，图案自然、美观、分布合理。由吴元新创办的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已被列为中国蓝印花布传承基地，由他负责申报的“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已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通也被命名为“蓝印花布之乡”。从明代流传至今。经过一代代民间艺人，尤其是当代民间工艺家的不懈努力，从单一的土布制品走向多种面料的制品，从生活实用型走向实用、装饰多种类型，从田野阡陌走向城市都会，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蓝印花布本身也构成了一部传说。2013年1月，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2014年，南通蓝印花布入选20个“江苏符号”，成为国家认可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然而，父辈和祖辈的辛勤劳作，蓝印花布的美好向往，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带给我们的仅仅是温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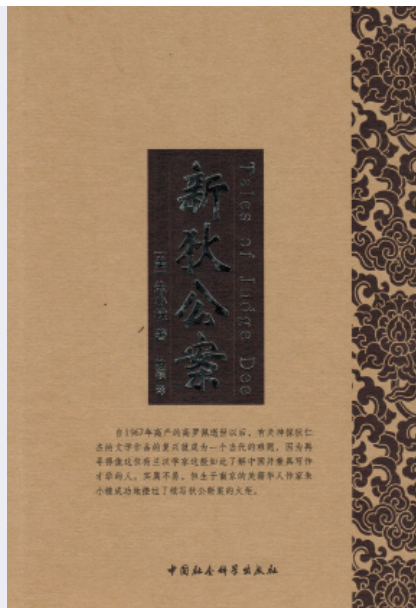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梦的召唤、江海儿女的勤劳和智慧汇集成磅礴力量。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730万江海儿女成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着时代的节律，南通处处呈现崭新的面貌，蓝印花布寄托的百姓梦想如画般地呈现在江海大地。面对日新月异的家乡、魂牵梦萦的故土，作为南通游子，怎能禁得住不为她骄傲、不为她自豪，又怎能禁得住不为她讴歌。

（本文图片及说明由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馆长吴元新提供）

王金泉 东部战区总医院、国家肾脏疾病临床研究中心暨全军肾脏病研究所肾脏康复治疗中心主任，医学博士。

书缘奇遇

||| 朱小棣



《新狄公案》书影

去年12月初在北京机场等候去台北的飞机，逗留在书店时邂逅一本俞敏洪的新书——《在人生的更高处相见》。书名蛮好，感觉挺暖，丝毫没有高处不胜寒，反而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让我回想起前年在南京参加江苏发展大会时与作者的一面之缘。俞敏洪的新书共分四章：读书、旅行、情怀、闲话，第一章的第四篇，篇名是“书蠹王强”，写当年新东方的伙伴，一个嗜书如命、藏书成癖的哥儿们。还专门介绍了王强的新书，《书蠹牛津消夏记》。我因为要赶飞机，没空细览，只好匆匆买下俞敏洪的书，扔进了背包。

到达台北之后，按计划，当然要去诚品书店，可是在林林总总、各类图书密布的书架面前，我竟一时找不着北，不知道应该去哪一片书架寻书。待我架起老花眼镜，散光的视力开始聚拢。定睛一看，眼前的一本图书，居然正巧就是王强的《书蠹牛津消夏记》，差点儿没把我自己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老眼昏花，产生了幻觉。

接下来，竟然还会有比这更巧的事儿。翻开《书蠹牛津消夏记》，第100页，居然说到购买高罗佩的“狄公奇案系列”九部，洋洋洒洒写了十页纸。我当年用英文续写狄公案，可是没敢漏读高罗佩系列小说里的任何一部。如今见到书蠹王强在书里侃侃而谈这一套书，那个亲切，真叫无以伦比。而紧接着叙说完狄公故事，王强在书里又提到的另一本书，是《三人同舟记》（Three Men in a Boat, by Jerome K. Jerome），刚巧又正是我年轻时始读英文原版小说之最爱。这一个巧合，瞬间把我读、写英文小说的人生轨迹，画上一个完满的圆圈。

细读王强十页纸的狄公案系列记叙，读着读着，开始大跌眼镜。过去一直以为高罗佩小说的中文翻译堪称一绝，行文流畅之美，让人全然忘记是在阅读译文，俨然以为汉学家高罗佩就是直接在用中文写作。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出要翻译出版我用英文写作的《新狄公案》

时，我还生怕译者翻译成夹生的汉语，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提出要参照高罗佩小说的中译本译文风格。哪晓得这次王强在书中直言批评高罗佩小说的中文译者，不尊重原文，望文生义，添油加醋，无中生有，胡编乱造。

王强在书中说，他看的是海南出版社2014年版第五次印刷的《大唐狄公案》，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以前曾经看过的中译本。王强说，这次对比了英文原著，着实吓了一跳冷汗，“以为买到的英文原版是舶来的山寨版”，因为对比中译本的华丽不实，英文原版反而显得枯陋简单。他还举例说，海南版《玉珠串》中有这么一段话：“黄昏，细雨霏霏，碧森森一带松林缭绕着一团团黑云，半日都不曾见着个人影。黑云沉坠在树梢头，酝酿着一场大雨。时正夏日燠暑，狄公策马在林间急匆匆穿行，全身衣袍早已湿了，脸上汗珠雨珠流成一片，浓密的长胡须沾着水珠一闪一闪，亮晶晶的。”而王强读了英文原著后才发现，这大段的描写根本在原文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因而他讽刺说“译者的想象力才配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王强还说，倒是法国人 Anne Krief 的法文译本亦步亦趋，像极了高罗佩的仿真翻版。王强本人还试译高罗佩那段英文原文如下：“静悄悄、湿漉漉的丛林里狄公又策马前行了半个时辰，他勒住马，忧心忡忡仰头看看上面密实的林叶。他看到的只是小小一片铅灰色天空。沥沥细雨随时会化作夏日倾盆。”原来这才是原著所有，中译本完全是越俎代庖，臆想连篇。

幸运的是，我的《新狄公案》的法文译者，刚好也是 Anne Krief，而且还对法国的出版商说，我的英文风格与高罗佩的极为相似，颇为仿真传神，这才让出版社下定决心在巴黎出版了我的英文小说的法文译本。我虽不懂法文，现今

看了王强的书，愈加相信法文译本也一定忠实原著，没有添油加醋。

如今我不禁要回头再看一下《新狄公案》的中文译文，是否会有太多如王强所指《大唐狄公案》中译本里种种胡编乱造的毛病。我随手翻到第四页，看见书上印着：“狄公起身走到窗户边，向花园望去，只见马荣正在操练武役。马荣身材高大，武艺精湛，是狄公手下一名得力的衙司缉捕。”还好，好像蛮不错，没有华而不实的无中生有。

说实话，初学英语的人，的确往往不能领会英文简朴之美，翻译起来更是苦于无法生成华丽的中文。一旦中译英，笔下更是离奇古怪的英文词汇乱飞，辞不达意，常常令英文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啼笑皆非。

所以不懂英文的人看见中译本的英文名著后，往往小看英美世界文豪，认为他们没有文采，或者自以为汉语比英语丰富，是世界最美语言，却没有意识到汉语中诗意浓而逻辑轻的弱点。英语中说服的力量，主要来自逻辑，而不是辞藻的迷人。就连描述性文字，也常透露着层层逻辑递进之美。

我今查看了一下我自己所写的那一句英语原文：Judge Dee walked across his private office to the window to glance into the courtyard, where Ma Joong, one of his lieutenants, a big, tall man and an excellent boxer, was drilling his constables. 应该算得上是古朴简洁，通达流畅。对比起中文译本，我那原汁原味的英语文风，该不会让事先已经读过中文译本的读者诸君，竟错以为我的英文原著是山寨版吧。呵呵。

朱小棣 男，美国华盛顿国际领袖基金会代理主任，知名双语作家。

澳洲鸟事

||| 陈 酉



冯霏 摄

刚到澳洲，新鲜的倒不是金发碧眼的异域风情，或是南北半球的季节反差。新鲜的只是鸟事。其实，我真不喜欢鸟。原因是，父亲那时养一个乌春，那东西不停嘴闹，声音不婉转，是金属质的，咣当咣当咣当，直叫到我神经快要断裂的时候，父亲总算在鸟与我之间选择留下我放弃鸟。乌春给放走了，从此家才获得太平。然而，后院的邻居却又爱上了鸟，院里屋檐下挂一排鹈哥，这个说完收垃圾，那个说打酱油，更有甚者，口吐粗言。烦不烦！好在鹈哥不像乌春大嗓门，又隔开一个院子，我还能忍耐。只不过，忍耐便是压抑的厌烦。

澳洲鸟并没有因为我对他们同类的讨厌而冷遇我。下飞机坐上电车，银鸥就在车前领路，它惬意休闲地展开长长的双翅，缓慢柔和地拍打着空气，完全一个处事老练沉稳的礼仪。飞翔的银鸥，默不作声，只在它负责的路途引领，之后就翅膀一侧转，呼扇着向别处忙碌去，另

一个银鸥接着引路，仿佛他们是事先有过安排，各人负责一个路段。在儿子来接我之前，看一段银鸥的礼宾演出，倒也饶有情趣，至少减少了一些陌生和寂寞。

午饭在城区的西餐馆简单点些东西。刚坐下，一个比蝴蝶大些的小东西，凌厉地在馆内飞翔。高空侦察一番，又疾速落到窗槛上继续瞭望。这时我才看清，是只红嘴彩羽的微型鸟，哟，不是一只，有几只呢。儿子端着奶茶面包过来，笑着说，你可得捍卫好自己的午饭啊，澳洲的鸟是不怕人的。

鸟不怕人，总感到有点夸张。在我印象中，鸟类的警觉，那是不比耗子差的。我们常常看影片，一群鸟起飞，往往说明有什么动静。鸟结成语中，大都惊心动魄：惊弓之鸟、鸟惊鼠窜、鸟哭猿啼、鸟覆危巢、作鸟兽散。这不怕人的鸟，是不是人靠近也无所谓呢？不久，在塔斯马尼



彩虹鸚鵡 (Robin Sun 摄)

亚峡谷公园我还真看到一场赖给你看的孔雀舞。峡谷公园，是个天然的国家森林公园。怪石嶙峋，瀑布湍急，道路崎岖，路途遥远，才走一半，我已经体力透支了。儿子看着手机地图说，前边不远有个咖啡馆，可以歇息吃点小吃。正说着，我似乎已经听到隐隐的人声了，不由得加快步伐往前赶。

确实是一块平坦之地，上有一个屋舍俨然的院落。只是这些人声，并不是食客的嘈杂，而是游人正对起舞孔雀的喝彩：喔！再来一个。喔，漂亮，漂亮，你最漂亮！

孔雀的美丽，谁人能够拒绝？

我们因为累，也因为要欣赏孔雀，赶紧找个地方坐下。刚刚坐下，桌底下钻出一个小孔雀，突然对着我们展开它那还没有秀出彩羽的尾巴，刷刷刷，那样子一点不好看，却一点不偷懒呢。我们不禁掩口胡噜，去去去，难看死了，谁要看你那光秃秃的小屁股？那小孔雀却不气

馁，依然打开折扇大小的尾羽秀它的本事。旁边的游客招招手，对着一尾拖着长长尾羽的蓝孔雀说：你过来啊，你别偷懒啊。蓝孔雀，高昂着它的头，抖动着满脑袋的“珠光宝气”，看它也不会跟你们瞎啰嗦。远处传来呦呦鸟鸣，哟，我们惊异发现，这峡谷里原来生活着好多孔雀啊。昂首眺望，我们希望从那茂密的丛林中看到孔雀雍容的身影。正瞭望着，那只蓝孔雀，突然走到我们跟前，唰地打开它的“彩屏”并像舞蹈演员似的瑟瑟抖动翎毛。原来它也知道我们冷落了它，它要吸引我们的目光。大家都笑着说，好了好了，你最美，你最美！蓝孔雀似乎还不满意这些溢美之词，展着它庞大的彩屏捧着一位小伙，小伙哈哈笑着，回身给它竖起两个大拇指说，very good! very good!

我们离开小店走入森林，头顶掠过飞翔的孔雀，那美丽硕大的飞鸟，让我恍惚回到了史前社会，抑或是凤凰于飞的世界……

邻居是希腊人家，种两棵巨大的蓝桉，“养”了一大群乌鸦。一清早起来就是“哇哇哇哇”叫个不停。我说，烦死了。儿子说，背后别说人家坏话。我说的是鸟啊。儿子说，对呀，乌鸦可聪明啦，啥时候来跟你算帐呢。哈哈，我说不至于我的智力都斗不过乌鸦吧。

你说这事是纯属巧合呢，还是因为澳洲鸟太多，每天都在上演你意想不到的故事，抑或还是，它们真有人类并不知道的一些秘笈？反正，第二天上午，乌鸦真的来找我了。我的一个做水电工的亲戚，曾经说过：动物的智慧，你是估计不到的。家里门窗关紧，小老鼠是打哪里进屋的，只有我们这种手艺人知道，它居然能从墙头中的电线导管里打进人的老巢，蛇也能直接从外墙爬进空调孔进入屋内。这老乌鸦来访的时候，我脑子里就闪现我亲戚的话语。

它在我家落地窗口的大平台上，我们隔着窗对峙，我不吭声，看它会有什么动作；它也不吭声，在平台上来回踱步，大蹇漆黑，大而金

黄的眼睛，透出高傲和威严，那神态仿佛在责问我为何讨厌它们的叫声。短暂僵持，它突然冲向我，咚咚咚，用它有力的喙啄着玻璃。我这时发出了大声嘘嘘，那厮居然退到远处，炸起颈圈上的羽毛，蛮横地嗷嗷直叫，它在向我示威。直到看我并不恋战，它才狠狠拉下一泡屎走了。之后，我家院子里隔三岔五会有大饼、盒饭、蛋糕残渣之类的东西，估计就是这群厮报复我的。

我知道，这些被我叫做乌鸦的鸟，澳洲不叫乌鸦，叫渡鸦。我不知道它们跟我们国内的乌鸦家是什么血缘关系。我生活的南方也从来看不见真正的乌鸦，只在书籍中屡屡看到人们对它的诅咒。澳洲并不歧视他们，澳洲人善待一切鸟类。人鸦之战之后，我尽量像澳洲人一样去亲近鸟类。于是又有了莫言那的故事。

莫言那是座雪山。假期的时候，我们去旅游，正好遇到暴雪。

从风雪中走进温暖的房间，首先想到的是弄点吃的。掏出一包花生米，正嚼着，树影摇曳，一尾渡鸦滑翔过来，稳稳站在我的阳台。我真不知道它是怎么知道我在吃花生米的。它瞪着我，也等着我。我随手给了它几个花生衣——幸好只是极少的几个花生衣，渡鸦毫不挑剔迅速把它啄完了。我打盹的儿子，突然大声说，妈妈，任何公园中，不能喂食野生动物，人家找你罚款的！啊，有这么严重吗？人家怎么知道我喂鸟了？还在跟孩子强词夺理的当口，黑压压，飞来一片渡鸦。我大致数了数，小小的阳台，竟然站了六十多只大鸟。儿子说，看看，这么多鸟集结在你房间阳台，不是你喂鸟是啥？

我真的一时语塞。是啊，它们怎么知道我喂了那只鸟五六个花生衣呢？于是我出门哄鸟，狡猾的鸟只是飞出两三米，站在枝头观察，不打算动身。儿子说，别哄，你这又不好，你坐着别动好不好。好好好，我坐着，啥也不做。半个小时之后，看看没希望的渡鸦一群群飞走了。而

最早飞来的那只吃过我贿赂的渡鸦，依然不走。它金黄深邃的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屋里的我。我站起来，隔着玻璃说，人家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话还没说完，只见那厮，炸出项圈羽毛，对着我，嗷嗷嗷嗷直吼。我再次相信，这情感和逻辑思维并不是人类的专利。莫言那的渡鸦和隔壁老希腊的渡鸦，所作所为何其相似乃尔，而此鸦与彼鸦，隔着一条深深的太平洋海沟，相去十万八千米呀，居然以同样的方式与我对峙、挑衅、抗议……

莫言那回家的时候，正好遇上希腊邻居自行车运动归来，我惊异地发现，他的头盔上“长”出了许多塑料扎丝带，像一个刺猬似的，好生奇怪。老希腊说，这边公园有一群黑额矿吸蜜鸟，认识他，一见他就追着，啄人。今天特意“长”点刺，好吓唬吓唬那群鸟。

我笑着听他的故事，我确实被这些鸟事弄迷糊了。是人在居高临下研究鸟，还是鸟居高临下研究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或许就是一尾神鸟。其实人大可不必自作多情，自我矫情，甚至自恃智慧。还是澳洲规矩好，不打不杀不哄不赶不喂不宠，它爱怎么活就怎么活，我想，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尊重。

陈西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越过一湾海峡 你我如约相聚

“古漕新韵、千秋传承——苏台两地青年艺术家江南水乡采风行”活动侧记

||| 吉 强

一湾浅浅的海峡，你在那一头，我在这一头。一水相隔，却隔不断两岸的血脉相连。夏秋时节，参加“古漕新韵、千秋传承——苏台两地青年艺术家江南水乡采风行”活动的艺术家们，在江苏，在台湾如约相聚。他们携手采风，共展佳作，于翰墨飘香中同显中华文化底蕴，在交流互动中增进亲情友情。

启文化之旅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亦是两岸艺术家共同的文化基因和不竭的创作源头。为推动两岸青年艺术家的文化交流，加深两岸同胞亲情友情，推进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实现同胞心灵契合，江苏中华文化学院在江苏省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下，与台湾北岸艺术学会、台湾艺术大学一道发起组织了“古漕新韵、千秋传承——苏台两地青年艺术家江南水乡采风行”系列活动。

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苏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瞿超表示，



采风行活动启动仪式

作为江苏省面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开展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交流基地，学院凭借江苏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努力打造“古漕新韵、千秋传承”文化交流品牌，为两岸青年艺术家交流、联谊、创作搭建平台，创造更多机会，共同传承好，发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6月26日，江苏和台湾的80余名青年艺术家齐聚水乡名城苏州，共同开启此次文化交流之旅。

绘江南美景

那一份柔，那一种雅，那一片静；那温润，那含蓄……江南风情不时触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点燃他们的创作激情。他们不停地把处处美景融入片片纸中。

拙政园内，亭台精巧别致，长廊曲径通幽，流水缓缓与之相傍；粉荷的嫣然一笑、绿枝的飘逸洒脱，两相辉映；夏风不甘寂寞，透过如烟细雨不时送出几许淡香，递出几曲蝉鸣，更增添了几分灵动……园中处处有情，面面生诗，惹得艺术家们沉醉其中。他们依亭廊而坐，或近观，或远眺，用一纸笔墨绘景抒情，记录下名园的意境。

古镇周庄，尽显江南水乡的模样。河与巷相依，桥与街相连；翠柳依依，碧水盈盈，舟楫摇动；廊坊宅第傍水而筑，粉墙黛瓦、仄街幽巷……这一切引得艺术家们流连忘返。他们三三两两，有的临河而坐，有的凭栏而立，或轻描淡摹，或浓墨渲染，绘出一幅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画像，留住那水乡的温情。

江南的美让艺术家们感触颇多。台湾艺术大学张耀华说，苏州的雨很温柔，让人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烟雨朦胧”，这样的雨配上拙政园的景，很美，很有诗意。该校的蔡名璨感叹道，看到周庄的实景，才发现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地方像画中那样，这触发了创作上的更多灵感。南京师范大学蒋佳莉则说，亲近如此美景，能获得最直观的绘画感受，比起在画室作画，对画面的情感更多了。

促艺术交流

此次活动不仅让两岸艺术家留下了精美画作，收集了丰富素材，更是为大家切磋技艺、相互借鉴提供了宝贵机会。

台湾北岸艺术学会秘书长刘凤仪表示，此行



让台湾艺术家对大陆的创作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两岸同行也能面对面交换创作经验，这对大家帮助很大。台湾艺术大学李宗仁教授认为，两岸的创作在传统和当代的思维上是有所差异的，这次交流有助于扩大两岸艺术家各自



两地艺术家拜谒中山陵



两地艺术家进行创作交流

的创作视野，为文化艺术创新带来更多的样貌与可能性，也能为两岸文化融合做出新的贡献。南京师范大学张琪悦说，每个人创作习惯与方法都不相同，台湾艺术家的写生提供了一个视窗，给自己创作带来了新的观察角度。

艺术的创新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6月29日晚，在江苏中华文化学院报告厅内，一场“从金陵八家到‘新金陵画派’”讲座正在进行。江苏著名美术史论家、鉴定家、书画家萧平以金陵八家和“新金陵画派”的代表性作品为例，围绕国画的文化特质、意象的表现手法，勾勒出国画传承发展的脉络。不少台湾艺术家表示，这场讲座让他们对国画传统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对国画艺术传承与创新有了新的思考。辅仁大学林柏瀚认为，中华文化中的传统元素非常值得在绘画中去运用。



萧平为两地艺术家做“从金陵八家到‘新金陵画派’”讲座

增同胞情谊

这是一场文化交流之旅，更是一次情感互动之旅。几天的行程中，两岸艺术家结交新朋友，

再会老朋友，共叙亲情友情。

不少艺术家表示，此行最大的收获，除了艺术所得外，就是结识了很多朋友，大家相互了解，建立了友谊。台东大学林永发教授是第二次参加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感慨道，这些天大家一起加微信，互相交谈，从陌生变为熟悉，情感一天比一天深。台湾北岸艺术学会理事长谢玲玲说，大家来江苏写生，不仅对这边的文化有了一个新认识，还希望把建立起来的两岸情缘永续下去。南京师范大学谭雷鸣说，一些台湾朋友是在去年江苏中华文化学院组织的交流中认识的，这次相见又增添了一分亲切感，希望大家常来常往，做永远的朋友。

在苏州，艺术家们还参观了城市规划馆、诚品书店和山塘街；在南京，他们拜谒了中山陵，参观了南京博物院，凭吊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游览了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和河

感言摘录

水乡·随想

“霾云悠水映曦空，画舫飞烟凌渡中，风寒料峭秋意浓，露凝重，岸上丹枫伴雨桐。”40年前，在15岁的青春时，我以词抒情，写下了心目中念想的江南，那个遥不可及的烟雨江南，在父母口中，编织着我年少的乡愁。

尔今，我们穿云而来，以心、以情、以笔墨，晕染一场艺术的盛宴。没有秋风胭脂叶，春过留下的细雨霏霏，圆了我亲炙江南的梦。

两岸以笔作桥，以墨为介，拙政园的飞檐亭阁，周庄的墨瓦粉墙，我们写的是景，品的是情，

在笑语错觞中，两岸的情谊温温润润的漫成最动人的记忆。

听着学子们用不同的口音兴味盎然的交换彼此学习的心情，看着下一代在舞笔弄墨中传承中华文化的情感特质，心中尽是感动，旅程中的每一个履痕都将成为孩子们成长中稳步向前的力量。江南的好风光喂养了他们艺术文化的沃土，在为他们掷下种籽时，两岸艺术发展的未来，蓊郁成林，势将成局。

满心的感动，满心的感谢，古漕新韵不停歇，两岸交融的情谊亦不曾停歇。摇橹轻韵中，我来，我在，我，自在——

台湾北岸艺术学会 李佺伦



“古漕新韵、千秋传承——苏台两地青年艺术家江南水乡采风行作品展”在台北张荣发基金会国际会议中心展出

西新城。大家共同追忆中华民族往昔，亲身体会大陆经济社会发展巨变，真切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同胞间的骨肉亲情。不少台湾艺术家发出感慨，大陆和台湾，更多相同的地方是人。台湾艺术大学李宗仁教授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两岸同文同种，本来就是一家人”。

展缤纷佳作

金秋时节，参加写生活动的两岸青年艺术家相聚台湾，共展水乡采风佳作。9月29日，“古漕新韵、千秋传承——苏台两地青年艺术家江南水乡采风行作品展”在台北张荣发基金会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苏台两地嘉宾、青年艺术家近200人参加展览开幕式。

开幕式上，两地艺术家共同回忆采风活动中的点点滴滴，共叙结下的深厚情谊，一起分享各自的创作构思与绘画技巧。台湾艺术家还畅谈了

对江南水乡的深刻印象、对江苏历史人文和现代化建设的真切感受。大家表示两岸同属一片蓝天、同处一片山水，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根，要通过艺术交流，继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我是中国人”的荣誉感。

此次展览所展出的138幅画作，或近显局部或远揽全貌，或淡笔勾勒或浓彩泼墨，或工笔或写意，体现了江南水乡的人与物、景与情，于历史遗韵与现代风貌的交融中透出江南千年文脉的意境。这些画作不仅在台北张荣发基金会国际会议中心与台湾艺术大学展出，还将在南京继续展出。两地艺术家又纷纷相约，南京再见！

吉强男，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苏中华文化学院）文化联络处干部。